

回族簡介

在中國少數民族中，回族人口相對是較多數的一個民族，主要分布於寧夏回族自治區，此外新疆、青海、雲南、河北、山東以及北京、天津等自治區、省、市也有回族分布其間。以往主要是 1950 年之前，在各類民族志的著作中，幾乎不承認回族是一個民族，但之後大陸經過民族識別後，認定回族是一個民族。關於回族的族源，可追溯到西元七世紀時，有許多阿拉伯、波斯商人，到中國經商，久之，大部分滯留中國，歷經五代至兩宋，五、六百年的累積跟發展，遂成為回族的一個來源；及至十三世紀初葉，蒙古成吉思汗崛起，發動西征，裹脅了大批阿拉伯人、中亞人及波斯人東來，這些人成為回族的主要源頭。

回族幾乎都信奉伊斯蘭教（只有中國人稱之為回教），也都是虔誠的穆斯林（也只有中國人稱之為回教徒），他們信仰真主阿拉（在新疆地區則稱之為胡大），遵守清規、奉公守法。在中國境內的回族呈現「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往往在鄉自成村落，在城則自成街道，所以回族始終保有傳統的信仰和習俗。

雖然依伊斯蘭教教規，男子可以娶四個妻子，但在中國回族基本上採行一夫一妻制，離婚，在回族中是極其罕見的。在服飾上，由於教派不同，有些許差異，在西北地區的回族，一般男子服裝多為黑色、寬大、長及腳面的長褲、紮褲腿（青年人多不紮），穿西裝式長大衣、戴圓帽、平頂黑或白色小帽。婦女的服飾，上窄下寬而長的衣裳，多為黑色，其他地區或不同教派，則有些不同，婦女多著蓋頭（稱為古古）。

在飲食上回族都虔誠的遵守伊斯蘭教教規，不食豕犬、不食自死肉，不食一切動物的血、不食猛獸肉…等規定，每年並要「封齋」一個月（自日出至日入不得飲食，但病人、孕婦及兒童例外），教規原意是要將節省下來的糧食救濟窮，可見伊斯蘭教充滿了博愛精神。

以往由於受西方傳播的影響，總以為穆罕默德一手拿可蘭經，一手拿劍，其實這種描述是極其錯誤的，因為在穆罕默德生前，還沒有可蘭經，就像孔子生前還沒有論語一樣，可見西方的描述是不正確的。

在新疆信奉伊斯蘭教各民族，自有各民族的語言文字，但在內地各省市的回族，由於長期與漢人相處，大多是以漢語為主要語言，凡是回族聚居的地方，都有清真寺，以為穆斯林禮拜的場所。

目 錄

魏晉南北朝聯姻概述	林恩顯	1
從《大唐西域記》看七世紀之西域	劉學鈔	9
中國疆域問題與中國邊疆學理論建設之關係	吳楚克	47
恩琴在外蒙古活動之研究(1920-1921)	楊詩馨	63
遼朝在內蒙古地區的行政建置	陶玉坤	83
稿 約		97

魏晉南北朝聯姻概述

林恩顯

一、前言

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係中原紛爭，北方遊牧民族乘機入侵造成「五胡亂華」。後至元魏時與南方之劉宋形成南北朝之局。建立多元民族的許多地方割據政權。自兩晉南北朝，以迄隋之統一，期間在政治上雖呈分裂混亂情形，但在漢民族與北方諸邊族在血統上、文化上卻為大融合時期，其在和親關係上也有其特色，即異族地方政權間的聯姻為多。唯過去和親研究多偏重於中原王朝與邊族首領間的通婚，而對異族地方政權間的聯姻著墨較少值得推廣。

本文擬以民族學、政治學的角度，族群關係理論，來分析魏晉南北朝時期異族政權間聯姻和親的實例、特色，以比較、綜合中國歷代和親研究焉。

二、魏晉南北朝簡史

東漢獻帝（一九〇—二二〇）時，有董卓、曹操弄權，挾天子以令諸侯，漢朝帝國分崩離析，各州牧郡守相繼據地稱雄，終成魏、蜀、吳三國鼎力之勢。嗣後司馬懿父子相繼專擅魏政，至司馬昭卒，子炎逼魏主曹奂禪位（二六五）改國號曰晉，視為晉武帝。晉武帝太康元年（二八〇），吳主孫皓乞降，中國遂又統一。武帝崩，子惠帝嗣立，五胡遂乘機蜂起，終迫晉室南遷，中原為邊疆民族所佔據，是為「五胡亂華」。建立國家前後凡十六，若以其族別數之，除漢族外，邊族則有匈奴、羯、氐、羌、鮮卑等五部族，故號稱「五胡」。

五胡十六國相互攻伐百餘年之久，繼之興起者有鮮卑拓跋氏。拓跋珪崛起於盛樂，攻滅後燕後，自即帝位於平城，是為元魏（或做北魏、後魏）道武帝（三八六—四〇九），元魏經道武、明元、太武三帝，破滅北

燕、北涼、夏諸國後，黃河流域於是統一。其時，南方則有劉裕之篡晉，建立宋朝，雄據於長江流域，於是北方之元魏與南方之劉宋，形成對峙之勢，遂開南北朝之局。此後，南方則劉宋而齊（蕭道成建），而梁（蕭衍建），而陳（陳霸先建）；北朝元魏，旋即分為東魏、西魏，高氏篡東魏而建北齊，宇文氏篡西魏而為北周。南方之陳，與北方之北齊、北周，成三足鼎立之勢。北周武帝於公元五七七年滅北齊，遂併合江北。至武帝之孫靜帝，年幼，太后之父楊堅輔政，於公元五八一年楊堅受北周帝禪，建立隋朝。隋軍南下，先滅江陵之後梁，次又滅陳。至公元五八九年，隋朝建立統一的國家，遂結束南北分裂之局¹。

五胡十六國表²

國名	族系	建國者	都城	年代	附註
前涼	漢	張祚	姑臧（甘肅武威）	301-376	
前趙	匈奴	劉淵	平陽（山西臨汾）、長安	307-329	劉淵國號漢至劉曜改為趙
成漢	氐	李雄	成都	304-347	即後蜀
代	鮮卑	拓拔猗盧	盛樂（綏遠和林格爾）	307-376	不在十六國內
後趙	羯	石勒	襄國（河北邢台縣西南） 鄴（河南臨漳縣西）	319-351	
前燕	鮮卑	慕容皝	龍城（熱河朝陽）、鄴	337-370	
魏	漢	冉閔	鄴	350-352	不在十六國內
前秦	氐	苻健	長安	351-394	385年後國都不定
後燕	鮮卑	慕容垂	中山（河北定縣） 龍城	384-409	
後秦	羌	姚萇	長安	384-417	
西燕	鮮卑	慕容冲	阿房（山西咸陽縣西） 長子（山西長子縣）	385-394	不在十六國內
西秦	鮮卑	乞伏國仁	苑川（甘肅靖遠西南）	385-431	
北魏	鮮卑	拓跋珪	平城、洛陽	386-557	不在十六國內
後涼	氐	呂光	姑臧	386-403	
南涼	鮮卑	禿髮烏孤	樂都（青海樂都縣）	397-414	
南燕	鮮卑	慕容德	滑台（河南滑縣） 廣固（山東益都縣西北）	398-410	
西涼	漢	李暠	敦煌	400-420	
北涼	匈奴	沮渠蒙遜	張掖、姑臧	401-439	初為段業所建
夏	匈奴	勒連勃勃	統萬（陝西橫山縣西）	407-431	
北燕	漢	馮跋	龍城	409-436	

¹ 劉義棠：中國邊疆民族史，頁 161-162，台北，台灣中華書局，民國 60 年 6 月二版。另參照劉學鈞：歷代胡族王朝之民族政策，頁 119-190，台北，知書房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10 月初版一刷。

² 參考劉義棠：中國邊疆民族史，頁 163-164。

三、聯姻實例³

紀年	公主名	公主出身	和親對象	在番地位	參與典禮人士	聘禮或賞賜	和親年限	和親成效	出典
北魏平帝七年(293)	拓跋魏公主	拓跋綽女(拓跋魏平帝女)	匈奴宇文部大人普撥子宇文丘不勤						《魏書·序紀》、《北史·匈奴宇文莫槐傳》
北魏昭帝五年(298)	拓跋魏公主	拓跋祿官女(拓跋魏昭帝長女)	匈奴大人宇文莫槐子宇文邕昵延					同上	
北魏昭成帝建國二年(339)	前燕公主	前燕慕容皝妹	北魏昭成帝女代拓跋什翼犍	皇后					《北史·后妃傳》、《資治通鑑》卷96
北魏昭成帝建國四年(341)	北魏公主	北魏代拓跋什翼犍女	匈奴烏桓(鐵弗劉衛辰)						《魏書·序紀》
北魏昭成帝建國七年(344)	前燕公主	前燕慕容皝女	北魏昭成帝女代拓跋什翼犍	皇后	什翼犍派大人到燕、魏邊境接公主，皝也親送公主		360年去世		《北史·后妃傳》、《魏書·昭成帝紀》
北魏昭成帝建國七年(344)	北魏公主	北魏列帝女代拓跋什翼犍侄女	前燕慕容皝		遣重臣帶重禮				《魏書·序紀》
(358)	北魏公主	北魏宗室女代拓跋什翼犍女	前燕慕容儁					同上	
(360)	北魏公主	北魏昭成帝女代拓跋什翼犍女	匈奴鐵弗劉衛辰						《魏書·序紀》、《北史·衛辰傳》、《資治通鑑》卷108
(362)	前燕公主	前燕慕容暉女	北魏昭成帝女代拓跋什翼犍	以備後宮				同上	
(394)	前秦東平公主	前秦苻登妹	西秦乞伏乾歸	作梁王后					《晉書·乞伏乾歸載紀》
(411)	北燕樂浪公主	北燕馮跋女	柔然藹苦蓋可汗						《晉書·馮跋傳》、《魏書·蠕蠕傳》
北魏神瑞元年(414)	柔然公主	柔然藹苦蓋可汗斛律女	北燕馮跋	妻				同上	
北魏神瑞二年(415)	後秦西平公主	後秦姚興女	北魏太宗明元帝	夫人、嗣贈昭哀皇后	派散騎常侍、東宮尚書姚泰送公主		447年被賜死	加強雙方關係(北魏控制北涼)	《晉書·姚興載紀》、《魏書·太宗紀》、《北史·后妃傳》、《北史·姚興傳》
北魏太武帝延和二年(433)	北涼興平公主	北涼沮渠蒙遜女	北魏太武帝	左昭儀				北魏承認北涼在政治上的獨立地位	《北史·沮渠蒙遜傳》、《魏書·沮渠蒙遜傳》

³ 參考崔明德：漢唐和親史稿，頁 54-82，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五月第一版。張正明：和親通論，民族史論叢第一輯，頁 6，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歷史研究室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

4 中國邊政第一百六十七期

紀年	公主名	公主出身	和親對象	在番地位	參與典禮人士	聘禮或賞賜	和親年限	和親成效	出典
北魏太和二年(433)	北魏武威公主	北魏太武帝妹	北涼沮渠牧犍	王后		班賜甚厚		雙向和親，暫時停止戰爭，柔然向北魏貢，獻馬兩千匹，北魏也賜物多	《魏書·沮渠蒙遜傳》
北魏太和三年(434)	北魏西海公主	北魏太武帝女	柔然敕連可汗吳提	可汗妻	派穎川王到公魏拓跋柔主平城				《北史·蠕蠕傳》、《資治通鑑》卷122、《魏書·蠕蠕傳》
北魏太和三年(434)？	柔然公主秦大主	柔然敕連可汗吳提妹大秦氏王楊難當女	北魏太武帝	夫人、左昭儀					《魏書·蠕蠕傳》、《宋書·索虜傳》、《魏書·氏傳》、《魏書·世祖紀》
(439)	北魏公主	北魏太武帝女	氏王楊保宗						
興和年間	東魏廣樂公主	東魏孝靜帝女(齊南王匡孫女)	吐谷渾可汗夸呂						《北史·吐谷渾傳》
西魏大統元年(535)	北齊蘭陵公主	東魏孝靜帝公主(常山王安樂公主)	柔然敕連頭兵伐可汗阿羅辰	可汗妻	詔宗正元壽送公主	柔然遣奉馬千匹為聘禮		自是朝貢相尋	《北史·蠕蠕傳》、《北史·后妃傳》、《魏書·蠕蠕傳》、《齊書·祖珽傳》、《資治通鑑》卷157
？	吐谷渾公主	吐谷渾可汗夸呂從妹	東魏孝靜帝						《魏書·孝靜紀》
西魏大統四年(538)	西魏化政公主	西魏文帝公主(孝文帝時舍壘女)	柔然敕連頭兵伐可汗阿羅弟塔塞	可汗妻					《資治通鑑》卷158、《北史·蠕蠕傳》、《北史·后妃傳》
西魏大統四年(538)	柔然(郁閭)公主	柔然敕連頭兵伐可汗阿羅長女	西魏文帝	皇后	迎親使扶風王元孚	隨車七百萬匹，駱駝一千頭陪嫁	二年	柔然、西魏均視此項關係	《北史·蠕蠕傳》、《北史·后妃傳》
北齊武帝時	柔然鄰和公主	柔然敕連頭兵伐可汗羅辰女	東魏相高歡子高湛(北齊武帝)						《北齊書·武帝紀》、《北史·蠕蠕傳》
武定三年(545)	柔然公主	柔然敕連頭兵伐可汗愛女	東魏相高歡		慕容儼娶公主，高歡下館親迎			柔然政治地位高，高歡去世後，文襄公主結為夫妻生一女	《北史·蠕蠕傳》
西魏大統七年(551)	西魏長樂公主	西魏文帝女	突厥酋帥土門(伊利可汗)	可汗妻		土門獻馬兩百匹			《北史·突厥傳》、《冊府元龜·外臣和親》、《資治通鑑》卷169、《周書·突厥傳》、《周書·帝紀五》、《北史·后
北周武帝天和三年(565)	突厥阿史那公主	突厥木杆可汗女	北周武帝	皇后	陳公貴、司徒神武、貴安、南楊等	歲給繒絮錦餘十萬段			

紀年	公主名	公主出身	和親對象	在番地位	參與典禮人士	聘禮或賞賜	和親年限	和親成效	出典
北周靜帝大象二年(580)	北周千金公主	北周靜帝宗室趙王招之女	突厥他鉢可汗、沙鉢略可汗	可敦	汝南公宇文弼、長孫晟	歲賜綵十萬段	約共十六年	突厥助北周對吐谷渾及北齊	《北史·突厥傳》、 《周書·宣帝紀》、 《周書·突厥傳》、 《晉書·劉琨傳》
?		晉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劉琨	鮮卑酋帥署幽州刺史段匹磾						

四、聯姻特色

三國時代無和親可言。晉朝也不與邊疆少數民族王朝和親。晉朝南渡後，留在北方的劉琨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曾與鮮卑酋帥署幽州刺史段匹磾聯姻，屬地方政權間的聯姻。至十六國、南北朝時期是個動亂和分裂的歷史時代，北方已成民族大會舞台，民族間有大衝突，也大融合，其和親聯姻主要特色如次⁴：

（一）主要發生在不同少數民族王朝間

在將近兩百九十年間，除北燕皇族為馮氏，東魏的高氏屬胡化的漢人，且不代表中原朝廷，僅屬漢族地方政權外，其他和親多屬不同少數民族王朝間的聯姻。

（二）以鮮卑族為主角

在多數不同少數民族王朝間的聯姻中，又多數涉及鮮卑，包括雙方均為鮮卑，或一方是鮮卑。鮮卑中，尤以拓拔部為最多，連同期所建立的代國、北魏、西魏、東魏在內。

（三）中原分裂時聯姻多，統一時少

以拓拔部在建立北魏前，及北魏前期六〇餘年間兩時期為多，北魏後八〇餘年間則無，西魏與東魏也有聯姻。分裂時因需要結盟故聯姻多。

（四）和親大致出於兩相情願，且重視

當事雙方均為少數民族，無貴賤、體面問題，且游牧民族族外婚俗習

⁴ 參考張正明：和親論，中國古代邊疆政策研究，頁四三六—四三九，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二月。

慣容易促成。此時期的通婚既然雙方都情願，且有利結盟，故雙方均甚重視其儀禮和地位。

（五）雙向交換婚（雙向互婚）者多

此時其在代國與前燕、北魏與柔然、北魏與北涼、北魏與氐、北燕與柔然、西魏與柔然、東魏與吐谷渾、北周與突厥之間，均有交換婚，有同時也有先後的交換婚。交換婚也是雙向的聯姻，比單向的更對等，雙方均有人質在對方。

（六）公主身分與出嫁後地位均高

歷代和親公主，尤其中原朝廷多封宗室女為公主，而此時期則多封帝王女或妹為公主。出嫁後也多為王后或可敦，身分地位均高，頗受重視。

（七）僅圖近利，少有遠謀，易生變故

此時代民族舞台上的角逐者多，變化也大。因此聯姻和親雙方僅有短淺眼光，多功利主義，反覆無常，少有長期戰略方針。

五、結語

魏晉南北朝是個漢族分裂，多民族角逐中原政權的時代，尤其北方游牧民族分據中原建立漢化王朝，特別在北魏中期後，在北方民族與西部民族之間，產生了地位升降的變化。北方民族以鮮卑為主，因進入中原較久，立國時間較長，漢化較深，地位大體與漢族等同。西部民族以氐、羌為主，被認為地位較低。因此西魏、東魏和北周僅與北方民族通婚和親，不與西部民族聯姻。吐谷渾是西遷的北方民族，地位高於氐、羌，仍可與北方民族聯姻。此種狀況延續到從北周脫胎而來的隋朝。可見此時期的民族關係影響聯姻實況。

至於聯姻的影響，在政治上，藉和親促進聯盟關係，發展隋朝統一基礎。在經濟、文化上，從使節、禮儀地位與攜帶禮物的互送，增進民族間經濟文化的交流和發展。在民族上，可減低民族偏見，增進親近及血緣融合。故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政治上雖係紛擾時代，但在民族文化上卻是大融

合時期，而其聯姻也扮演了重要角色。⁵

（2006 年 6 月投稿，2006 年 7 月 30 日審查通過）

⁵ 林恩顯：中國古代和親理論初探，台北，政治大學民族學報二十三期，頁 33-48，民國 87 年 12 月。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莫道貓兒馴，敵人蠢。（維吾爾族）

衙門深似海，妖魔大過天。（壯族）

對官府做買賣，不是蝕本就是遭殃。（傣族）

毒不過青蛇，凶不過貪官。（苗族）

一木不成林，一磚不成屏。（哈薩克族）

獨木難支屋，孤草難搓繩。（蒙古族）

人離群太孤單，羊離群狼喜歡。（回族）

虎怕離山，人怕孤單。（布依族）

平民中有聖賢，沙子裡有黃金。（藏族）

人與人合群，桃與杏分堆。（烏孜別克族）

一只山羊被狼吃掉，十只山羊把狼嚇跑。（柯爾克孜族）

一只眼睛看不見所有東西。（景頗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從《大唐西域記》看七世紀之西域

劉學鈺

中原大學兼任教授

摘 要

中國歷史悠久，號稱文明古國，惟若論文治武功均值誇耀者，唯漢唐二朝。七世紀初大唐帝國威震北亞，草原諸游牧民族國家，懷德畏威，乃對唐天子李世民上尊號曰「天可汗」。就此點而言，秦皇漢武猶未之能比，惟其時今中亞地區仍在西突厥汗國控制之下，大唐雖盛，對之尚無可奈何，雄才大略如李世民者，焉能無憾？初有僧人玄奘者，經西域赴天竺求尋佛教經典，回程復經西域，返長安後，大唐天子囑其將往返西域之見聞筆之於書，遂由玄奘口述門弟子辯機筆錄，書成題之曰《大唐西域記》。此書為漢文中記載七世紀時西域諸國地理、歷史、風俗、民情乃至宗教最為詳盡者，不僅在國史上具有極重要之地位，對印度古史也具有無與倫比之價值。而所謂西域者，有廣、狹二義，其狹義者，僅指今天山南北，廣義者則含蓋今中亞地區，按玄奘之目的地為天竺（今印度），而書中所載也以印度為主，但書名則為《大唐西域記》，似以西域為主，必有其含意在焉，本文擬就該書撰著時代背景及涉及西域部分加以敘述及分析。

關鍵詞：玄奘、西域、大唐西域記

壹、諸胡列國南北朝以來盛行佛教

佛教源於天竺，創建者為喬答瑪·悉答多，「得道」後，信徒以其為

釋迦族之聖者（印度語讀若牟尼），遂稱之為釋迦牟尼而不名，其教義多少受到古印度婆羅門教及古波斯瑣羅亞斯德教（經西域傳入中國後，稱之為祆教）之影響，佛教以其深厚之哲學基礎及廣博之慈悲大愛遂廣為傳播，然而其輪迴思想、必須剃髮出家之作爲，與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不相契合，以是在三國以前，佛教雖經中亞大月氏人東傳中土，但中國尚無剃度出家者，雖有人研習佛經，但信奉者不多，及至西晉季世，匈奴族劉淵首創胡族建立漢魏式政權後（時為西元 304 年），北亞草原諸游牧胡族相繼建立政權，向者均以「五胡十六國」或「五胡亂華」稱之，就史論事，此種稱謂極不妥適，如所週知自匈奴劉淵於西元 304 年建立「漢」政權後（其後劉曜改國號為趙，因此稱之為漢趙，較為合適，但一般史書則稱之為前趙），以至鮮卑族拓跋珪建立魏政權（或稱拓跋魏、北魏、元魏或後魏），其間建立政權者既不止匈奴、羯、鮮卑、氐及羌五族，也不止有十六國，因此以諸胡列國稱之，當較合適；再者，自古以來從未有任何律法規定中國大地必須由華夏之族或漢人（其實所謂漢族或漢人，除最初之華夏、東夷、荆吳及百越四系外，越至後代其內涵越為複雜，詳情請參看劉學鈺《中國文化史講稿》台北知書房出版社，2005 年，P.15～16）建立政權始為正常，若由非漢人也即習稱之胡族建立政權，則謂「亂華」，如此說法就史識、史德而言，寧無缺憾？

自諸胡族在華北建立政權後，由於被統治之人民以漢人（其時所謂漢人、漢子乃含有輕蔑之意）居絕對多數，胡族領袖建立政權命王稱帝之後，面對被統治之漢人，不免心虛，如羯族石勒曾稱：「…且自古誠胡人而為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¹

而羌族姚弋仲戒其子姚萇時也曾稱：「…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²

從而可知在四世紀時，今日中國境內無論胡族或漢人尚無法接受胡族命王稱帝，但諸胡族事實上已建立政權稱孤道寡，因此必需尋找理論依據，除循漢文文獻之若干記載，迂迴解釋宣稱胡族也為炎黃之胄外³，而

¹ 《晉書》卷一〇四〈石勒載記〉。

² 《晉書》卷一一六〈姚弋仲載記〉。

³ 《史記》〈匈奴傳〉曾載有匈奴夏后氏之後，由是劉淵、赫連勃勃均循此認定乃夏禹

佛教眾生平等、輪迴之說，遂予胡族稱帝提供理論依據⁴，更兼以佛陀本身並非漢人，由是諸草原游牧胡族建立政權者，大多崇信佛教（但間有例外，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以滅佛著稱），至於華北地區被統治之漢人，由於諸胡列國乃至北朝時，由於戰爭不斷，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苦不堪言，而佛家「欲知前生事，今生受者是；欲知來生事，今生作者是。」之說法，遂予痛苦人民繼續求生之勇氣，因此自統治階層之胡族、至被統治之廣大人民，皆傾向崇信佛教，如羯族後趙石勒、石虎之尊崇佛圖澄、氐族前秦苻堅時僧人樂僔開鑿莫高窟（武周時李懷化之〈重修莫高窟佛龕碑〉明指前秦苻堅建元二年樂僔始鑿莫高窟）、羌族後秦姚興之崇信西域高僧鳩摩羅什等，可以證明諸胡族帝王或領階層對佛教之尊崇，至於一般人民，諸胡列國時代缺乏具體數據，至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帝（西元 477 年）起，有較具體數據，茲將自北魏太和元年至北齊、北周之一百餘年（西元 477～581 年），將京城及各地寺廟、僧尼人數表列如下，用以顯示佛教之盛：

朝代	京城寺廟數	全國寺廟	全國僧尼人數
北魏太和 元年（477 年）	平城 100 餘	6478	77258
北魏末（534 年）	洛陽 1367	30000	近 200 萬
北齊	鄴 4000	30000	近 200 萬
北周		10000	近 100 萬

既有如此多之寺廟及僧尼，則可想見必然有更多之人民信奉佛教，在此種大環境之下，一般人民之信奉佛教，乃成爲一種自然現象。

貳、唐初之「國際」態勢

諸胡列國終被鮮卑族拓跋部之魏所統一，至是形成南北對峙局勢，北方雖由拓跋魏所統一，但在其北又有一新興游牧民族柔然崛起⁵，成爲漠

之後，鮮卑族也有類似說法。

⁴ 佛家認爲今生之一切，乃前世之業報，另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二冊曾載有：「佛圖澄見石虎說：你前生是個大商人，曾在西方佛寺設大會，預會有六十個羅漢，我是其中之一，當時有一個得道的人預言道，這個施主（指石虎）後身要在晉地作帝王，現在你果然作了皇帝。…胡人作中原帝王是有根據了。」該書可能爲此間翻印，未列出版書局。

⁵ 柔然，或作芮芮、茹茹、蠕蠕、𧈧𧈧等，至於族屬爲何？向有不同說法，或有認爲係

北唯一強大之政治力量，其力量且一度進入廣義之西域（即今中亞），及至西元六世紀中葉，原為柔然鍛工突厥興起，其酋土門向柔然求娶公主，柔然頭兵可汗大怒，使人罵辱之曰：「爾，我之鍛奴也，何敢發是言！」土門也怒殺其使者，遂與柔然絕；轉而求婚于西魏，時西魏實權操諸宇文泰手中，遂以西魏文帝元寶炬之女長樂公主嫁之，時為西元 551 年，次年土門率軍擊柔然，大破之，柔然頭兵可汗自殺，其子菴羅辰等奔降北齊，土門自稱伊利可汗⁶。從此突厥大盛，北齊、北周爭相貢獻並求與之和親，時突厥木杆可汗之弟他鉢可汗對其臣屬誇稱：「但使我在南兩個兒孝順（指北齊、北周之帝王），何憂無物邪！」⁷於焉可見其時突厥之盛，不僅如此，其西突厥部分更統治今中亞地區，其壯大情況，古匈奴猶未之能比。及隋文帝楊堅於西元 589 年滅南朝陳統一天下後，對突厥仍是無可奈何，且於隋文帝開皇十七年（西元 597 年）以宗室女為安義公主嫁突厥突利可汗（即染干可汗，又稱啓民可汗），三年後（西元 599 年），安義公主死，復以宗室楊諧之女為義成公主嫁突利可汗⁸，既用以維持雙方關係，按其時突厥內部突利可汗與達頭可汗有隙，隋廷此舉亦含有離間突利與達頭間之矛盾，突厥之盛從而可見。

隋末天下大亂，各地方勢力趁機崛起，形成軍閥割據，各地方勢力為增進本身力量，多設法結交突厥，當時李淵為太原留守、河東捕討使等職，隋廷委以邊防重任，惟隋煬帝淫亂失政，且各地勢力割據已然成形，李淵原已心懷「大志」，乃私結突厥，於隋煬帝楊廣大業十三年（西元 617 年）正式起兵反隋，遂遣使突厥卑詞厚飾，稱：「征伐所得，皆可汗有之，必以路遠不能深入，見與通和，坐受寶玩，不營兵馬，一任可汗。」⁹其有求於突厥已難掩飾，時突厥始畢可汗雖未派兵援助李淵，卻

匈奴別種、塞外雜胡、東胡苗裔、與鮮卑同源，甚至認為係西方史料上之阿瓦爾（Avars）者；但以與鮮卑同源較為可信。可參見周偉洲《刺勒與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劉學鈞《五胡史論》台北南天書局，2001 年，P.87～95。

⁶ 《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卷 164，P.5077～78。

⁷ 《周書·突厥傳》。

⁸ 義成公主嫁突厥突利可汗十年後，突利可汗死，其子咄吉嗣立，稱始畢可汗，依俗娶義成公主，至高祖李淵武德二年（西元 619 年），始畢可汗死，其弟俟利弗設立，為處羅可汗，復娶義成公主。

⁹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但此處係轉引自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

派「康鞘利、級失熱特勤達官等送馬千匹來太原互市」¹⁰，李淵對此二突厥使者「愈加敬畏，不失藩臣之禮。」¹¹從此可見李淵起事之初曾向突厥稱臣，此一史實新、舊唐書雖刻意掩蓋未提，但難盡掩後世史家之耳目。

當時中原地區大致情形為竇建德據樂壽、羅藝據幽州、劉武周據馬邑、楊政道據定襄、郭子和據勝州、張長遜據五原、梁師都據朔方、薛舉據金城（其大略位置如附圖），可謂天下大亂。次年（大業十四年，西元



618 年），二月，宇文化及弑隋煬帝於江都；五月，粟特胡王世充擁立隋越王楊侗于洛陽，按稍早李淵得突厥之助西入長安，立隋宗室代王楊侑為恭帝，建元義寧，及王世充立楊侗為帝，建元皇泰，儼然隋廷正統，一時頗有天下歸心之勢，李淵乃廢恭帝自立，國號為唐，建元武德，中原陷入一片戰亂，李唐外得突厥之助，內則李淵次子秦王李世民能征善戰，終於次第削平各地方勢力，統一中原，李淵武德九年（西元 626 年）六月，秦王李世民殺太子李建成及齊王李元吉，八月李淵自稱太上皇，傳位李世

1992 年，P.204。

¹⁰ 同注 9。

¹¹ 同注 9。

民，十月李世民立皇太子中山王李承乾爲太子（此人極度突厥化，後被殺），中原大抵平定，然而仍受北方突厥之威脅，李世民以次年（西元 627 年）爲貞觀元年。

在此前後數年間，廣義之西域也即今中亞錫爾河、阿姆河之間爲西突厥汗國所統治，在西突厥之南及西，則爲波斯薩珊王朝與拜占廷帝國（即東羅馬帝國）角力之舞台。時西突厥爲統葉護可汗，此汗英明有遠略，聯合拜占廷帝國夾擊波斯王朝，獲得大勝，使西突厥汗國疆域大爲擴張，成爲今中亞地區真正之霸主，而唐朝於威服東突厥之後，與西突厥接壤，而唐廷對西突厥汗國所在之廣義西域地理情況並不瞭解，此時玄奘適自天竺學經返回長安，等同攜回有關西域之第一手資料，正是唐廷所急於得到者，按當初玄奘赴天竺取經，唐廷並不贊同，玄奘係私自「偷渡」出敦煌者，如今順利學成返國，時爲唐太宗貞觀十八年（西元 644 年），玄奘乃具有大智慧者，對唐廷主、客觀情勢，均有深入瞭解，且能善加運用，以利推展其佛教信仰。因此玄奘初抵于闐，立即上表唐太宗，告以即將返回長安之消息，李世民畢竟爲一深具謀略之帝王，儘管曾基於某種考量，禁止人民出境，但玄奘私自西出乃既成之事實，如今順利東返，必然攜有西域相關地理、人文資料，而等資料正爲唐太宗大展鴻圖所不可或缺之資訊，因此玄奘之表奏比至長安，唐太宗立即告以：「可即速來，與朕相見。」其急於獲得西域資訊之心情，於焉可知。而玄奘自亦深知宗教設能得到政治之護持，對其發展將有莫大之助益，玄奘更明白「不依國主，則法事不立」¹²，因此唐太宗與玄奘雙方各有所求，遂建立密切之合作關係。

大唐貞觀十九年（西元 645 年），去國十八年往返（西元 627～645 年）均途經西域，終於風塵僕僕返回長安，唐廷特爲之舉辦盛大歡迎儀式，使玄奘充分感受到朝廷對渠之重視與尊崇。據相關文獻記載：玄奘此行共帶回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經律論十五部（或云十四部）、大眾部經律論十五部、三彌底部經律論十五部、彌沙塞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臂耶部經律論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七十二部、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明論三十六部、聲論十三部（或云十二部），共計五百二十夾，六百八十三部（或云 681 部），以及諸多佛

¹² 此處係轉引起季羨林等校注之《大唐西域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出版 P.111。

像，均安置存放長安弘福寺¹³。

參、玄奘其人及其西行

玄奘本名陳禪，洛州緱氏（今河南偃師緱氏鎮）人，自幼天資過人，按魏晉南北朝時，頗多豪門巨族子弟出家為僧，關於洛州緱氏陳家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所載其先世情形如下：「漢太丘長仲弓之後，曾祖欽，後魏（按即北魏，或作拓跋魏，元魏）上覺太守。祖康，以學優仕齊（按即北齊），任國子博士，食邑周南，子孫因家，又為緱氏人也。父慧，英傑有雅操，早通經術。」可見玄奘一家世為儒者，有頗高之學識素識，按信奉佛教凡夫走卒皆可頂禮膜拜，但欲探究佛學，則必得有相當之學識根基，否則難窺堂奧，洛州緱氏陳家具有探研佛學之基礎，陳禪於十三歲時出家為僧，法名玄奘，為鑽研佛學，曾先後問道於景、嚴、空、慧景、道基、寶暹、道震、慧休、道深、道岳、法常、僧辯、玄會等十三位得道高僧，在佛學素養上自是有所增長，然則當時各項漢文佛經，多為諸胡列國及北朝時西域胡族高僧所譯，如佛圖澄、鳩摩羅什（此二僧為後趙、後秦時人），那連提耶舍（西元 490～589 年，北齊時為北天竺人）、闍那屈多（西元 527～604 年，北天竺人，隋時主持譯經）等，此等胡僧於漢文未必能精確掌握，因此所譯之佛經，是否與梵文原典完全吻合，不無疑問，玄奘既有意探究高深之佛學，對當時漢文佛經自是有所疑問，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稱玄奘：「遍謁眾師，備餐異說，詳考其理，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現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此為玄奘向印度探求佛經原典之原因，玄奘於唐太宗貞觀元年（西元 627 年）自長安向西出發，經河西走廊出敦煌，入高昌、阿耆尼、過今中亞碎葉等地，再南下天竺（其往返路線略圖如所附，本圖係摘自《中國文明史、隋唐時期》中冊，台灣地球出版社，P.961。惟其中高昌西方之「阿耆尼」之書字係「耆」字之誤），所經過西域地區，其時皆為西突厥汗國所統轄，正是大唐帝國所急欲瞭解者，玄奘睿智天成，對於唐太宗

¹³ 《大正大藏經》卷五十，P.252 下。但此處係轉引注 12 所列書，P.111。至於大乘經、論、上座部等請參看丁福保、何子培主編《最新實用佛學辭典》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 年出版。



玄奘西行取經路線圖

之心意，自是瞭解，乃以一年時間將往返經歷撰成一書，全書共計十二卷，其中僅卷一及卷十二部分涉及西域，但全書定名為《大唐西域記》，其善於迎合唐太宗心意，於焉可知。

據《大唐西域記》載有從葱嶺以東沿塔克拉馬干沙邊緣綠洲一帶有寺院八百六十、僧侶二萬七千，葱嶺以西今塔什維克及阿富汗至印度之間有寺廟九百、僧侶三萬，據書中統計，西域、印度之寺廟總數約為七千三百，僧侶總數約為二十八萬之眾，其中西域地方寺廟數占總數百分之二十四，僧侶數占總數百分之二十¹⁴。此外，《大唐西域記》記西域各國民情風俗、地理歷史、語言、文字、貨幣、農業、商業、乃至宗教傳說等，對於大唐之欲經略西域自是有莫大之助益。前曾提及突厥大盛於隋唐之際，李淵、李世民初起之時，也不得不暫時向突厥低頭稱臣，然李氏父子莫不深以此為恥，必欲雪之而後快，若欲征服突厥經略西域，必得瞭解西域之

¹⁴ 中村·元等著《中國佛教發展史》台北天華出版社，1984年，上冊 P.294

史地、人文概況，玄奘《大唐西域記》既已殺青進呈，唐太宗自是大感欣慰，佛教也因而受到相當之禮遇（按唐時在宗教上尊崇道教，在學術思想上，推崇儒家），玄奘於進呈《大唐西域記》表時曾有如下之一段話：

「…竊以章亥之所踐籍，空陳廣袤；夸父之所凌厲，無述土風。班超侯而未遠，張騫望而非博。至於玄奘所記，微爲詳盡，其迂辭瑋說，多從翦棄，綴爲《大唐西域記》一十二卷，繕寫如別。…」¹⁵

玄奘所言極是，除保留於《洛陽伽藍記》卷五中之《宋雲行紀》外，堪稱空前之作，而其所載西域諸國之詳細，又超越《宋雲行紀》（關於此一部份如得暇當另爲文敘述）。

肆、從《大唐西域記》看七世紀初之西域

玄奘於唐貞觀元年以犯禁西出，自長安至瓜州有同行者相伴，晝伏夜行，及出敦煌往玉門關取道天山北路之後，已無同行者，一路流沙似河流，天無飛鳥、地無走獸，草木不生，所幸經伊吾至高昌國時，高昌國王麴文泰盛情款待，並饋贈旅行必要之物資、大量之盤纏以及隨從人員（其中必然含有翻譯人員），始能順利進入西域，其往返採不同路線（請參見前所附圖），茲將其所經歷西域諸國分別敘述如次：

一、阿耆尼國

阿耆尼國其地當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焉耆回族自治縣，維吾爾語讀若 Qarasahr or karasahr（意爲黑城），在高昌之西。爲自古已有之西域古國，《漢書》、《後漢書》、《晉書》、《魏書》、《周書》、《隋書》及兩《唐書》均作焉耆；法顯《佛國記》作烏夷、《法顯傳》作烏夷；《大唐西域記》作阿耆尼。玄奘記此國面積爲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其都城周六、七里，其地據近代斯坦因及黃文弼考證，唐時焉耆都城其地約當今焉耆回族自治縣四十里城子（此爲地名）東四里。《西域記》稱其國四面據山，道險易守。其地產糜（即稗，也即稷之別稱）、宿麥、香棗、蒲萄、梨、奈諸果。「文字取則印度，微有增損」，此句經中外學

¹⁵ 《大唐西域記》下冊，P.1053～1054。但《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張騫望而非博」之下爲：「今所記述，有異前聞，雖未及大千之疆，頗窮葱外之境，皆存實錄，匪敢雕華，謹具編裁」下接綴（改稱字）爲…。

者考證，七世紀時焉耆所使用之語言，為甲種吐火羅語¹⁶；玄奘身歷其境，稱其「文字取則印度，微有增損」，則極可能其時阿耆尼國係以印度文字母拼寫吐火羅語，並為適應吐火羅語之特性，對印度文字母有所增減。《西域記》又稱阿耆尼奉行小乘佛教，雖「戒行律儀，潔清勤勵，然食雜三淨¹⁷，滯於漸教矣¹⁸。」

二、屈支國

自阿耆尼國西南行二百里，至屈支國。其地當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克蘇專區庫車縣，此國名見諸兩《漢書》、《晉書》、《魏書》、《唐書》；《新唐書》作丘茲、屈茲；《出三藏記》作拘夷、《梵語雜名》作歸茲；其實均係龜茲¹⁹語 *kutsi* 之不同音譯。西漢時有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設「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卻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二人，卻胡君三人，譯長四人」，屬西域都護府，東漢初為匈奴所控制，東漢和帝劉肇永元三年（西元 91 年），班超立曾在漢廷為侍子之白霸為王，復臣於東漢。西晉（西元 265～316 年）時曾遣侍子入朝，之後中國大亂，諸胡列國併立，前秦時（西元 351～394 年）曾派呂光征西域（事在西元 382 年），呂光曾立白震為王。之後中原失去對龜茲之控制，唐玄奘赴印度途經該處，稱其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餘里；國大都週十七、八里，據考證其都城自漢至南北朝均稱延城，唐時稱伊邏廬城，似為庫車附近之皮郎舊城。《西域記》載其農產品有糜麥、粳稻、蒲萄、石榴、梨、柰、桃、杏；地下礦物則有黃金、銅、鐵、鉛、錫等。氣候溫和，民風樸實，文字也採印度字母稍作增減以拼寫龜茲語。但其國善管絃音樂，優於西域諸國，按前秦苻堅使呂光征西域時，曾將龜茲樂人及樂器

¹⁶ 吐火羅語經中外學者研究，可分為甲、乙兩種，甲種通行於天山之北，又稱焉耆語，乙種通行於今新疆中部及南部，又稱庫車（龜茲）語，詳見法·謝閣蘭·伯希和等著，馮承鈞譯《中國西部考古記、吐火羅語考》，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另王欣《吐火羅史研究》中國社科出版社，2002 年等書。

¹⁷ 三淨，係指三種淨肉，即一.不見其為我殺者；二.不聞其為我殺者；三.無為我殺之疑者。此為小乘佛教之戒律。

¹⁸ 漸教，指初淺階段之佛教。

¹⁹ 龜茲，讀若丘慈。

帶回涼州，此爲龜茲（庫車）音樂傳入中國正史之最初記載，自有其歷史意義，在涼州龜茲樂與漢人傳統及其他北方游牧諸胡族音樂混融後，形成風格獨特之西涼樂，盛行於北魏、北齊乃至隋唐，唐時十部音樂中，即有龜茲一部（此處部作隊解）。其著名樂師有曹妙達（北齊時）、蘇祇婆等，唐時諸多曹姓樂師多爲曹妙達同族之人，可見西域音樂對中國影響之大。《西域記》記此國人服飾錦褐，斷髮巾帽，市面上使用金錢（也即金幣）、銀錢、小銅錢。此國有佛教寺廟百餘所，僧侶五千多人，也爲小乘佛教，習俗與阿耆尼同。諸胡列國（即一般文獻所稱之五胡十六國）時之佛圖澄即爲龜茲人，而鳩摩羅什雖爲印度人，但生於龜茲，爲胡漢佛教交流之傳奇性人物，至今仍有頗多佛經爲鳩摩羅什所譯。

《西域記》載在屈支國東某座城北有祆教寺廟²⁰，廟前有一大池，傳說有諸多龍，該等龍能變形，與牝馬交配，遂生龍駒（傳說在青海湖之海心山也有類似傳說，是否來自西域，待考。）龍戾難以駕馭，必待龍駒生子，始能馴馭，故此國盛產良馬，玄奘聽此國故老提及稍早有一王名曰金花²¹，政教清明，感動池中諸龍，願爲此王駕車，此王臨終時以鞭蹠觸龍耳，龍即潛入池中，至今不復出現。池中諸龍時有變作人形，與婦女交合，生子特爲驍勇，奔跑之快有如駿馬，年代一久，此國之人幾皆爲龍種，恃力作威，不服王命，國王乃聯合突厥人殺入城中，無論少長殺戮殆盡，如今此城已然荒廢。從此可見玄奘到龜茲時，該地已爲突厥所掌控。

在上述荒城之北四十餘里，背山隔河有二伽藍（寺廟），均名昭怛釐²²，一居東一居西，遂稱之爲東、西昭怛釐，其中佛像莊嚴之裝飾，可謂巧奪天工，僧侶謹守清規戒律，極爲虔誠。東昭怛釐寺佛堂中有玉石一塊，面廣二尺許，帶黃白色，其形狀如海蛤，其上有佛陀足印，長一尺八寸，寬六寸許，每逢齋戒之日，此佛陀足印，發出光芒。

²⁰ 祆教係源於波斯瑣羅亞斯德教傳入中亞，復經中亞傳入中國，初稱天教，唐時特造祆字，以稱此教，詳見劉學鈔《祆教摩尼教從中亞到中國》一文，文載《中國邊政》第166期，中國邊政協會出版，2006年6月

²¹ 金花似指龜茲王蘇發勃駛，此王唐高祖李淵時，曾遣使來朝，《唐書·龜茲傳》曾記此事，按蘇發勃駛之正確讀音爲 *suvarnapuspa*, *suvarna* 梵文其意爲金，*puspa* 其意爲花；玄奘蓋採意譯，可參見《大唐西域記》上冊 P.58~59。

²² 昭怛釐或作雀離、雀梨，要皆 *Çākūri* 一音之諧譯。

在此大城西門外道路左右各有立佛一尊，高九十餘尺（按唐時一尺約等於今二十二、三公分，較今尺稍短），每五年於此像前有大會場舉行盛大齋會，此項大法會即無遮大會，係梵文 *pañcaparisad* 或 *pañcavrsiñāparisad*；音譯為般闍於瑟或般遮婆栗史迦、般遮跋利沙、般遮婆瑟、般遮越師，一般均譯之為無遮大會，會期長達數十日，舉國僧侶來集會，可見七世紀初龜茲係崇信佛教之地區。

自無遮大會場向西北渡河之後，至阿奢理貳伽藍，此寺廟之名當係庫車語（即龜茲語）*aṣari* 之音譯，其意為奇特，故《西域記》自注「唐言奇特」，關於此寺興建原由，頗具傳奇性，《西域記》稱傳說此地古時有一王崇敬三寶²³，欲遊覽四方尋訪佛祖聖跡，遂命同母弟攝知國事，其弟受命攝政，但自行去勢，並將割下之勢裝入金盒，交給國王，並稱俟國王返國之後，始可開啓，國王乃將此盒交付隨同出遊者保管。及至國王雲遊回國後，果有小人向國王構陷王弟淫亂後宮，國王自是大怒，欲處王弟以嚴刑，王弟乃請王開啓金盒，既開金盒，乃見斷勢，王弟遂稱：國王前此雲遊，命我攝政，恐有流言，故割自明，現果受構陷，請國王明鑒。從此國王兄弟情愛更深，可自由出入後宮，不加禁止。某日，王弟遇一人牽五十牛欲行去勢，王弟以身受腐刑，形同廢人，不忍此五十牛再遭此刑，遂以財寶贖買此五十牛，由於此項善行，其已去之勢，竟然逐漸再生而復原，由於已經完全恢復男兒身，從此不再進入後宮，並將經過情形，詳向國王稟告，國王認為此曠古未有之奇事（奇特），乃在其地建阿奢理貳（意為奇特）伽藍（寺），此寺庭宇寬敞，佛像雕工精緻法相莊嚴，僧侶信徒均極虔誠肅穆，吸引四方信眾前來禮佛。此項傳說至少透露出：一.此地奉佛之虔誠；二.此地男女之防甚嚴，後宮穢亂更是絕無之事；三.宣揚佛家善有善報理念。從此也可知七世紀初西域東端諸綠州地區一般民情禮俗，與漢人社會相去不遠。

以上玄奘所經歷之阿耆尼（焉耆）、屈支（龜茲、庫車）係西域東端之二綠洲國，在七世紀之前，係吐火羅（*Tugar*，或譯為吐噶爾）四國之二（另二國為高昌及天山北路之別失八里）²⁴，而屈支（庫車）更為吐火

²³ 三寶，佛教用語，稱佛、法、僧為三寶。

²⁴ 克林凱特（Hans-Joachim Klimkeit）《絲綢古道上的文化》，趙崇民譯，賈應逸審

羅文化之中心，曾為佛教重鎮，其佛教藝術帶有濃厚之印度色彩，但以其地東接河西走廊，不免也受到中原佛教藝術之影響，茲舉一例以為說明，如庫車克孜爾石窟中之飛天壁畫，呈現濃厚之印度風味，但稍晚之庫木吐拉石窟中之飛天壁畫，即呈現出敦煌石窟壁畫風格，（茲將該二飛天壁畫摹本附圖如後，該二圖係摘自注 24 所引書 P.168 及 175）



克孜爾石窟之飛天



庫木吐拉石窟之飛天

從所附二飛天壁畫中，極易看出兩者有極明顯之差異，西域東端實為中西文化交流融會之地區。事實上早在西元 158 年之前，已有中國人移居庫車，甚至更早在西元前 65 年，庫車國王絳賓即曾親自前來中國²⁵；按西元前 65 年係西漢宣帝劉詢元康元年，《漢書·渠犂傳》載此事稱：

校，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4 年 P.165。

²⁵ 劉茂才《庫車及其與中國的關係》，但此處係轉引自注 24 所列書，P.169。

「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宣帝）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而龜茲王絳賓，元康元年，遂來朝賀。」

至於西元 165 年，係東漢桓帝劉志延熹八年，在庫車曾發現撰於當年（西元 165 年）之一篇漢文銘文，其內容大意為：有一批來自中國之人，除軍墾移民外，亦從事文化傳播如手工藝或藝術工作，可見西域東端自古即與中國有相當之來往，惟《西域記》中對此點似未著墨，頗為怪異，此或玄奘在屈支（庫車）停留時間甚短，未及遍訪各地遺址。

三、跋祿迦國

自龜茲西行六百餘里，至跋祿迦國，此地約當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克蘇市之溫宿縣，此處漢代古籍作姑墨、亟墨，唐時作撥換，元代漢文文獻作八里茫。此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其大都城周五、六里；其地土宜、氣序、人性、風俗、文字、法則均與屈支（龜茲）同，僅語言少異，有佛教寺院數十所，僧徒千餘人，奉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從跋祿迦西北行三百餘里，渡過沙磧即至凌山，此山為葱嶺之北端，《西域記》對凌山有相當深入之描述，越過此山大約四百里至大清池，亦即熱海，所謂熱海，並非其水高溫，而是相對凌山高寒，而其水不凍，遂稱熱海，至於唐代邊塞詩人岑參曾以〈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一詩，詠熱海情況，其詩曰：

「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海上眾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且肥，岸傍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雲遙旋滅。蒸沙爍石然虜雲，沸浪炎波煎漢月。陰火潛燒天地鑪，何事偏烘西一隅。勢吞月窟侵太白，氣連赤坂通單于。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見夕陽海邊落。柏臺霜威寒逼人，熱海炎氣為之薄。」²⁶

詩中對熱海之形容，言過其實，此乃文人誇張描繪，不足為憑，惟至少說明中國內地對西域熱海並不陌生。玄奘於《大唐西域記》對熱海之敘述則為：「周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四面負山，眾流交湊，色帶青黑，味兼鹹苦，洪濤浩汗，驚波汨忽。」則為身歷其境之描述，至於「龍

²⁶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P.2051。

魚雜處，靈怪間起。所以往來行旅，禱以祈福。水族雖多，莫敢漁捕。」以一千多年前對自然界之認知作此敘述，並不為過。

自熱海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此城或作素葉城、碎葉城，位於碎葉（或作素葉）水（今作楚河）而得名，碎葉水《新唐書·西域傳》、《唐書·突厥傳》作細葉川，源於天山，由朱瓦納魯克與科奇科爾兩河匯合而成，向西北流，消失於穆雲庫姆沙漠之中，全長 1067 公里。素葉水城（或作素葉、碎葉城）其地約當今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托克馬克城西南八公里處之阿克—貝西姆遺址，七世紀初，西突厥汗國汗庭曾移設於此，唐高宗李治調露元年（西元 679 年），此處已納入大唐版圖唐將王方翼改築此城，一度成為安西四鎮之一，因此必有甚多漢人移居此地，相傳大唐有詩仙美譽之李白，即誕生於此城。《西域記》稱此城周六、七里，諸國商胡²⁷雜居也，其地宜糜、麥、蒲萄。

在素葉城以西尚有數十綠洲中之孤城，各城均各有首長，雖則互不統屬，但皆役屬於突厥。



四世紀粟特文殘卷

四、宰利地區

《大唐西域記》指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名宰利。所謂羯霜那國，下文當詳述之，而所謂宰利者，《後漢書》作粟弋，《北史·西域傳》作粟特（按《北史·西域傳》摘自《隋書》）即西方文獻之 Soghdiana，係指今中亞錫爾河、阿姆河間昭武九姓諸綠洲國家²⁸，號為九

²⁷ 商胡即胡商，唐時習以商胡稱之。

²⁸ 關於昭武九姓，可參看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姓，實則有十餘綠洲國家，玄奘總稱之爲粟特地區，對此地共同部分作一總敘，言其語言文字，則稱之爲粟利語文，其文字係拼音文字，字母有二十餘個，據考證「顯然屬於中古伊朗語文系統，然導源於古阿拉米（Aramair）字母。」²⁹此等古阿拉米字母共有二十二個，此種粟特文字曾向東流傳到中國西部，如甘肅敦煌之西長城烽燧出土之「粟特書簡」，即屬於西元四世紀時之粟特文字，此項粟特文書簡現藏英國博物館，今從相關書籍³⁰中找到此項四世紀時之粟特文殘卷，特影印如上頁，以供參，從圖片上看，此種粟特文似爲直行，據季羨林先生等校注之《大唐西域記》卷一頁七十五指出「粟特文有從右向左橫寫者，也有自上而下豎寫向右移行者」季氏等指出此係根據格倫貝克（K.Gr φ nbech）《印度藝術和文字》（Indian Art and Letters）xx11/2，頁 1-7。粟特文草書至八世紀時完全定型。

《西域記》稱粟特地區均使用此種文字，師徒依次傳授，從未間斷。至於粟特地區人民之衣著，以獸毛、粗麻布、毛皮及細棉皮爲之，上下衣均頗短小合身（不似中國之寬袍大袖）；髮式則頭頂多剃去，或全剃光，然後以彩色絲帶纏於頭上。其人雖然身軀高大，但膽識頗小，風俗澆薄，彼此詭詐，大多數人貪求財物，雖親如父子，也必加計較。人之貴賤，但憑財富多寡，雖擁有萬貫家財，衣食仍極節省，經商與務農各居其半。關於中亞粟特人好利，《唐會要》卷九九〈康國〉條也明載：「深目高鼻，多鬚髯，生子必以蜜食口中，以膠置手內，欲其成長口嘗甘言（也即甜言蜜語），持錢如膠之粘物。習善商賈，爭分銖之利。男子二十即送之他國，來過中夏，利之所在，無所不至。」兩《唐書》也有類似記載。

五、窣利（粟特）地區之城市

自素葉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此城方圓二百餘里，有泉池千餘故名千泉，水土沃潤，林樹扶疏。由千泉向西行一百四五十里，至咀邏私城，

出版，劉學鈔〈昭武九姓與唐朝之關係〉文載《中國邊政》第 164 期，中國邊政協會出版，2005 年 12 月。

²⁹ 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上冊 P.75。

³⁰ 此圖摘自日人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論》（外一種）耿世民譯，北京中華書局 2005 年，P.126。

此城位於坦邏斯河畔，地當今哈薩克斯坦共和國之江布爾城，惟今名塔拉斯之城，已移至江布爾東南偏東八十公里處，貞觀年間玄奘經過此城，為文獻中最早記載此城者，並稱此城周八、九里，為諸國商胡雜居之所，顯見此城於七世紀初已成為東、西貿易城鎮，並為西突厥汗國所管轄，及至唐玄宗李隆基開元末（開元自 713 至 741 年），為黑汗汗國爾微特勤居此城，為疏勒鎮守使與拔汗那王攻破，唐玄宗天寶十年（西元 751 年），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曾率軍與大食（即阿拉伯）會戰於此城，高仙芝大敗，大唐帝國勢力從此退出中亞，可見此城有其戰略意義。九世紀時為突厥與回教徒通商要地，西元 893 年，為穆斯林勢力所征服，蒙古成吉思汗西征後為察合臺汗國所轄，後入於帖木兒帝國，西元 1405 年，帖木兒欲伐中國，親率四、五十萬大軍，東進至此城，結果病死此城。

從坦邏私城西南行二百餘里，至白水城，此城在《突厥語辭典》作 Isbijab，在波斯阿拉伯語中其意為白水，該辭典並指出此城又名 Sayram，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中之賽藍城，在中世紀為錫爾河中游主要城市及最大商業中心。

由白水城西南行二百餘里，至恭御城，此城當在錫爾河支流 Chirchir 河與 Angren 河流域，但確係何地，今已不可考，據《西域記》稱此城周五、六里，原隰膏腴，樹林蓊鬱。

六、西域諸國

自白水城向南行四、五十里，進入錫爾河、阿姆河間之河中地區如笈赤建國，茲分別敘述如下：

1. 笈赤建國

玄奘《大唐西域記》稱此國周千餘里，地沃壤、備稼穡、草木鬱茂、華果繁盛、多蒲萄、城邑數百，各別君長，進止往來，不相稟命，總稱之為笈赤建國。按笈赤建國，《新唐書》稱「新城之國，在石城（即後世所稱之塔什干）東北羸百里，有穹室羯城，亦曰新城，曰小石國城，後為葛邏祿所併。」（《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考其地望約當今塔什干地區之汗阿巴德。據《西域記》之描述，可知其地宜於農業。

2. 赭時國

玄奘行至赭時國時，已進入昭武九姓諸綠洲國家之範圍，按赭時《魏

書、西域傳》³¹作者，《隋書》稱石國；杜環《經行記》稱石國一名赭支；《新唐書》作柘支、柘析。以上諸稱實皆爲音譯，此國都柘析城，元時稱察赤，其地當今塔什干，考其意仍爲石城。

按昭武九姓諸綠洲國家，據兩《唐書》所載，係秦漢之際原居於昭武（其地約當今甘肅臨澤）大月氏之後裔所建，其時月氏兩度受匈奴、烏孫所迫，初西徙今天山北伊黎河一帶，復再西遷今中亞錫爾河、阿姆河兩河流域諸綠洲，建立國家，念其祖先來自昭武，故以昭武爲姓（請參見注28所引文獻），赭時即石國，乃其中之一，昭武九姓之中以康、石兩國爲大，而康國更爲諸國之宗主。

復按數千年前，有高加索種之民族、或云即印歐語系之白種人，其中一支或若干支系，自裡海以北之草原，向東遷徙，進入今中亞草原，大部分停留今中亞草原，成爲後日之粟特人或吐火羅人，另有一部分更向東遷徙，越過帕米爾高原，沿途在天山南路諸綠地區定居，更有一部分再向東移，而及於今甘肅西境敦煌、祁連之間，此即秦漢時之月氏族，其既係高加索種，因此其體質特徵自與蒙古利亞種有所差異，其體質特徵爲「深目高鼻多鬚髯」³²；月氏雖已西徙，但仍時爲匈奴所征討，至有被擄東來成爲匈奴一部者，中亞語言中稱能征善戰之勇士爲柘羯，被匈奴擄來者類皆青壯能戰之士，稱之爲「羯」人，使其居今山西某地，稱之爲「羯室」（實爲赭時之音轉），後人不察，以爲羯族原於羯室，羯族體質特徵，據《晉書載記》稱石勒之子石生之容貌爲深目高鼻多鬚，正與中亞康國人相同，筆者曾斷諸胡列國（即一般文獻所稱之五胡十六國或五胡亂華）時之羯族石勒爲中亞赭時國人之後裔³³，石勒建有後趙，如是可知赭時早在漢時已與中原有來往、交流。

《西域記》稱赭時疆域千餘里，西臨葉河，此河當即今之錫爾河，赭時東西狹、南北長，土宜氣序，同笈赤建國，城邑數十，各有君長，既無總主，役屬於突厥。

³¹ 按《魏書、西域傳》早佚，以《北史、西域傳》補之，而《北史、西域傳》係引錄自《隋書、西域傳》。

³² 《隋書》卷八十三〈康國傳〉。

³³ 關於赭時與羯族，參見劉學鈞《五胡史論》台北南天書局，2001年，P.34～37。

3. 怖捍國

怖捍國在赭時東南千餘里，此國《史記》、《漢書》、《晉書》作大宛國，《魏書》作破洛那、《隋書》作鑠汗、《新唐書》作拔汗那，後命名為寧遠國。考其地望在今中亞費爾干納（Farghana）地區，位於錫爾河上游，由北面 Cotkal 山脉、南面阿賴山脉所圍成之盆地，西漢時張騫曾到達此地。

4. 宰堵利瑟那國

由布捍西行千餘里，至宰堵利瑟那國，按此國位於錫爾河之南，地當費爾干納盆地西部出口處，於阿拉伯勢力進入之前，此國地跨札納夫香（Zarafshan）河兩岸，也即在薩馬爾汗與忽占之間。《西域記》載其國周千四、五百里，土宜風俗，同赭時國，自有王，七世紀初，附於突厥。由此國西北進入大沙漠，越過沙漠至颯秣建國。

5. 颯秣建國

颯秣建國，《魏書》作悉萬斤、《隋書》作康國、《新唐書》作康國及薩末鞬，其地當今薩馬爾汗一帶，《西域記》稱其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國大都城曰颯秣鞬城，城周二十餘里，地當今中亞薩馬爾汗以北三公里半之高地上，本名 Afrasiab，面積約 218.9 公頃，約建於西元六世紀，其內城之東門稱「中國門」（引自季羨林等校注之《大唐西域記》上冊，P.88）可見其與中國有頗密切之關係。颯秣建國為昭武九姓諸國之首，《西域記》稱：「凡諸胡國，此為其中，進止威儀，近遠取則。」又稱：「其王豪勇，鄰國承命，兵馬強盛，多諸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視死如歸，戰無前敵。」此赭羯之人，《新唐書·西域傳》〈安國條〉稱：「募勇健者為柘羯。柘羯，猶中國言戰士也。」此正印證本文赭時國條所指其為諸胡列國時後趙羯族石勒一系之由來。

6. 弭秣賀國

自颯秣建東南行至弭秣賀國，也即漢文史料所稱昭武九姓之米國，此國周四、五百里，考其地望，可能位於今布哈拉至那色波大道上之某一村鎮，其土宜風俗同颯秣建，據季羨林等考證，玄奘可能並未親臨米國，而係得自傳聞。自此國北行至劫布坦那國。

7. 劫布坦那國

此國即漢文史料中之曹國，亦昭武九姓之一，據《北史》、《隋書》〈西域傳〉載：「曹國，都那密水（即今札拉夫香河）南數里，是康居之地也。」《新唐書·西域傳》稱：「西曹者，隋時曹也，南接史及波覽，怡瑟底痕城。」以是曹國當在今烏孜別克共和國薩馬爾汗東北。唐高祖李淵武德年間（西元 618～626 年），遣使往來，至唐玄宗李隆基天寶元年（西元 742 年），曹國王哥邏僕羅遣使獻方物，唐封之為懷德王。《西域記》稱：此國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

8. 屈霜你迦國

自劫布咀那國西行三百餘里，至屈霜你迦國，此國漢文史料作何國，亦昭武九姓之一，《北史》、《隋書》均見其名，《新唐書·西域傳》稱：「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其故址在今烏孜別克共和國薩馬爾汗西北之卡塔·庫爾干。隋煬帝楊廣大業年間（西元 605～618 年）曾「遣使貢方物」，唐太宗李世民貞觀十五年（西元 641 年）曾「遣使者入貢」，高宗李治永徽時（西元 650～655 年），「以其地為貴霜州，授其君昭武婆達地為刺史。」可見其時為唐之藩屬。此國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自此國西行二百餘里，至喝捍國。

9. 喝捍國

喝捍國漢文史料作東安國，又作喝汗，位於札拉夫香河之北，即波斯文《世界疆域志》中之 Kharghankath，故址當今烏孜別克共和國薩馬爾汗西北。從此國西行四百餘里，至捕喝國。

10. 捕喝國

捕喝國即漢文史料中之中安國，《新唐書·西域傳》又作布豁，又指出：「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謂忸蜜者。」按捕喝即布哈拉（Bukhara）之對音，其意為「人文薈萃之地」，另說為拜佛之地，也即佛教寺院之義，可見西元七世紀初之前，其地佛教之盛，故地當今烏孜別克共和國布哈拉，土宜風俗同颯秣建。自此國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

11. 伐地國

伐地國即漢文史料中之西安國，《新唐書·西域傳》作戊地國，又注稱「唐言西安國」今名拜城（Betik），其故址位於今札拉夫香河下游一支游傍，西去布哈拉約五十五公里，古稱畢國，為布哈拉前往呼羅珊阿木

勒渡口必經要道。八世紀時此地繁盛至於頂點，與隋、唐在商業經濟上有密切關係。在此國西南五百餘里，有貨利習彌加國。

12. 貨利習彌伽國

《新唐書·西域傳》作貨利習彌、火尋、過利，指其為康居小王奧鞬城故地，考其地望約在今阿姆河下游密子打干（Mizdakhkan）一帶，西元八世紀前後為阿拉伯所征服。據稱此地可能為瑣羅亞斯德教（傳入中國後稱祆教）「聖書」《阿維斯陀》產生之故鄉。

13. 羯霜那國

自颯秣建西南行三百餘里，至羯霜那國，此國在漢文史料稱史國，羯霜那既為國名，也為城名，為昭武九姓諸綠洲國之一，《隋書》、《新唐書》作佉沙，《明史》作渴石，要皆阿拉伯—波斯語 Kass 之音譯，城址在薩馬爾汗南七十五公里處。唐高宗李治顯慶三年（西元 658 年）置為佉沙州，以其王昭武失阿喝為州刺史，尋又恢復傳統羯霜那國名，此國地當大食（阿拉伯）向兩河地區擴張孔道，而能矢忠於唐，為唐屏障，可見其與唐關係甚為密切。其歷代國君忽必多、斯謹提等，皆受唐征召，卓立戰功，唐玄宗開元末（開元，西元 713～741 年）改其國名為來威國，天寶初大食勢力北進，而唐救兵不來，遂亡於大食。《西域記》稱此國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沿山東南行三百餘里入鐵門。

按鐵門為西突厥汗國之西界，《西域記》稱：「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有狹徑，加之險阻，兩傍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又以鐵錮，多有鐵鈴，懸諸戶扉，因其險固，遂以為名。」考其地望當今 Shahr-i Salz 以南九十公里，為布哈拉或薩馬爾汗前往巴里黑必經之要衝。出鐵門即至覩貨邏國故地。

14. 覩貨邏國故地

按覩貨邏，《魏書》作吐呼羅，《隋書》、《唐書》作吐火羅，《新唐書》作土豁羅。覩貨邏不僅為國名，也為地名，更為民族之名，如吐火羅人。《西域記》稱其地「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阨葱嶺，西接波刺斯（舊稱波斯，即今之伊朗），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縛芻河即烏澹水，今之阿姆河，也作嬌水），自數百年王族絕

嗣，酋豪力競，各擅君長，依川據險，分爲二十七國。」此玄奘敘述覩貨邏故地時，指明此地共有二十七國，但就《西域記》卷一及卷十二（回程時經過）共有二十九國，可見二十七國之說，未必正確。西元七世紀初，玄奘西行時，覩貨邏故地各綠洲國家，均役屬於西突厥汗國。《西域記》稱此地「氣序既溫，疾疫亦眾」，又稱其地諸國「語言稍異諸國，字源二十五言，轉而相生」，經考證此諸國所用文字並非天山南麓、塔里木盆諸綠洲國家所用之吐火羅字母，而爲源於希臘之二十四個字母，另加「sh」音值之字母，共爲二十五個，以拼寫其語言³⁴。

15. 覩貨邏十六國

玄奘赴印度去程經覩貨邏故地經十六國，列《大唐西域記》卷一，回程時復經覩貨邏另十三國，茲將去程所經覩貨邏十六國綜合敘述如次：

甲、十六國名稱：咀蜜、赤鄂衍那、忽露摩、愉漫、鞠和衍那、鑊沙、珂咄羅、拘謎陀、縛伽浪、忽憐、縛喝、銳秣陀、胡寔健、咀刺健、揭職、梵衍那及迦畢試國（實爲十七國）。此十七國考其地望約當今烏孜別克共和國南部、土庫曼共和國東南部及阿富汗東部，此一地區即古稱之覩貨邏故地。此十七國詳細方位，季羨林等校注之《大唐西域記》注中均有說明，於此不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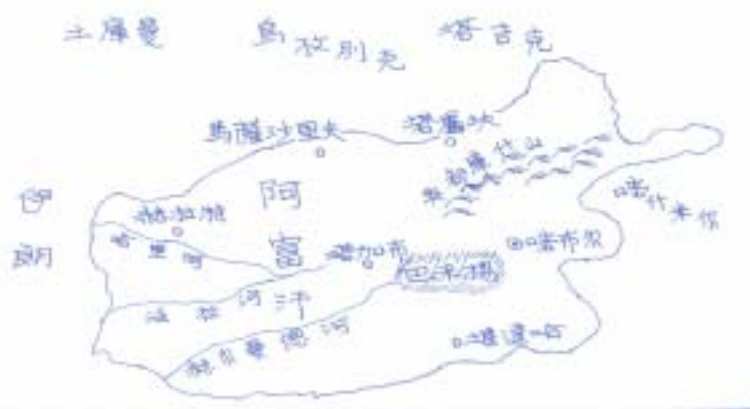
乙、此諸國多爲佛教攝化地區，有頗多伽藍（佛教寺廟），其中頗值一提者有：縛喝國小王舍城外之納縛僧伽藍，傳說此僧伽藍爲縛喝國先王所建，其中有毘沙門天王像³⁵，伽藍中並有無數珍寶，突厥葉護可汗之子肆葉護可汗，欲奪取寺廟中之珍寶，遂派勁旅圍攻寺廟，夜間軍隊屯駐郊野，肆葉護可汗夜夢毘沙門天王曰：「汝有何力，敢壞伽藍？因以長戟徹胸背，可汗驚悟（意爲驚醒）。」由是可汗便覺心痛，遂將夜夢之事告知屬下，並急忙派人延請高僧以便向毘沙門天王表示懺悔之意，惟高僧尚未

³⁴ 季羨林等校注之《大唐西域記》，上冊，P.103。至於吐火羅語（文）經中外學者研究，可分爲甲、乙兩種，甲種通行於天山之北，又稱焉耆語；乙種通行今新疆中部及南部。詳見法、謝閣蘭、伯希和等著、馮承鈞譯《中國西部考古記、吐火羅語考》，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王欣《吐火羅史研究》中國社科出版社，2002年等書。

³⁵ 毘沙門天王，又名多聞天，爲四天王之，中國則稱之爲四大金剛，原爲印度國土守護神，保護北方，守護東方者爲持國天，西方者爲廣目天，南方者爲增長天。合稱四大天王。

來到，肆葉護可汗已然一命嗚呼。此則傳說對於禁止眾生不可侮慢佛菩薩及宣揚佛法，均具有積極意義。《西域記》中又稱此伽藍內南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斗餘，雜色炫耀，其材質非金非石，另有佛牙³⁶，其長寸餘、廣八九分，色黃白，質光淨。另有迦奢草（一種茅草，可作坐具，掃帚等）製成之佛掃帚，長二尺、圍約七寸，其把手以雜寶飾之，以上三樣寶物，每逢六齋³⁷。復稱此伽藍西南有一精廬，業已建造多年，眾多善修行者多聚集於此，其中頗多證得四果³⁸而成爲羅漢，此等羅漢於入寂時均會顯示神通，眾人遂爲之建立佛塔（窣堵波），此種佛塔現已有數百座矣，至於證得聖果而未顯示神通者，也有一千多人，目前伽藍中有僧侶百餘人，正在夙夜匪懈苦修之中。

離開覩貨邏國境後進入梵衍那國，按此國係從梵語形成 Bamiyana 蛻化爲 Bamiyan，中世紀波斯語作 Banikan，後代多作巴米揚，《西域記》稱其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文字風教，貨幣之用，同覩貨邏國，語言少異，儀貌大同。淳信佛教，特異鄰國，上自三寶（指佛、法、僧），下至百神，莫不輸誠竭心宗敬。有伽藍數十所，僧徒數千人，宗學



小乘說出世部。此國王城東北山阿，有立石佛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

³⁶ 佛教世界相傳釋迦牟尼火化時，全身均化爲細粒型舍利，唯牙齒不損，稱佛牙舍利。

³⁷ 其時佛教徒認爲每月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此六天，爲四大天王伺察人間善惡及惡鬼窺伺人間之日，故人們需諸事謹慎，奉行過午不食之戒，此六天稱六齋。

³⁸ 四果，指佛教徒修習「聖果」之四階段，一、須陀洹果，二、斯陀含果，三、阿那含果，四、阿羅漢果。阿羅漢果，指已斷盡一切見思二惑，上至非想處，達到聲極乘果者，從此永入涅槃，不來生三界。涅槃，指不寂不滅。

晃曜、寶飾煥爛。按此一立佛即聞名於世之巴米揚大佛，此佛約在西元四世紀，以浮雕手法從整片岩壁中雕鑿而成，玄奘於七世紀途經巴米揚（梵衍那）時曾親見此佛，尙是金光曜眼，此一佛像不僅早於中國之敦煌莫高窟，其佛像之壯偉也勝雲崗石窟，爲佛教偉大藝術作品，也爲人類偉大文化遺產，惜乎於 1998 年，阿富汗塔里班揚言一旦攻入巴米揚，必以現代化大砲將大佛轟毀，終於在西元 1998 年三月九日此一人類珍貴文化遺產，毀於塔里班火藥之下化爲灰燼，所附圖片爲砲火摧毀前巴米揚大佛之雄姿，其中頭部係歷盡一千多年風霜日晒自然風化脫落，二十餘年前，印度專家曾加以修補，從圖片兩傍鑿孔穴用以搭梯可以直抵洞窟中佛像頭部，然而如今佛像被摧毀，此景只能成爲回憶。前此曾見報載聯合國相關組織，對此頗爲重視，有意出資加以修復，不知後續情形如何發展。



巴米揚大佛

《西域記》稱：「東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伽藍東有鑰石（鑰即銅，石係漢語所加）釋伽佛立像，高百餘尺。」此釋迦佛立像，係分段鑄造，然後再行結合而成。巴米揚城東二、三里處，有一伽藍，其中有佛入涅槃臥像，長千餘尺，其規模之大，頗難想像。距此臥像伽藍東南二百餘里處，又有一伽藍，此座寺院珍藏佛牙與世界初形成時之獨覺齒³⁹，此

³⁹ 獨覺，係梵文 *pratyeka-luddha* 之意譯，又作緣覺，音譯辟支佛。佛教認爲在上古無

外尚有金輪王齒、阿難弟子商諾迦縛娑羅漢⁴⁰所用之鐵鉢等佛教珍貴遺物，可說是遍地佛蹟，在西元七世紀時作如此認定，實無可厚非者，縱是二十一世紀之今日，在宗教領域內，若干看法或信徒之認定，仍然不宜以科學態度對待。

《西域記》指出迦畢試國都城三、四里，北山下有一大伽藍，即質子伽藍，其地當今小山，命名為力士山，有僧徒三百餘人，為小乘派佛教，據當地長老稱：昔時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⁴¹威名遠播，時有河西地區小王國懾於其聲威，遣子入質，迦膩色迦對之照顧有加，並依季節於三處不同地點，為其建造三座伽藍，供其居住，玄奘所親臨之質子伽藍即其夏季住處，居處牆上尚留有此質子之畫像，《西域記》稱畫像中之質子無論容貌或服飾，與中國頗為類似；後質子返歸本國，仍時懷念此伽藍，經常送來供佛物品，而質子伽藍僧徒也常為質子祈福，至今不絕。相傳伽藍佛院東南大門南大神王像右足下，為質子埋藏珍寶之處，此等珍寶原為維持寺院開支所留，數年前，遠處有一貪婪凶暴之國王，想盜取此一珍寶，即在將挖取時，大神王王冠上之鸚鵡突然狂拍雙翅且大聲鳴叫，大地為之震動，此貪婪之國王及士兵俱驚嚇臥地不敢動彈，待平靜之後，趕忙向神像謝罪而去。在寺院北嶺有石室數間，相傳為質子靜修禪定之所，據稱其中也藏有奇珍異寶，由藥叉守衛⁴²，如有欲偷取其中寶物者，此藥叉神將顯現各種兇猛野獸如獅子、蟒蛇、毒蟲等，使想偷寶者驚嚇而退。以上兩則係玄奘得自當地耆老之傳說，如以今日眼光看之，實為極精彩之靈異小說題材，如有善於屬文者，加以演繹，其可讀、可看性將不次於天方夜譚。在此石室以西之大山嶺上，有一尊觀自在菩薩像⁴³，傳說如信徒虔誠膜拜，

佛之世，已修行成功，能覺悟而離生死者，稱之獨覺。

⁴⁰ 羅漢或作阿羅漢，係梵文 Arhat，巴利文 Arahan 之音譯，為小乘佛教理想中修得高果位者。其義有三，一.阿羅意為賊，漢意為殺，小乘佛教中視貪、嗔、癡等煩惱為賊，必須殺除此等煩惱（賊），二.應供，應受眾生供養。三.無生，不受生死輪迴。

⁴¹ 迦膩色迦王，係貴霜王朝之名王，貴霜王朝在漢文史料中均稱之為大月氏王朝，蓋其先係大月氏族為匈奴、烏孫所逐西徙中亞，威服大夏後所建之王朝，傳至迦膩色迦時，篤奉佛教國力大盛，其疆域包括中亞、阿富汗、克什米爾及中國之喀什噶爾、和闐、莎車、乃至印度之旁遮普、信德及北方邦一帶地方。其時為西元前二世紀左右，時為世界著名大國。

⁴² 藥叉，或作夜叉，為印度神話中半神之神靈，為財神之隨從。

⁴³ 觀自在為梵文 Avalokitesvara 之意譯，即吾人習稱之觀世音菩薩，後為避唐太宗名

觀自在菩薩將現身給予以慰藉，此即所謂心誠則靈，浙江普陀山似也有相同傳說。

另在大城東南三十餘里，有遏邏怛羅僧伽藍，寺傍有一佛塔，相傳在齋日期間或會放出光芒，塔身有時會有流出黑色香油，夜間有時會流瀉出美妙樂音，據當地耆宿稱此寺院乃昔時此國大臣曷邏怛羅所建，廟既建成，曷邏怛羅於夜夢中有人告以：“汝雖建成宰堵波（佛塔），但其中並無舍利，明日將有人獻上舍利，應向國王請求將所獻舍利供養於此佛塔中。”次日果然有人持舍利瓶前來，曷邏怛羅便著該人先行進宮稟報，而自己替該人持舍利瓶在宮等候，其間惟恐國王不捨將舍利賜予，竟自行將舍利瓶携往佛塔，由於誠意感動上蒼，佛塔頂之石覆鉢自行開啓，急將舍利瓶放入塔中，此時國王果然不捨，派人前來欲取回舍利瓶，但佛塔石覆鉢已經合攏，不過卻將曷邏怛羅衣襟夾住，因此佛塔始流出黑色香油。類此神佛顯靈故事，在各宗教中並非不罕見，中國頗多傳奇故事，顯然受到佛教影響。

丙、仍有少許外道

《大唐西域記》記載迦畢試國時，雖稱其國敬崇三寶，有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但仍有不信佛教之外道（佛教稱己身為正信，其他宗教為外道），《西域記》稱其國有天祠數十所，異道千餘人，此等「異道」實即流行於印度之耆那教⁴⁴，耆那教徒或習於赤身裸體，但自稱著有「天衣」，或以灰塗身，或以死人之頭骨為帽上之裝飾品，就中國社會習慣觀之，頗為怪異。惟至今印度仍有耆那教徒。

丁、覩貨邏故地之人文概況

覩貨邏故地十餘國其人文概況，《西域記》稱其人「容貌鄙陋，粗知信義，不甚欺詐。」此種描述尤其「容貌鄙陋」一語，失之主觀，蓋容貌美醜，甚難有客觀標準，以己度人，實不相宜。

戊、覩貨邏故地均為突厥勢力範圍

諱，簡稱觀音菩薩，為阿彌陀佛之左脇侍，與右脇侍大勢至菩薩合稱西方三聖。在佛教傳說中觀音菩薩為解救苦難眾生，而不願成佛。

⁴⁴ 耆那，其意為戰勝情欲者。耆那教或作尼犍多，其意為：從塵世之束縛中得解脫者，耆那教相傳為伐彈摩那大雄所創，實則僅為該教大教長之一。至今印度仍有該教信徒，崇拜牛及男根。

西突汗國威震中亞，諸覩貨邏故地綠洲國家，均臣服於西突厥汗國，而忽露摩國及愉漫國之王，且爲奚素突厥人，從而可知研究中亞史，突厥族乃不可或缺者。前述二國前者有伽藍二所，僧徒百餘人，後者有伽藍二所，僧徒寡少，當爲佛教不甚發達之國，也從而可以推論西元七世紀初時西突厥汗國對佛教信仰並不十分虔誠；前文提到縛喝國之納縛僧伽藍有無數珍寶，突厥葉護可汗之子肆葉護可汗欲奪取寺廟中珍寶竟派勁旅圍攻寺廟，可見其並不禮敬三寶。另據《續高僧傳》卷十二〈道判傳〉載僧人道判一行於北周武帝宇文邕保定四年（西元 564 年），行至西突厥汗所時，遭到如下之不禮貌待遇：「…彼土不識僧眾（指不認同佛教），將欲加害，增人防衛，不給糧，又不許出拾掇薪菜（掇，音奪，意爲摘取、拾取），但令餓死。」從此可見西突厥汗國至少在玄奘西行之西元七世紀初，突厥人並不信奉佛教，或較保守說法，並不虔誠信奉佛教。按西突厥汗國統治地區，其東部多仍崇信傳統之薩滿信仰，阿姆河、錫爾河之所謂河中地帶，諸昭武九姓綠洲國家，多爲祆教、佛教兼信地區，並以祆教爲重，自阿姆河以南向東南以至印度，則以佛教爲重，但居最高統治階層之突厥人，起初並不禮敬三寶，但以阿姆河流域及其南之覩貨邏故地諸綠洲國家，皆爲虔誠之佛教信徒，爲便於統治，西突厥汗國南部地區統治者（突厥人）至西元八世紀後，亦漸轉而信奉佛教。關於此一部分，可參看蔡鴻生〈突厥奉佛史事辨析〉此文列蔡氏所著《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一書頁一四四至一八五（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及薛宗正《突厥史》第十章第三節〈突厥文化薩滿教與佛教〉頁七二四至七三八（中國社科出版社，1992 年）。

《大唐西域記》自卷二至卷十二皆爲記敘印度者，不在本文範疇，至卷十二，記述玄奘東返所經各國，其中幾皆爲西域地區（含中亞及天山南路），茲分別介敘如次：

16. 漕矩吒國及弗栗特薩儼那國

漕矩吒國及弗栗特薩儼國，此兩國均在今阿富汗境內，前者位於阿富汗東部，後者在阿富汗喀布爾流域。前者即《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下謝颺條所稱：「謝颺居吐火羅西南，本名漕矩吒，或曰漕矩。」《隋書》則簡稱之爲漕國。《西域記》稱漕矩吒國人性輕躁，情多詭詐。

以玄奘出家人與人爲善性格，而有此描述，當必有所本。又述此國「文字言辭，異於諸國，多飾虛談，少成事實」，按此國玄奘經過時，爲西突厥汗國所統治，據《新唐書》稱：「國中有突厥、罽賓、吐火羅種人雜居。」因此其語言極可能爲多種言之混合，而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也稱：「土人是胡，王及兵馬，即是突厥。」⁴⁵可知其地語言之複雜性。漕矩吒國崇信印度婆羅門教娑那天⁴⁶，據稱此天神性情剛烈，信之邀福，不信必得禍，因此無人敢於違逆此神，信徒對此神所供養佈施之金銀，遍置寺院各處、羊馬佈滿山谷，無人敢予覬覦。弗栗恃薩儻國土宜風俗，同漕矩吒國，其王也突厥人。

17. 覩貨邏故地諸國

前此玄奘經覩貨邏故地部分綠洲國家，前往天竺，後自天竺東返復經覩貨邏故地另一部分綠洲國家，《西域記》卷十二分別敘述此等綠洲國家，計有安咀羅縛國、闊悉多國、活國、菴健國、阿利尼國、遏邏胡國、訖栗瑟摩國、鉢利曷國、呬摩咀羅國、鉢鐸創那國、淫薄健國、屈浪拏國、達摩悉鐵帝國等，此等覩貨邏故地諸國幾皆役屬於西突厥汗國，其活國之王且爲突厥人⁴⁷，其地曾先後爲吐火羅、嚙唃、突厥所統治，呬摩咀羅國雖衣氎皮褐，頗同突厥，但「其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同歧），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亡，除去一岐。舅姑俱沒，角冠全棄。」就此點而言，也似襲自嚙唃，吾人可自陽銜之《洛陽伽藍記》⁴⁸卷五〈城北〉，其中載有嚙唃國之習俗，稱其王妃「頭帶一角，長八尺，奇長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之，入坐金牀，以牙白象四獅子爲牀，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似有角…」（《洛陽伽藍記》頁二八八）。可見其爲嚙唃習俗之遺留，應爲合理之推論。但七世紀初，既爲西突厥汗國所統治，染有突厥風尚，也屬不可避免者，故此

⁴⁵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P.93，唐時所謂「胡」已有專指西域各民族而言之意，故有「土人是胡」之記載。

⁴⁶ 娑那天爲婆羅門教天神之一，意譯爲福樂，據稱此天神天性剛烈，信且膜拜之，則得福，不信則必加禍。

⁴⁷ 活國其地當今 Doshi 河與 Talaqan 河匯合處，今昆都士（Qunduz）附近。

⁴⁸ 陽銜之或作揚銜之，該書台北華正書局及廣文書局均曾出版，但以華正版有諸家注釋較好。1980年四月出版。

部分覩貨邏故地諸綠洲國家之文化習俗呈多元型態，至今情況似猶如是。

在宗教上此一地區於西元七世紀初，大致上為佛教所涵化，但其既處於印度西北，阿姆河東端，無可避免曾受到婆羅門教、祆教之影響，如《西域記》稱達摩悉鐵帝國之都城為昏馱多城（其地約當今瓦罕山谷潘札水南岸沖積扇上之 Khandud—見季羨林等注之《大唐西域記》卷十二，頁九七七），「此國之先，未被佛教，但事邪神。」可知在佛教傳入前，曾有其他宗教傳佈其間，《西域記》曾敘述一極具傳奇性之故事，以彰顯佛法之神奇，詳見季羨林等校注之《大唐西域記》頁九七六（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出版），此處不予贅引。

18. 尸棄尼國、商彌國

玄奘既離達摩悉鐵帝國，東行經尸棄尼國及商彌國，此二國文字均同覩貨邏國，惟語言有異，經季羨林等考證，今尸棄尼地方所通行之語言，為東伊朗語族中之帕米爾方言中之 Chalcha 方言，由於位處崇山峻嶺之中，故其語言保有較多古代特徵。而商彌地區語言，以其位處伊朗語族與印度亞利安語族接壤地帶，故其語言保有此二語族之特徵，將商彌語言稱為 Dardic 語，今認定其為印度亞利安語族之一支脈。《西域記》稱商彌國「其王釋種也，崇重佛法。國人從化，莫不淳信，伽藍二所，僧徒寡少。」既是「崇重佛法，國人從化，莫不淳信」，何以僧徒寡少？或因其地過於貧瘠，無法供養僧侶？

19. 竭盤陀國

商彌國東北即世界屋脊帕米爾高原（《西域記》作波謎羅川，《漢書》作葱嶺，《新唐書》作播蜜川），越過帕米爾，至竭盤陀國，此國在漢時稱蒲犁國，據《漢書·西域傳》稱其王治蒲犁谷，有侯、都尉各一人，人口五千。《洛陽伽藍記》作漢盤陀國、《唐書》作渴盤陀；其地約當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蒲犁縣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按突（厥）回（紇）語稱石為塔什（Tash），塔、堡為庫爾干（qurgan），《西域記》稱其「國大都城基大石嶺」，正是塔什庫爾干（石堡或石塔）之本意，此城背靠徒多河（今葉爾羌河）。此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周二十餘里，其國人民為印歐語系之塔吉克人，也為中國境內唯一高加索種（即習稱之白種）民族。關於此國建國始末，有一極富意義之傳說，《西域記》載其建

國傳說茲錄之如次：

「今王淳質，敬重三寶，儀容閑雅，篤志好學。建國已來，多歷年所，其自稱云是至那提婆瞿咄羅⁴⁹。

此國之先，葱嶺中荒川也。昔波利刺斯國王娶婦漢土，迎歸至此。時屬兵亂，東西路絕，遂以王女置於孤峯，極危峻，梯崖而上，下設周衛，警晝巡夜。時經三月，寇賊方靜，欲趣歸路，女已有娠。使臣惶懼，謂徒屬曰：“王命迎婦，屬斯寇亂，野次荒川，朝不謀夕。吾王德感，妖氛已靜。今將歸國，王婦有娠。顧此爲憂，不知死地。宜推首惡，或以後誅。”訊問諠譁，莫究其實。時彼侍兒謂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會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馬會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歸必見誅，留亦來討，進退若是，何所宜行？”僉曰：“斯事不細，誰就深誅？待罪境外，且推旦夕。”於是即石峯上築宮起館，周三百餘步。環宮築城，立女爲主，建官垂憲（意爲設立官職，建立法制），至期產男，容貌妍麗。母攝政事，子稱尊號。飛行虛空，控馭風雲，威德遐被，聲教遠洽，鄰域異國，莫不稱臣。其王壽終，葬在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中。其屍乾腊，今猶不壞，狀羸瘠人（其意狀如瘦弱之病人），儼然如睡。時易衣服，恒置香花。子孫奕世，以迄于今。以其先祖之世，母則漢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種，故其自稱漢日天種。然其王族，貌同中國，首飾方冠，身衣胡服。後嗣陵夷，見迫強國。」（《西域記》頁 984～985）

從上項建國傳說中，能明顯看出塔什庫爾干地區塔吉克人之源頭係來自日神與漢人女子相結合而後子孫繁衍成竭盤陁國，此項傳說不必然爲歷史事實，但至少在西七世紀時甚或之前頗長時期（傳說中有「建國已來，多歷年所」句），塔什庫爾干地區已盛傳塔吉克人與漢人相融合之歷史故事，至少象徵塔、漢兩族交流有其長久之歷史淵源。

竭盤陁國後代王族，受強鄰欺凌，逐漸衰微，傳至無憂王時（非西元前三世紀印度孔雀王朝之無憂王，兩者名雖同，但相差約六百年），有咄

⁴⁹ 至那提婆瞿咄羅，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作脂那提婆瞿咄羅，爲梵文 *cina-deva-gotra* 之音譯，其意爲「中國與天神之種」，也即日神（太陽神）與中國（漢人）女子相結合所繁衍子孫而成此國。

又始羅國高僧童受論師，爲當時佛教界四大尊者（時傳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受，被譽四日照世），無憂王爲欲邀童受前來弘法，乃興兵伐呾叉始羅國（其情頗類《高僧傳》稱前秦苻堅欲邀龜茲高僧鳩摩羅什到長安弘法，命大將呂光率兵伐西域），終將童受邀到，無憂王已身遷往王宮東北角，而將王宮讓予童受，此童受論師能日誦經三萬二千言，且能同寫三萬二千字。之後更爲其起造伽藍，名之爲童受伽藍，可見其時此地佛法之盛。竭盤陀國大都城（今塔什庫爾干）東南行三百餘里，有一大石崖，中有二石室，各有一羅漢圓寂於其中，據傳已有七百餘年，肉身並未腐壞，仍然端坐如體弱之人，且鬚髮仍會生長，因而僧人每年均爲其修剪鬚髮，並爲之更衣，是耶？非耶？或許此正是佛曰：不可說。

20. 烏毘國

玄奘翻越葱嶺後到達烏毘國，此烏毘國考其地望約當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莎車（當葉爾羌河岸塔里木盆地西沿）與英吉沙之間，但包括莎車在內（莎車又稱葉爾羌），其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其國土地肥沃，稼穡殷盛，花果具繁，且產諸色玉石，七世紀時仍爲佛法鼎盛地區。玄奘途經此國時，曾聽聞一項「羅漢出定神變傳說」，頗具傳奇意味，由於原文頗長，此處不加贅引，如有興趣可翻閱北京中華書局版《大唐西域記》頁九九二～九九三。

21. 佉沙國

自烏毘國城西大山北行，越山磧曠野五百餘里，至佉沙國（佉，音區），此佉沙國，玄奘自注云：「舊謂疏勒者，乃稱其城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底。」按此國自漢至唐皆作疏勒，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稱「外國自呼名伽師祇離國。」（見該書頁一五三），按疏勒乃漢時舊國，爲其時所謂西域三十六國之一，地當東西交通要衝，爲北道上樞紐，由此西踰葱嶺，可達大宛、康居、奄蔡；向東沿北山波可入玉門、陽關而至長安。西漢時其王治疏勒城（其地當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州喀什市），《漢書·西域傳》稱其時：「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臣貢於西漢，西漢在其地置：「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及至東漢時，大爲發展，《後漢書·西域傳》記載疏勒國：「領戶二萬一千，勝兵三萬餘人。」較之西漢時無論戶

數或兵員，均呈十倍以上之增長，已成西域強國，由於其地位處東西交通要衝，乃兵家必爭之地，以是無論嚙嚙、西突厥、吐蕃無不興兵前來欲爭奪此國。北魏時（西元 386～534 年，如含東、西魏則分別止於 550、551 年），疏勒及西域諸綠洲國家均臣服於嚙嚙，西元六世紀下半葉起，突厥強大，復又役屬於突厥。唐太宗時吐蕃興起，唐高宗李治儀鳳年間（西元 676～679 年），吐蕃破其國，及至唐玄宗開元十六年（西元 728 年），始遣大理正喬夢松攝鴻臚少卿，冊疏勒阿摩支裴安定為疏勒王，但至唐玄宗天寶十二年（西元 753 年），突厥則以女妻疏勒首領裴國道，可見唐與突厥均在爭取疏勒，惟據舊《唐書·疏勒傳》稱突厥嫁女之事在太宗貞觀年間（西元 627～649 年），至貞觀二十年（西元 646 年），西突厥乙毗射匱可汗遣使向唐乞婚，並要求割龜茲（今庫車）、于闐（今和田地區）、疏勒、朱俱波（今葉城）、葱嶺（今塔什庫爾干地區）五國為聘禮，唐太宗同意，可能當時唐廷考慮力不如西突厥，不得不同意，但次年，唐將郭孝嵩、阿史那社爾等率軍破龜茲之後，疏勒始歸屬唐朝，但此後仍時服時叛。

其後，唐廷為經營西域，將疏勒、于闐、龜茲、碎葉設為安西四鎮，其中疏勒處於關鍵地位。西突厥、吐蕃、大食，不時前來爭奪，唐廷為保衛其地，也竭盡其力。至唐肅宗李亨上元（西元 760～762 年）中，設疏勒都督府。可見疏勒在唐代時已為中國領土，至於喀什噶爾（Kashgar）一名，元代以後始見使用，《元朝秘史》⁵⁰作乞思合兒、《元史·世祖本紀》作可失合兒、《明史》作哈實哈兒。

22. 斡句迦國

自疏勒東南行五百餘里，渡過徙多河，越大沙磧，至斡句迦國。此國《後漢書》作子合國，又作西夜國；《魏書》作朱居波，又作悉居半；《新唐書》作朱俱波或朱俱槃。要皆 *cukupa* 之音譯，其地約當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葉城縣，維吾爾人稱之為哈爾噶里克（Karghalik，其意為有烏鴉之地。其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其國處於群山之中。《洛陽伽藍記》即稱「人民山居，五穀甚豐，…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見

⁵⁰ 此書始見於《永樂大典》作《元朝秘史》，但敘事僅至窩闊台，其時元朝尚未建立，因此現代頗多學者稱之為《蒙古秘史》。

該書頁二七八），《西域記》稱此國文字同瞿薩旦那國（指今新疆和田地區），《洛陽伽藍記》則指明「文字與婆羅門同」⁵¹，玄奘途經此國時尚見有伽藍數十，但多已毀壞。在國之南部大山山崖，有一石窟，傳說印度佛教徒修得果人者⁵²，多運用神通到此石窟，以是有頗多阿羅漢到此圓寂，因此有頗多佛塔（窣堵波）。現即有三阿羅漢已入滅心定境界，形如病弱之人，但鬚髮仍在生長。並稱此國所藏有大乘經典之多，為所有佛教國家所無法比擬者。

由此國而東，踰嶺越谷，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

23. 瞿薩旦那國

瞿薩旦那即《漢書》以至《新五代史》各正史均作于闐，但《史記》作于闐，要皆于闐文 Khotana 之音譯⁵³，漢時其王治西城，故地當今新疆和田縣。其地多桑麻、水果，產玉，俗知禮義，人性溫恭，國尚樂音，人好歌舞。王姓尉遲氏，信佛教，西漢通西域後，屬西域都護。東漢初，廣德為漢將，曾擊敗莎車，勢力頗為壯大，東漢和帝劉肇永元六元（西元 94 年）隨班超聯合其他西域綠洲國家擊敗焉耆，漢魏之際，并戎盧、扞彌、渠勒、皮山等國，成為西域大國。西晉時封其王為「晉守侍中、大都尉，奉晉大侯、親晉于闐王」。南北朝時屬北魏，隋煬帝楊廣大業（西元 605～618 年）中，曾多次遣使朝貢，唐貞觀末於其地置于闐鎮，為安西四鎮之一。《新唐書》卷一一〇有傳，稱于闐於「天寶（西元 742～756 年）中入朝，獻名玉良馬，玄宗以宗室女妻之，授右威衛將軍，毗沙府都督，歸國與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擊破薩毗、播仙。」後晉高祖石敬瑭於其天福三年（西元 938 年）封于闐王李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石敬瑭本身即為中亞石國之族裔，因此筆者認為渠乃諸胡列國時羯族之遺胤），契丹族建立遼帝國後，於其地設于闐國王府，北宋時（西元 960～1125 年）屬喀喇汗王朝，並改宗伊斯蘭教。按北魏時（西元 386～534 年），柔然（或作茹茹、蠕蠕等）稱雄於西域後有頗多于闐人逃入北魏境內，歸依北

⁵¹ 婆羅門原為印度四種姓最高之種姓，意譯為淨行，此處泛指印度，也即指梵文。

⁵² 果人，佛教中指修行得證果位者，謂之果人，果人有三類：一.佛、二.辟支佛、三.阿羅漢。

⁵³ 《絲綢之路文化大辭典》王尚壽、季成家主編，北京紅旗出版社，1995 年，P.73。

魏，聚居於今山西大同（時稱平城，為孝文帝遷洛前之北魏國都），遂成為北魏之尉遲部。唐初名將尉遲恭（敬德），若探其族源，實出於于闐。

于闐國也有其建國傳說，《西域記》載有此項傳說，充滿宗教神話，其大意略為：起始此國空曠無人，毘沙門天⁵⁴居住於此。後無憂王太子於咀叉始羅國被挖去雙目後，無憂王一怒之下，將輔臣官僚流放到此國西部，便被推為首領。同時，東方有一王子也被貶斥到此國東部，群臣乃勸其自立為王。惟此東西兩國並不往來。某次於打獵時二王相遇，互爭何人始是大王，幾至決裂，乃有人勸其擇期決戰。既至決戰之日，兩軍相對，旗鼓相當，既經交鋒，東部之王大勝，並將西部之王斬首，東部王乘勝前進，為安撫全國百姓，欲將國都遷到國土中央，希望能找一通曉地理之人提供意見，以便營造國都。此時有一塗灰外道，背一盛滿水之胡蘆前來見國王，自稱通曉地理，並將胡蘆中水灣灣曲曲傾倒落地，繞行多圈後，此外道飛跑以致消失，於是遂循水跡建造城邑，以為國都，雖不高峻，但卻從未有人能將之攻下。歲月飛逝國王已到垂暮之年，惜無子嗣，遂向毘沙門天祈禱求嗣，遂在天神指引下，自神像前額剖出一男孩，全國百姓額首稱慶，惟此男嬰不願飲乳，恐其不能成長，又向神祠祈請天神養育，結果神像前丰地突然隆起，形如乳房，男嬰吮吸此乳房泌出之乳汁，終於長大成人，既已成人，智勇過人，聲威及教化傳播遠方，由於係由地乳所撫育，遂以地乳為國號⁵⁵。從此項建國傳說中，充分顯示瞿薩旦那國（即于闐）無論民族血緣或文化習俗，均包含東、西兩方面，換言之，于闐之民族或文化實為東、西兩方面之融合體，無論在民族史或文化史上均具特殊意義。

《大唐西域記》於瞿薩旦那（于闐）記載頗詳，言其王城南有毗盧折那伽藍，為該國先王為毗盧折那阿羅漢所建⁵⁶，其大意为闡明瞿薩旦那國信奉佛教之經過，充滿神話色彩。另有多項富傳奇性之傳說，茲舉麻射僧伽藍及蠶種傳入于闐之傳說，《西域記》載于闐王城東南五、六里有麻射

⁵⁴ 毘沙門天為古代印度施福之神，漢文譯為多聞天，佛教奉為四天王之一，為守護北方之神，在古代和闐，奉毘沙門天和闐保護神。

⁵⁵ 于闐也作瞿薩旦那（kustana, Gostana），其意為地乳。

⁵⁶ 毗盧折那阿羅漢，毗盧折那為梵文 vairocana 之音譯，或書作毗盧遮那、毗盧舍、毗盧施，意譯為遍照。

僧伽藍，爲于闐國先王妃所建立。昔時于闐國並不知種桑養蠶之事，據聞東國有養蠶之業，此東國顯然指東方漢人國家，也即中國，但中國將蠶種及養蠶抽絲視爲機密，因此于闐國雖遣使求蠶種，均無法得到，其後于闐國乃卑辭下禮，向東國求婚，東國君王爲懷柔遠方，遂應允以公主嫁之，于闐王乃命使者前往迎娶公主，並命使者私下對公主說明，于闐國向無絲棉桑蠶之種，設法帶來，以便縫製衣裳。公主聽得此言，遂私下秘密桑蠶種子藏於帽上棉絮之中，行至邊境城關時，對所有送嫁者均嚴加搜索，唯獨不敢搜索公主衣帽，公主從此進入于闐國先至後來要建造在城外麻射僧伽藍之地稍作停頓，待一切婚嫁禮儀備妥後，奉迎入宮，桑蠶種子遂留於城外，來年春天乃植桑樹，蠶卵孵出幼蠶，遂有養蠶一事，起初桑樹尚未成長，公主（也即于闐王妃）暫以其他葉子餵蠶，一段時日之後，桑樹葉已茂密成蔭，自是以桑葉養蠶，並展開蠶絲業，王妃規定不准殺傷蠶蛾，必須俟蠶蛾飛走之後，始可治繭繅絲，如有違犯，神明將不予保佑，隨後並爲蠶神建造麻射僧伽藍。直至玄奘於七世紀行經該國，仍有不准殺死蠶蛾之習俗，如有暗中私下殺蛾取絲之事，來年即無法順利養蠶。此項自中國透過和親公主，將蠶種私自帶出之傳說，吐蕃也有之，無非證明漢人與西域文化交流之歷史事實，彌足珍貴。

伍、結語

中國對西域（含廣狹兩義之西域，也即今中亞及天山南北）之探索，據文獻所載早在周穆王（西元前 976～922 年）即已揭開序幕⁵⁷，及至西漢武帝時（西元前 140～前 87 年），復有張騫通西域，東漢（西元 25～220 年）再有班超通西域，兩《漢書》均有西域傳，由是對西域有一概括之認識，東漢季世天下大亂，三國鼎立，稍後雖有西晉之暫短統一，不旋踵，北方諸胡族紛紛起而建立政權，前後有二十餘政權，其間雖有氏族苻

⁵⁷ 見《穆天子傳》，此書於晉武帝司馬炎太康二年（西元 281 年），發戰國時汲縣魏安釐安王塚而得此書，同時得者尚有《竹書紀年》、《汲冢周書》，晉時郭璞專於此書，惜乎千餘年來均無人繼之。此書稱「乙亥至於焉居、禹知之平」，此禹知據考證即月氏，也有學者認《穆天子傳》仍小說家之言，惟張星烺於其《中西交通史料匯編》一書中嚴加駁斥，見張著第一冊 P.89，此書首印於 1930 年，2003 年北京中華書局再版。

堅之前秦（西元 351～394 年）派呂光征伐西域，但僅及於天山南路，北中國之混亂局面，至鮮卑族拓跋所建之魏王朝（史稱北魏，拓跋魏，元魏或後魏，西元 386～534 年）始統一北中國，直至北魏後期，始有宋雲、惠生等赴天竺取經，經過狹、廣義之西域，歸著《宋雲行紀》一書，惜乎此書早佚，幸北魏晚期有陽銜之（或作楊銜之）者，著有《洛陽伽藍記》一書，其卷五部分，收錄有《宋雲行紀》大部分資料，為現存最完整之宋雲天竺取經途經西域之有關記載，也為中國僧侶旅行西域最早之文獻，中外學者曾有多人為之作注，此書應為漢文史料最早、最詳細記載西域史事之著作，研究西域（含中亞）史事者，自應加以閱讀。

之後，唐初三藏法師玄奘赴天竺取經，也途經狹、廣義之西域，並至印度，前後歷時十八年，於唐太宗貞觀二十年七月，由玄奘口述，辯機筆錄整理，書成，定名為《大唐西域記》，從書名即可知此書不無配合唐太宗欲開拓西域之用心，也為中國第一部詳述西域及南亞次大陸一百十八個國家及由聽聞而得二十八個國家之史地、民情風俗、傳說等情況之巨著，不僅在國史上號稱空前，在世界學術領域中，也占重要地位。

《大唐西域記》於十九世紀已有法文及英文譯本，二十世紀初復有英文重譯本，而日本對此更不後人，計有如下譯本及注釋本：堀謙德：《解說西域記》，1912 年東京；小野玄妙譯《大唐西域記》，列入《國譯一切經》史僧部一六，1936 年；足立喜六《大唐西域記の研究》二冊，1942-1943，東京；水谷真成《中國古典文學大系、大唐西域記》東京，1972 年，其中頁 435～452 解說大唐西域記；野村耀昌譯《大唐西域記》列《國譯一切經》史傳部十六上，東京，1983 年⁵⁸。之後德國、蘇聯也相繼出版德文、俄文本，此外若干國家更專門成立《大唐西域記》研究會等學術文化研究社團，各國學者幾皆認為此書涵蓋面既廣，在敘述上不僅客觀且極詳細，近代若干考古學家且根據此書之記載，進行考古發掘，往往獲得極大之成就，可見此書所記載者，幾皆為事實（其中若干神話傳說除外，不過以七世紀時，人類之智識而有該等傳說，乃是極自然之事，不足為病），此為該書特值稱道者。

⁵⁸ 以上請參見宋強譯《大唐西域記》台北商周，2005 年，P.266。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P.136。

按玄奘自唐太宗貞觀元年（西元 627 年）自敦煌西行，經天山北路，經罕利地區、覲貨邏故地，再向南入印度，在印度停留十餘年，於貞觀十九年（西元 645 年）返回長安，次年即完成《大唐西域記》一書，距其出發時所經之西域東端及河中地區，業已十餘年之久，設若玄奘沿途未逐日詳作筆記，錄其所見所聞，如單憑記憶，復經十餘年歲月之銷磨，不可能完成該書，是則可知《大唐西域記》一書實為一部精心巨著，也可印證中國民族為一重視歷史流程、忠於載錄史事之民族，由於漢文史料記載翔實，周邊國家、民族也因而獲益良多。如印度史家阿里（Ali）即曾直言：「如果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⁵⁹足證此書之價值。

西域，無論狹義、廣義之西域，向為神秘之地域，自信仰而言，自最早期泛靈之薩滿信仰之後，無論佛教（中國之有佛教，即為自西域傳入）、瑣羅亞斯德教（或作祆教）、摩尼教、基督教中之某些支派以及伊斯蘭教，均曾成為西域各民族之主要信仰，但最後則以伊斯蘭教為主，許多佛教遺跡慘遭破壞，設無《大唐西域記》對西域佛教史事巨細靡遺加以記載，則佛教傳佈西域，或則僅成為一件幻覺而已，如是則《大唐西域記》在人類宗教史上，自有其不可磨滅之貢獻。

近年來中亞（也即廣義之西域）脫離俄羅斯後，各自獨立，但世界強權若美、俄、中、日莫不多方設法欲立足中亞，冀圖影響甚至控制中亞，對於狹義之西域（也即指天山南北），西方強權也亟思從中製造問題，可見西域在今日世界仍是一極具政治意義之地區或話題，但任何問題絕非突然出現，如是則研究中亞或新疆問題，必得自歷史中尋求，始能發現問題之根本所在，如中亞各民族之形成、其民族性格為何？…類似此等問題如不先行研究，則對一切現象，均僅為表象問題，絕對無法作深入之瞭解。如是則研讀如《大唐西域記》等歷史文獻，自有深遠意義。

（本文於 2006 年 7 月 1 日投搞，於 2006 年 8 月 1 日審查通過）

⁵⁹ 轉引自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P.137。

新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一根木柴難引火，一個巴掌拍不響。（土家族）

國家富強，百姓康樂、國家遇難，百姓遭殃。（白族）

雜花開的地方草藥多，群眾多的地方智慧多。（彝族）

有水才有魚，無水就無魚；有民才有官，無民官不存。（黎族）

石沙裡有金子，眾人裡有聖人。（土族）

星多夜空亮，人多智慧廣。（鄂溫克族）

人多能搬山，蚊多挖穿山。（瑤族）

水沿著水渠流，人隨著眾人走。（滿族）

驕傲來自淺薄，狂妄出於無知。（東鄉族）

毡袋子灰塵多，淺薄人傲氣大。（門巴族）

五指不齊，人心難同。（維吾爾族）

牛聚集多，易得牛糞；人聚集多，易起糾紛。（侗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中國疆域問題與中國邊疆學理論建設之關係

吳楚克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目前，中國邊疆理論研究正在朝著創建“中國邊疆學”的方向努力。從傳統的“邊政學”向“邊疆學”發展，顯示出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結構的變化，而這個變化正為中國邊疆學理論的建設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無論如何，一個新興學科的產生和發展都是客觀研究對象和社會意識要求的必然反映，因此，每一位真正的理論研究工作者都應該關心和推動這項事業。本文從中國邊疆學學科架構的思維方法和理論原則角度，討論中國疆域問題與中國邊疆學的關係，以期獲得正確的判斷和有益的經驗。

一、中國疆域問題是中國邊疆學建設的“入口”

從理論研究的傳承角度講，中國邊政學與創立中的中國邊疆學還有一定的內在聯繫，但由於起始於 20 世紀 30 年代的中國邊政學於 1949 年後就在中國大陸學科領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在經過了 20 餘年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之後，大部分在這個領域從事研究的學者同仁們認識到創建中國邊疆學的緊迫性和重要性。顯然，中國邊疆學不是傳統中國邊政學的續接，也不是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推演，而是一個全新的復合交叉學科，它的特點是移植了民族學、政治學、歷史學和政治地理學的必要範疇，組成一個具有實證研究對象的新學科體系。當然，在如今像此類交叉復合組成的新學科並不鮮見，重要的是如何正確地把握創建學科的時機和“切入點”，也就是準確認識學科理論的“入口”，將是創建中國邊疆學的前提。

視中國疆域問題為創建中國邊疆學理論的“入口”，不僅僅是邊疆史地研究的理論直覺，也不是傳統“邊政學”理論脈絡的承繼，而是中國疆域問題本身所包含的多重理論和實踐價值所決定的。“中國疆域問題”是

有關中國疆域研究領域的概稱，正如“中國民族問題”是中國民族問題研究領域的概稱一樣，它已經成爲一個有固定含義的概念。中國疆域問題之所以是建設中國邊疆學的“入口”，其主要觀點有：

第一，任何一門學科理論誕生之前，其理論的發生歷史早就以其他分支學科或理論形態而存在，所以，當人們總結這門學科產生的歷史時，都會從其內在邏輯角度闡明相關源起或支系。這種經驗科學的規律被人們用來反推新興學科產生的邏輯起點，並成爲一種哲學的思維方法。據此，在追溯中國邊疆學的邏輯起點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中國疆域問題就最具有典型性和貫穿性，也就是帶有“點”和“面”兩個特徵，這是作爲學科起點問題的基本條件。

第二，中國疆域問題所包含的知性範疇主要有：首先它是一個歷史問題，中國疆域形成史，或說中國邊疆歷史，或說中國古代疆域經略史，基本都是圍繞著疆域問題展開探討的。然而，疆域問題並不僅僅是個歷史問題，在歷史研究的範圍內人們發覺並不能根本解決疆域問題時，中國邊疆學的產生就具有了理論意義。其次它是一個政治問題，中國近代條約制度、中國跨界民族問題、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中國邊防管理制度，都與中國疆域問題有直接的關係。但從政治學角度研究中國疆域問題，人們同樣發現它不能完全用政治學原理得到解釋。其三它還是一個民族問題，中國疆域形成史與中國各民族發展史在多數情況下是重合的，研究中國疆域歷史不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發展史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國疆域問題是中國邊疆學這個複合交叉學科的交叉點，而在此之前，從民族學、歷史學、政治學角度研究中國疆域問題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規模，並成爲中國邊疆學的基礎。如中國歷代疆域形成史、中國邊疆政治學和中國民族史都已有多種成果問世。

第三，中國疆域問題的研究是貫穿中國邊疆學始終的論題。中國疆域問題既是政治的也是民族的，既是歷史的也是現代的，它是中國邊疆學科下各方面研究都必然涉及的基本問題。從目前看，我們的探討仍然集中在疆域歷史層面，當然搞清中國歷代疆域形成的原因和特點是研究疆域問題的前提，大陸學者在這方面的確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歷代疆域史的研究並不能成長爲中國邊疆學，特別是這類研究始終局限在歷史方面的

話，就無法從歷史的思維模式中走出來看待中國疆域問題，也就無法構建邊疆學自身的思維方法和理論範疇。突破歷史學的途徑是從民族學和政治學角度研究中國疆域問題，而這個思路正好與傳統中國邊政學相適合，正如吳文藻先生所言：“研究邊政學的觀點有二：一是政治學的觀點，一是人類學的觀點。……我們中國自應急起直追，迎頭趕上，使人類學的天空，在理論及應用上，現時並進；以邊政學為根據，來奠定新邊政的基礎，而輔

助新邊政的推行。”¹但是大陸當前的社會發展形勢已經不適合舊的“邊政學”創建目的，現實政治制度也不適合舊的邊政學體系，所以，創建中國邊疆政治學就具有了革新和探索的意義，為中國邊疆學創建基礎理論。

第四，中國傳統理論發展模式始終把歷史起源的探討作為一個新興學科必然的“序曲”，這也是為什麼每當人們論及一個問題時，把提出這個問題線索的歷史尋找的越早越科學的表像意義。似乎越是古已有之，越具有價值一樣。這或許就是古老文明的優勢優點所在，而中國疆域問題恰恰具有歷史探索的一切必備條件，自然從研究形式上滿足了人們對探求模式的要求。歷史學的方法在邊疆學理論的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特別是疆域形成史、經略史的規律和特點是構成邊疆學的重要基礎之一，問題主要是警惕沈迷於歷史而忘記現實，失去了最終目標。瞭解疆域問題在創建中國邊疆學理論中的重要性，目的正是為把握建設邊疆學理論的特點和規律，也就是從邊疆學學科本身的研究中獲取有益的知識經驗和理論規律。這就必須探討“中國邊政學”與“中國邊疆學”的關係，因為，無論承認與否，邊政學實質上是中國當代邊疆理論研究的理論和精神源起。

二、早期中國疆域理論是中國邊疆學的理論來源

“邊政”這個名詞在明代就有²，但現代版的“邊政學”起源於 20 世紀 20 年代的“史地學派”，到“禹貢學派”完成，其發展階段經歷了“民國邊政”、“台灣邊政”、“邊疆史地”，它們與今天處於萌芽狀態

¹ 林恩顯編：《中國邊疆理論研究與方法》，201 頁，台灣國立編譯館，1992 年出版。

² 見吳楚克著：《中國邊疆政治學》第 56 頁。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 年。

的“中國邊疆學”有密切的淵源關係。

關於“邊政學”理論的創立，吳文藻先生早在 1941 年就有所論：“民國以前，中國有籌邊政的策論文章，而無研究邊政的專門學問。‘九一八’後，國內大學有少數設立邊政學系，而卻無邊政學的科目。抗戰以還，中央政治學校邊疆學校特設邊政專修科，蒙藏委員會亦專開蒙藏政治訓練班，於是‘邊政史’、‘邊政研究’、‘邊疆政治’、‘邊疆政策’，這一類科目名稱，始出現於課程表內。”³在此以後，邊政學作為一個學科開始正式建立並發展起來。這個時期邊政學的目的無疑是為喚起國人的國家意識與愛國精神，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實現學人們以知識救國的願望。

近代中國專制統治者在與西方列強對抗、相爭時表現出的盲目自大和昏聩無知，給後人留下了永難磨滅的慘痛教訓。時人就已經有深刻的認識，“我國學者對於自己的邊疆素少研究，在前清時代，和別國起了境界問題的交涉時，已不知吃了多少大虧。就是民國以來，一旦遇上這類問題，仍是受人欺騙。”⁴除了落後的生產方式這一物質原因外，當時人們把科學救國和教育救國看作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所以，現代中國邊政研究從歷史地理開始也就可以理解了。

1949 年可視為中國邊政研究的分界線。1949 年前的邊政研究，我們可稱為“民國邊政”，而 1949 年後可稱為“台灣邊政”。“民國邊政”又可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 1900 年到 1930 年。在此期間，對外，中國經過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入侵，已經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空前淪喪。對內，經過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推翻了腐朽的滿清封建王朝，但國家又陷入了軍閥割據的連綿內戰之中。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時局下，渴望救國的志士仁人，希圖以現代西學開啓人們的頭腦，喚醒國人對國家疆土危機的意識，其標志是“五四”運動催生下的《史地學報》。⁵《史地學

³ 引自林恩顯：《邊政通論》，491 頁，台灣國立編譯館，1989 年出版。這裡的“中央政治學校”是指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央政治學校。

⁴ 馮家升：《我的研究東北史地的計劃》，載《禹貢》第一卷十期。

⁵ 對這個問題的詳細研究，可參見彭明輝先生著《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台灣東大圖書公司 1995 年出版，作為該書研究的歷史前溯，彭明輝著《晚清的經世史

報》1921年11月創刊，是當時“史地研究會”的機關刊物，史地研究會是當時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地部和其他系學生聯合組成的學生組織，史地研究會的前身是“地學研究會”，地學研究會成立於1919年。《史地學報》創刊到1926年10月停刊，共出版20期。

《史地學報》作為現代意義上的“邊政”思想的一個發源，主要原因是《史地學報》的出現與1919年“巴黎和會”有間接關係，巴黎和會直接導致“五四運動”爆發，於是，讓人們瞭解中國的歷史與國土現狀，就成為史地研究會中有志青年以史辯今，以知求真的真切願望，《史地學報》就成為實現這個願望的途徑。從這個意義上看，《史地學報》的起因中蘊含著邊疆政治因素。儘管這部分內容占《史地學報》刊發總量318篇中的28篇，但它的出發點卻絕不同以往。它能夠以現代的眼光，評說清末喪權割地諸因中無地理知識的要害，強調史地知識要為現實服務，要為維護國家疆界服務。這正是現代邊疆學應該繼承和發揚的優秀傳統。為《史地學報》撰文的作者除了當時就是新學的倡導者外，如梁啟超、竺可楨、柳詒徵、陳衡哲等，還有不少人成長為後來的著名學者，如張其昀、鄭鶴聲、繆鳳林、胡煥庸、向達、諸葛麒、陳訓慈等。當然，我們關注的主要問題集中在《史地學報》透露出的對中國邊疆史地的研究態度和政治思想。從宏觀背景來看，最初思考中國疆域問題的學者處於多重矛盾當中。

第二個階段從1931年到1949年，此時的中國雖然仍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但國民革命勝利畢竟消除了反動軍閥的分裂割據，中國暫時處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統治之下，正在國人開始專注國計民生時，“九一八”事變再次使人們陷入國難當中，但此時的中國已經不是八國聯軍入侵時的中國，人民開始覺醒，革命已經烽起。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圍繞中國的邊疆危機，全中國上下出現關注邊疆，關注邊政的時潮。主要標志是《禹貢》、《開發西北》、《邊鐸》、《新亞細亞》，以及區域性的《新青海》、《西北春秋》、《康藏前鋒》、《新蒙古》、《邊事研究》如雨後春筍，特別是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禹貢學派精神的產生，標志著中國邊政的主體意識的形成。他與譚其驤在1934年創辦《禹貢》的發刊詞中明

確指出：“這數十年中，我們受帝國主義壓迫真夠受了，因此，民族意識激發得非常高。在這種意識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國通史出來，好看看我們民族的成份究竟怎樣，到底有哪些地方是應當歸我們的。”⁶這是禹貢學派難能可貴的地方。

從 1931 年直到 1945 年，中國國內主要矛盾始終是反對帝國主義，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包括當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左派與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基本上是接近的，這是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所有愛國者也都圍繞這一目標團結在一起。只有在這個前提下，這個歷史階段產生的維護民族利益，保衛國家疆域的“邊政”思想對今天的中國邊疆政治學有更加積極的追溯意義。在禹貢學派看來，“民族與地理是不可分割的兩件事，我們的地理學既不發達，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樣可以取得根據呢？不必說別的，試看我們的東鄰蓄意侵略我們，造了‘本部’一名來稱呼我們的十八省，暗示我們的邊陲之地不是原有的。”⁷這是歷史地理學者的恥辱，他們就是要通過研究考查，證明我們的國土，證明我們的民族。因此，禹貢學派的精神主旨是政治的，或側重於政治的，而這個政治目的是從地理區劃上闡明中國疆域的由來與現狀，使賣國變得不容易。

1935 年，禹貢學派有一份僅供內部傳閱的《禹貢學會研究邊疆計劃書》，1936 年成立“邊疆研究會”。在邊疆事務研究方面《禹貢》做出的貢獻是最初的和巨大的。突出表現為出版邊疆專號，如“西北研究專號”（第 5 卷 8、9 合刊）、“東北研究專號”（第 6 卷 3、4 合刊）、“後套水利調查專號”（第 6 卷 5 期）、“南洋研究專號”（第 6 卷 8、9 合刊）、“康藏專號”（第 6 卷 12 期）“察綏專號”（第 7 卷 8、9 合刊）、“回教與回族專號”（第 5 卷 11 期）、“回教專號”（第 7 卷 4 期）。這些專號是中國現代史上最早刊登專門研究邊疆問題的學術文章。禹貢學派培養了一大批傑出的“邊政學”專家，這些著名學者，有以研究古籍和民族史的錢穆、傅斯年、蒙文通、徐炳昶、徐中舒、黃文弼，有以研究方志的張國淦、朱士嘉、瞿宣穎、傅振倫、侯仁之，有以研究古文字和制度史的吳其昌、唐蘭、劉節儲、董作賓、於省吾，有以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陳

⁶ 《禹貢》第 1 卷，第 1 期，第 2 頁，花山文藝出版社（影印本）。

⁷ 同上註。

垣、陳寅恪、馮承均、洪業、張星烺、向達、賀昌群，有以研究民族問題的白壽彝、孟森、李書華等。顧頡剛的一批學生在禹貢學派的影響下成長起來，如譚其驤、張維華、陳觀勝、馮家升、張瑋瑛、張印堂、齊思和、鐘鳳年、鄧嗣禹、周一良等。其中，在《禹貢》以邊疆問題研究而影響大的學者如傅斯年、金毓黻、蔣廷黻、馮家升、侯仁之、韓儒林、白壽彝、劉選民、童書業、楊向奎、史念海、陳鴻舜、李榮芳等。其中，不少人去台灣後，成為台灣“邊政”研究的帶頭人。留在大陸的學者成為民族史、古代史、歷史地理學的帶頭人。

楊向奎在 1937 年 7 月 1 日《禹貢》最後一期《察綏專號》，發表文章《記察綏盟旗》中寫到；“邊疆之學向不為中朝人士所注意，清季以來雖因元史之學而及於西北邊疆地理，然終無大成績，而造成一時之學風。反觀東鄰日本則由滿鮮又至滿蒙，筆之所至，槍亦隨之，由鮮而滿而蒙將抵於何處！今幸國之將士，殺敵守土，然我輩讀書之士，猶不能於槍先到處而筆隨之，殊可慨惜！”這是中國邊政學的精神概括。

1949 年後，中國邊政學在大陸基本沒有了，一些隨國民政府到台灣的大陸邊政學者繼續著這門學科的研究，也就是由“民國邊政”轉向“台灣邊政”。在 1990 年前，台灣邊政研究的學者們始終保持“面向中國全境”的態度，所論盡為國民黨光復大陸後如何解決邊疆民族問題出謀劃策，對國民政府時期的邊疆民族政策進行深入的反思。如蔣君章的《中國邊疆與國防》，胡耐安的《邊政通論》、《中國民族志》，林恩顯的《邊政通論》、劉義棠的《中國邊疆民族史》等都是代表。還有《邊疆政策研究》(周昆田)、《邊疆政治》(張興唐編著)、《邊疆宗教》(胡耐安編著)、《邊疆經濟》(張遐民編著)、《邊疆歷史》(李符桐)、《邊疆教育》(劄奇斯欽)、《維吾爾研究》(劉義棠)、《西南邊疆民族論叢》(江應梁主編)、《外蒙古撤治問題》(李毓澍)、《中俄外蒙交涉始末》(呂秋文)、《我國少數民族研究》(唐屹主編)、《古代北西中國》(姚大中)、《六十年來的外蒙古》(傅啓學)、《中國的邊疆開發與邊城規劃》(謝正觀)、《西藏研究》和《新疆研究》(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編輯)，以及國界研究叢書包括《中越國界研究》、《中印國界研究》、《中緬國界研究》、《新疆中俄國界研究》、《東北中俄國界研究》(光復大陸研究院組編)。

刊物包括《邊政研究所年報》(現改爲民族學報，由台灣政治大學民族所編)、《中國邊政》(由中國邊政協會編印，劉學銑主編)。他們可以說幾代師承，始終以中國境內所有邊疆地區和少數民族爲研究對象，保有著“民國邊政”研究的實質與內容。

1990 年後，台灣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改爲民族研究所，標志著台灣面向全中國的邊政研究出現分化：一個是以“原住民”爲研究對象的民族學研究體系，一個是繼續傳統台灣“邊政”研究內容的民族學和歷史地理學體系。從傳承關係劃分，以“原住民”爲研究對象的民族學盡量割裂與傳統邊政學的關係，以人類學中的“原住民”田野調查爲基點，取代傳統邊政研究對象，使民族學成爲介於邊政學和人類學之間的一個調和點。而民族學研究體系中以藏學、蒙古學爲代表的一些學科繼續中國民族和歷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實質上繼承著台灣傳統邊政學的方法和內容。出現這種情況與台灣政治現實和台灣邊政學科本身發展環境有密切關係。“台灣邊政”研究之所以繼承了大陸原有的邊政研究傳統，除了師承關係的原因外，在 20 世紀 70 年代前臺灣大量再版和重印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的邊政研究成果有很大關係。因爲，“民國邊政”研究將近 20 年的成果需要一個消化過程，加之國民黨始終強調要反攻大陸，所以宣傳它的邊疆政策和培養邊政人才也是教育的一個方面。

但是，它面臨兩個不可克服的發展矛盾：一個是來自學科本身的，即傳統邊政學的建設基礎是從邊疆歷史、邊疆地理擴展到邊疆民族，顯然，這條路的發展前途並不大。無論歷史、地理還是民族都已經具有充分完整的學科體系，而且這三個學科之間的交叉屬於傳統學科的融合而不是創新。20 世紀 30、40 年代突出邊疆問題的研究，其目的是爲瞭解決當時中國面臨的邊疆民族危機，當危機過去後，繼續依照此方向研究下去，必然慢慢地走向三個不同的分屬學科。除了這個原因外，台灣政治現狀不能夠爲其邊疆政治和邊疆民族研究提供正常的研究環境和經費支援，也沒有理論研究成果的實踐領域。所以目前的情況持續下去的話，台灣邊政理論研究必然由於政治分歧而爲目前的執政利益集團忽視，特別是由於台灣政治力量中“本土化”支系的擴充加強，從政治理論上排斥邊政研究，因爲這與他們所奉行的“台獨”政治立場是相違背的。這是導致“台灣邊政”研

究走向萎縮的原因。

大陸的邊疆史地研究是從 20 世紀 80 年代初開始的，1983 年 3 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決定組建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並任命著名學者翁獨健教授為主任。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中國邊疆研究史發展進程中一個新的起點，它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以邊疆為研究對象的專門研究機構。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大陸的政治文化環境發生了根本變化，傳統中國邊政成長的社會基礎全部消失了。在隨後的一段時間裡，中國思想理論界存在著一些脫離實際，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錯誤認識，這種錯誤認識在邊疆理論研究方面的表現主要是：一是認為無產階級是沒有國界的，各國無產階級都是國際無產階級的一個部分，是未來建立國際共產主義世界的一個部分，因此，無產階級國家都是兄弟關係，既然是兄弟加友誼，國界問題與階級問題相比是小問題。二是認為無產階級不分民族，各民族的無產階級都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當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並成為領導階級後，民族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因此，傳統邊政研究的現實性沒有了。三是無產階級最大公無私，無產階級是為建立共產主義社會而誕生的一個新興階級，由於它產生的歷史條件決定了是最大公無私的，因而，在民族利益面前，無產階級是不屑一顧的，在國家利益面前無產階級服從國際利益。直到 20 世紀 50 年代朝鮮戰爭結束後，特別是中蘇關係破裂以後，這些觀念開始出現根本性改變。而在此之前，中國周邊的朝鮮、越南、蒙古、蘇聯都是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傳統的邊政思想是根本不適用的。國內各少數民族已經在階級利益的高度解決了民族之間的分歧，“邊政”已經被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取代。所以，傳統中國邊政研究在大陸沒有了存在的社會基礎。我們需要研究的是總結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和中國人民如何勝利反擊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直至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對邊疆政治的研究基本控制在這個範圍裡。這與學者的認識本身並沒有關係，因為在那個時期即使認識到了，這在當時也是很難展開研究的領域。

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後，基於學科建設的需要提出中國邊疆史地研究應著重研究下述三個方面：中國古代中原王朝與邊疆地區關係；中國近代邊界變遷史；中國邊疆研究史。重點一是近代和當代邊

疆問題研究；二是邊疆史地研究的基本資料。圍繞著上述研究領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要從這樣幾個方面展開。搜集、整理中外有關我國邊界問題的政府文件、檔案文獻，以及邊疆地區的考察報告；研究我國與鄰國邊界交涉的由來和發展，重點研究有爭議的、或有可能發生爭議的邊界地區的歷史和現狀，提出解決問題或應付突發事件的對策性報告；總結四十餘年來邊界談判和自衛反擊戰的經驗教訓。1987 年以來，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先後創辦了《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季刊)，出版了“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叢書”、“邊疆史地叢書”、“中國邊疆史地文庫”、“中國邊疆史地研究資料叢書”，承擔了“東北工程”、“新疆工程”等國家大型重點研究項目。

台灣“中國邊政”正在走向衰落，大陸“邊疆史地”正在走向轉型。前者的問題是能否在台灣振興傳統邊政研究，後者的問題是能否在邊疆史地研究的基礎上創建中國邊疆學理論。盡管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始終不脫離“史地”領域，就難於創建中國邊疆學。如果再加上行政方式指導科學研究、以官位大小評價學術水平、而普通研究人員的待遇越來越低，勢必成為制約中國邊疆學科研究水平和培養專門人才的障礙，這也是當前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弊病，難以適應未來邊疆學發展的需要。

總之，20 世紀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時刻，是那些立志用知識和科學拯救國家於水火的志士仁人創立了邊政學，台灣的“邊政學”、也始終關注大陸邊疆與民族情況，今天在國家興旺，民族大發展的時刻，創建中國邊疆學也就提到了時代關注的高度，提到了一個理論與現實要求和我們必須承擔這一要求的時刻。

三、邊疆政治學是研究中國疆域問題的當代視角

“邊政”相對於“內政”而言，類似提法如“農政”等，從詞組的構成上看，“邊政”顯然是半白話的一個詞匯，而不是“邊疆政治”的縮語，在當時它泛指有關邊疆和民族事務的所有方面。由一個行政事務部門的詞匯轉化為“邊政學”，是抗日戰爭這樣特定時代的特定需求下出現的，因此，在中國大陸啓用或繼續延用“邊政學”已經失去了它的時代內

容和現實要求，需要我們以一種與時俱進的精神，從一個全新視角提出適合中國疆域問題研究的理論學科，這就是中國邊疆政治學。

把中國邊疆政治學作為研究中國疆域問題的當代視角，是基於中國邊疆政治學理論與中國邊疆學的關係，即中國邊疆學的理論基礎是中國邊疆政治學。提出這一認識的理論觀點主要有：

第一，“當代視角”強調了研究中國疆域問題的目的既不是歷史的，也不是經濟的，更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的。在中國經過 20 多年的改革開放後，整個經濟制度和政治體制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不再是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而是把中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現代化社會主義國家。因此，維護國家穩定與民族團結，建立和發展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就成為未來一段時間國家的核心利益。這三個方面的目標都與邊疆政治有密切關係。邊疆社會穩定與民族團結是目前維護國家穩定的重點，而發展與周邊國家關係也是邊疆政治學問題中之要義，台灣問題當然也是中國邊疆政治問題。所以，關注當代中國政治必然關注當代中國邊疆政治學，建設中國邊疆學必然要以中國邊疆政治理論為基礎。

第二，中國邊疆政治學突出了中國邊疆學的理論建設的特殊性。中國邊疆政治學本身就是民族政治學、邊疆歷史學和政治地理學的交叉復合，並構建了基本的邊疆政治理論範疇體系，顯示了中國邊疆學理論建設的學科傾向。這種理論導向符合了當代中國理論學科發展的基本要求，也適應了當代中國邊疆的客觀實際形勢。任何一種社會理論的產生都必然是那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反映，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國際影響力日益加強，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相互作用日益明顯的當代，首先提出中國邊疆政治理論，為正確解決和分析中國疆域問題確立了基本理論體系，體現了創建中國邊疆學的特殊性。

第三，中國邊疆政治學形式上繼承了中國邊政學所有合理合時的理論內容和優秀傳統，在理論淵源上具有率先產生的條件和優越性。中國邊政學在大陸的斷裂不是理論本身發展的結果，而是社會根本轉型造成的，盡管時過境遷，邊政學內容已不適應國家政治制度的要求，但理論存在的客觀需要還在，當代中國邊疆問題和疆域問題也要求一種新的邊疆政治理論

的出現。所以，首先創立中國邊疆政治學對傳統邊政學來說，既是繼承更是創新，只有在一般政治理論範疇確立的前提下，創建中國邊疆學才具有了可行性。

第四，中國疆域問題的核心是邊疆形成因素與動態因素之間的關係。形成因素如悠久的占統治地位的文明、獨特的語言體系、發達的禮教制度和獨特的人口地理因素。動態因素如中央政府與邊疆地區的關係、中原漢族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係、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等，這些問題的根本性質是政治化的。當然，歷史學、民族學、地理學的研究也是基礎性研究，但最終要放在政治學範疇內加以解決，或是政治學與民族學、歷史學、政治地理學相互交叉，即構成中國邊疆政治學來分析中國疆域問題。這是中國疆域問題發生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邊疆學發生發展的必然結果。當然，有些人認為政治化太濃容易使理論研究變為政治工具，或者容易引起學術以外的麻煩。這不是沒有道理的，但研究政治並不就是政治，相反，不研究政治也並不是就脫離了政治。這是一個認識問題而不是一個學術問題。

中國疆域問題的政治性質需要利用政治學的方法和範疇研究，此外，一些現代理論研究方法和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除了現在流行的歷史統計學和語言統計學以外，地理政治學、國際政治學、民族考古學、衛星遙感學、海洋學和博弈論都是中國邊疆政治學可以利用的理論方法。

四、對近代以前中國疆域問題進行研究的幾個原則

(一)有了統一的國家才有疆域

在秦朝建立統一的國家以前，沒有邊疆意義上的“疆域”。因為，秦把夏商周時代的諸侯分封制發展為專制封建國家制度，完成了封建制度史上的一次偉大進步。專制與封建並不是“共生”關係，封建制度發展到“專制”，高度是對封建制度的突破與完善。而在此之前，夏即以“世襲制”代替“禪讓制”，歷時約 471 年，商歷時約 1066 年，周歷時約 295 年，周朝的“分封制”也達到了“分封式”封建制度的頂峰，三朝共有 1800 多年。對如此長期的規模巨大的封建分封時代，我們囿於傳統的一般社會發展規律而排斥在封建歷史外，所以，在解決夏商周時代的所謂

“疆域”問題時，就不得不試圖說清“王室”與“諸候”的關係，有的是更為複雜的“中國與四土”或“天下共主”與“四方四土”的。事實上，“先秦早期國家多元盟邦和格局，決定了這種尚未實現一統的國家形態下，並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邊疆概念，而所顯示出的疆域，也只是一個所屬諸候國活動的大致範圍。”⁸

一般社會發展規律在各國歷史發展中都表現特殊性。夏商周的特殊性就在於它是“中國式”的早期封建制度，這個時期產生的一些處理王室與諸候國關係的概念、方法被統一後的專制封建國家所繼承，並放大到中央王朝與周邊藩屬的關係中。我們研究先秦以前的疆域歷史，應該正確區別這些概念、方法在不同時代所適用的對象和意義，而不是追根溯源至原意以“匡正”後人的理解，結果往往是越辯越不清楚。

(二)秦統一後的疆域制度是隨著疆域區域內民族特點而變化的

秦統一以後的中國可以稱得上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封建專制國家，達到這一空前絕後的歷史偉業，是聚合了當時生活在中國內陸上所有各民族的物質生產力和精神創造力，他們共同構成以漢族為代表的中華文化，而不單純是漢族。實際上，秦朝人口就是當時南北民族融合構成的，以後，在以漢語為紐帶的文化基礎上，周邊民族逐步融入、加入到中華民族中。這種自然的擴張趨勢直到與當時也已經發展強大的民族地區或國家相交接，疆域問題才真正具有了“國家級”的意義，適用什麼樣的疆域制度才能有效地維護中央王朝的穩定，鞏固國家已有領土面積，才能將“蠻夷”“儒化”，或“化干戈為玉帛”。這時候疆域問題的政治含義凸現，疆域問題與民族問題同時出現。

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的多元特徵，在理解和處理疆域問題時發揮了根本性的作用。形成民族寬容、宗教和解、制度並存、因俗而制的先進的科學的疆域理念。在這樣的精神基礎上，才出現“胡漢和親”、“羈縻州府”、“懷柔封貢”、“宗藩屬國”等模式手段和制度方略。也只有這樣的政治基礎上，才能允許出現“土司制”、“盟旗制”、“政教合一制”等地方政權的存在，可以說這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國兩制”。這些

⁸ 厲聲：《先秦國家與疆域、四土芻見》，（討論稿）。

邊疆政治制度產生的基礎是邊疆區域民族社會的傳統習慣，而不是專門的發明創造，因為，只有適合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特殊的生產方式的治理方式，才能長期有效地對該地區實施統治。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俄國沙皇對其侵略奴役下的其他民族的統治方式，結局是幾代人難以消除的隔閡並最終導致帝國分崩離析。

(三) 近代以前疆域的變更以實際控制為標準，即在該地區實施本國的統治制度並進行稅收

國家主義和愛國主義能夠上升到“主義”的高度其實都是較為晚近的事情。近代以前，疆域變更的決定因素是經濟的，而不是民族的或國家的，一般發生疆域戰爭的起因也是爭奪經濟利益，當戰爭獲得的經濟利益對獲勝民族或國家不斷產生巨大的刺激、推動作用，懲罰戰爭在近代以前也就成為民族或國家交往的一種非常手段。直接的經濟利益也逐漸含有了民族的國家的成份。那麼，控制一個地區的經濟利益主要體現在國家政權有效地在該地區實施，並獲取穩定的經濟來源。演變到後來，就是本國政治制度的實施和體現稅收。從本質上說，政治就是控制利益分配權的通用方式，戰爭只不過是強迫對方接受利益的減少或剝奪分配權的一種有效手段。

針對近代以前的這種情況，在探討民族間戰爭，或者是國家間懲罰戰爭時，應該抓住經濟利益這一環節，而不是把戰爭導致的領土變更作為中心問題。一方面應該避免以今天的道德標準評價當時的戰爭目的，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站在今天國家利益的角度給當時相互間的懲罰豎立國家主義的劃分標準。客觀地講，當時的統治集團未必把疆域意識提高到今天的高度，也未必把民族矛盾與疆域看作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個王朝對外有沒有懲罰戰爭及正義還是非正義，都是道德家小說家的事情，歷史學和民族學都把它們視為正常的歷史過程。

這個問題的主要矛盾在於：維護國家統一的戰爭及人物一般是正面的肯定的，但當面臨兩種情況，一種是推翻腐朽統治集團的革命，一種是維護弱小民族利益的戰爭，這時，評價那些站在腐朽統治集團利益上維護舊的國家政權以及那些人物，或站在弱小民族利益上與統治集團進行的戰爭和人物，就容易陷入兩難境地。從推翻舊的生產關係以推動生產力發展的

角度看，應該肯定革命，然而，革命運動往往造成國家的動蕩甚至分裂；弱小民族起來反抗強大的來自異族的剝削和壓迫，歷來是馬克思主義支援的正義戰爭，然而，這對統一的封建專制民族國家來說就是分裂。過去這類問題比較好解決，因為階級利益是衡量是非的根本原則，今天，國家利益至上，是非問題也要重新認識。

(四)資本主義國家的出現標志著現代疆界意識的產生

在強權即是真理的封建時代，疆域只能以民族傳統居住界線為模糊界線，有明顯地理標記的，如江、河、山、川等，就容易成為分界線，這些地方也往往成為戰爭的起點或終點。到資本主義產生方式出現以後，固定的生產資料來源和工業城市的出現，要求民族國家全力保護日益發達的物質生產能力，這就促使現代民族國家出現。所以，早期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個不是以強權為後盾進行擴張，在這點上它與封建時期國家間的懲罰不同，它盡力擴張領土，以滿足工業化生產對原料、市場和人口的幾何增長的需求。它產生的前奏是長期的激烈的近代歐洲戰爭，在理論上直接導致以格勞秀斯為代表的歐洲法權思想和以孟德斯鳩為代表的國家權利分配模式。在這些理論的指導下，歐洲經過反復的兼並戰爭，最終完成了現代民族國家的進程。歐洲各國疆域以其共同承認的國際法為前提確定下來，但在其他地方它們卻無視別國的疆域，殖民別國。

資本主義民族國家是一個矛盾的聚合體：對內它採取保守專制和國家主義，對外它卻採取開放擴張和自由主義。它越是強調世界性或全球化，它自己越趨向於保守孤立和民族主義。所以，當歐洲列強侵略並殖民已經是完整國家形態的國家時，把他們的疆域理論和主權意識也一並帶到殖民國家，它們像維護自己新開墾的“處女地”一樣爭奪殖民地的疆域，擴張它的範圍，直至引發世界性戰爭。對那些還沒有建立獨立國家的民族或地區，他們或者吞併，或者消滅，或者肢解，或者組織一個效忠自己的當地政權，行使宗主國的權力。

資本主義列強瓜分世界的行為，一方面把資本主義創造的廉價商品送往全世界，一方面也把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意識帶往全世界。其中，現代疆域意識和民族國家意識就是從資本主義那裡傳播到落後國家的。從兩次世界大戰造成無數民族隔閡和國家分裂的教訓中，至今我們仍然在痛苦地

回憶著疆域的變遷，撫慰著難以癒合的傷口，鞏固著本來就屬於自己的疆土，激昂著古老民族的勇氣和愛國主義。

今天看來，很多國際關係都與當初試圖主導世界的大國們的設想正好相反。雖然人類歷史的進程必然是一個向更高文明發展的趨勢，但實現這一過程卻是不平衡的。有的民族繁榮發達了，有的卻衰落消失了；有的國家強盛興旺了，有的卻落後消亡了。近代以來民族走向國家的歷史潮流，證明國家是民族存在興亡的關鍵，所以，保衛國家疆域既是國家的神聖職責，也是保護民族存亡的最後屏障。我們從無數民族戰爭和國家間領土戰爭中，完全可以理解疆域所包含的生死攸關的含義。這不能說與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沒關係，起碼它喚醒了傳統的模糊的疆域意識，進入了現代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兩股世界性思潮蓬勃發展的歷史時期。今天，這兩股思潮依然以巨大的力量推動著世界政治經濟文化格局的變化，引發著文明間的衝突，各國間疆域問題也必然越來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所以，疆域理論的研究，乃至創建中國邊疆學也就意義重大。

（2006年6月27日投稿，8月1日審查通過）

恩琴在外蒙古活動之研究(1920-1921)

楊詩馨

淡江俄羅斯研究所碩士

摘 要

近代外蒙從 1911 至 1921 年短短的 10 年之間，經歷了獨立—自治—撤治—再獨立四個階段。1911 年外蒙因和中國關係交惡且受俄國鼓吹，有了第一次的獨立活動。1915 年中俄蒙三方簽訂了中俄蒙協約，外蒙改行自治。1919 年徐樹錚強行撤銷外蒙自治，讓幾近重修舊好的中蒙關係，頓時降至冰點，也讓外蒙更加確立再次尋求獨立的決心。1920 年 10 月恩琴在中蒙關係最惡劣時進入外蒙，並向王公們宣傳他欲解放活佛及恢復外蒙獨立的計畫，很快受到王公們的支持。1921 年 2 月恩琴順利佔領了庫倫，次月以活佛為首的外蒙獨立政府正式成立。恩琴佔領庫倫後，順利的將勢力拓展至蒙古西部及南部。而蘇維埃政府對恩琴的活動，曾多次發函要求中國共同驅逐恩琴，但都為中國拒絕。1921 年 5 月恩琴出發攻擊蘇俄，9 月被紅軍逮捕並判處死刑。蘇維埃政府利用恩琴出發攻擊蘇俄領土期間，出兵佔領了庫倫。可以這麼說，恩琴在外蒙的活動，給蘇維埃政府提供了一個最合理的藉口來赤化外蒙。

恩琴（Р.Ф. Унгерн）為一白軍軍官。俄國十月革命發生後，便前往外貝加爾地區及滿洲一帶活動。早期他的活動是和哥薩克上尉謝苗諾夫（Г.М. Семёнов）合作。恩琴於 1920 年 10 月從蒙蘇邊界的阿克沙（Акша）直接進入了外蒙，他佔領庫倫給外蒙日後政局的發展，帶來了關鍵性的影響。過去許多國內外的學者，對於恩琴進入外蒙佔領庫

倫，都提出是受日本的指使和援助這樣的觀點。然而近幾年發表關於恩琴活動的新資料，對此卻提供了另一種新觀點，本文藉由參考近年新發表資料，欲探討恩琴佔領庫倫前後的活動及其佔領庫倫後的政治計畫與主張。另外，恩琴與日本之間的關係亦是主要探討重點，並提出不同於以往之觀點。

一、恩琴在外蒙古的活動

恩琴 1885 年出生於奧地利的格拉次，有一半斯拉夫及一半的匈牙利血統。他的家族為波羅的海貴族。恩琴的求學過程中，都是在貴族的軍事學校就讀，他自小就喜愛關於騎士冒險的小說與故事¹，這與他日後好戰性格不無關係。1911 年至 1912 年間，恩琴因服軍職的關係，曾經在科布多居住過一段日子，那段期間他學會了蒙古文，並且相當欣賞蒙古的文化及宗教，恩琴甚至想加入蒙古的軍隊，參加 1912 年在科布多發起的獨立運動，然而並沒有被軍隊長官允許²。歐戰發生後，恩琴離開科布多前往戰線支援，由於表現優異，他獲得了象徵最高榮譽的神聖徽章³。

俄國十月革命發生後，緊接而來的是俄羅斯的國內戰爭。恩琴早期的活動是和謝苗諾夫合作，當時謝苗諾夫受到日本的幫助在赤塔（Чита）成立了反共政府。1918 年謝苗諾夫派恩琴前往大烏里（Даурия）成立反共據地，所以佔領外蒙之前，恩琴的主要活動範圍都是在大烏里，而一直伴隨恩琴大小戰役的亞洲騎兵隊也是在那時成立的。值得一提的是，恩琴雖然同為白軍，但是在內戰期間，他並沒有加入其他白軍的反共活動，因為恩琴認為自己推翻共黨的唯一目的是恢復沙皇制度，而非同其他白軍只是要成立立憲會議。

至於恩琴為何會進入外蒙領土，恩琴曾在法庭上表示，他進入外蒙是

¹ Н.Н. Князев, Легендарный барон. — С.Л. Кузьмин, Легендарный барон : не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Москва: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научных изданий КМК, 2004, с. 14.

² А.В. Бурдуков, В старой и новой Монголии. — С.Л. Кузьмин,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Москва: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научных изданий КМК, 2004, с. 270.

³ Кузьмин,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 59.

在相當偶然的機會下發生⁴。但其實這和白軍當時在遠東地區攻勢由盛轉衰有關聯。1919年11月隨著高爾察克⁵（А.В. Колчак）在鄂木斯克的政府被推翻，次年2月高氏又被逮捕的情況下，聯軍紛紛撤軍，這使得白軍在西伯利亞的勢力瞬間收縮⁶。許多高氏的殘餘部隊在他死後，紛紛進入大烏里。由於高氏的軍隊和謝苗諾夫的軍隊之間一直存有衝突，因為高氏向來反對謝氏接受日本的幫助。另外，過去恩琴在大烏里時，曾經搶劫並逮捕過高氏的軍隊，這更是讓雙方之間的關係陷入緊張⁷。高爾察克死後，他的殘餘部隊進入大烏里並掌握了恩琴犯罪的證據，想要將他逮捕。當時恩琴爲了要躲避他們的逮捕，曾經申請回奧地利的簽證，但並沒有成功⁸。1920年8月恩琴決定前往阿克沙（Акша），前往阿克沙的原因有二：第一，是要躲避高氏殘餘部隊的逮捕。第二，則是執行謝苗諾夫給予他前往阿克沙成立反共據地的任務（當時謝氏和恩琴計畫攻擊共黨的路線爲：阿克沙—特洛邑次卡薩夫斯克（Троицкосавск）—上烏丁斯克（Верхнеудинск））。然而隨著遠東共和國勢力的增強和日本在濱海地區戰線的失利，日本不得不停止對謝苗諾夫的幫助⁹。1920年10月紅軍勢力進入赤塔，推翻了謝氏的政權，使得謝氏不得已逃至哈爾濱。而在阿

⁴ 【1921年9月1、2日於伊爾庫斯克法庭上恩琴的問答】〈Допросы Р.Ф.Унгерна 1 и 2 сентября 1921 г. в Иркутске〉, ГАРФ, ф. 9427, оп. 1, д. 392, л. 47-60.—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 211.

⁵ 高爾察克又譯爲廓爾察克，著名的白軍將領，在俄羅斯國內戰爭期間，曾在鄂木斯克成立反共政府，也成爲了當時反共勢力的最高領導單位。高爾察克的反共活動，一開始在聯軍的支持下進行的相當順利，然而從1919年夏天起，由於高氏戰略之錯誤使得戰線過份拉長，讓紅軍有機會展開攻擊。1919年年底鄂木斯克政府被推翻，而高氏在1920年2月7日被紅軍判處死刑。

⁶ 李邁先，俄國史下冊，台北：國立編譯館，1969年，頁458-461。

⁷ 根據民國八年「駐海參崴連絡員周加樹報告謝葛兩氏政爭之調和」的信函中寫道：「自鄂木斯克政府以葛爾察克（高爾察克）爲最高執政，謝米諾夫倡議反對，經各國調停，幸未決裂。近日（三月二十六日來海參崴，四月二日回赤塔）謝米諾夫由赤來崴與日軍司令部人員往來甚密。據日司令部之言，謝氏來崴，係因鄂木斯克政府所派之加克那耶夫中將，原取消謝氏免職命令而來。乃加氏到赤塔後，檢查謝部一切行爲，甚爲苛刻……」，參見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民國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9年，頁394。

⁸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 17.

⁹ 日本於7月3日宣言，解散在外貝加爾地區對謝氏的軍力支援單位，雖然謝氏曾要求暫緩撤銷支援，但是被日本拒絕了。參見 Г.В. Мелихов, Белый Харбин середина 20-х,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2003, с. 201.

克沙等待謝氏共同攻擊特洛邑次卡薩夫斯克（如下簡稱特城）的恩琴，得知謝氏逃至哈爾濱無法繼續共同的攻擊活動後，當下他決定帶領著亞洲騎兵隊從阿克沙進入外蒙，而不直接攻擊特城。恩琴的考量是在於，從阿克沙前往特城必須穿過外興安嶺，對於騎兵隊相當不方便，所以恩琴選擇先進入外蒙，再從那裡進入特城¹⁰。

恩琴進入外蒙後，本打算沿著克魯倫河進入特城，但是又考慮到穿過肯特山同樣是一條崎嶇難行的路。經深思熟慮後，恩琴決定先進入庫倫，並從庫倫進入特城¹¹。1920年11月恩琴爲了進入庫倫和中國軍隊發生了激戰，但由於恩琴軍隊人數過少，不敵中國軍隊的攻勢，敗退至車臣汗部。從那時起，恩琴開始和蒙古王公有了聯繫與接觸。最先與恩琴接觸的是杜嘎爾梅楞（Дугар-Мэрэн）¹²與羅布桑策旺（Лувсан-цэвэн）¹³，之後本地的王公也紛紛與恩琴接觸，一開始這些王公對於恩琴是有好感的，因爲他們認爲恩琴能幫助他們脫離中國多年的控制。在蒙古王公的協助下，1921年2月4日恩琴成功的佔領了庫倫。

關於恩琴進入外蒙的原因有許多說法，多數指向恩琴是在日本的指示和援助下進行的，因爲當時恩琴軍隊有日籍軍官鈴木與其帶領的日本軍隊，而鈴木被視爲是日本派給恩琴的參謀¹⁴，但這個說法缺乏可靠的證據。根據恩琴軍隊的軍官托爾諾夫斯基（М.Г. Торновский）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這位鈴木雖然和恩琴一同從阿克沙進入外蒙，但是他卻在第一次攻擊庫倫的那段期間，從軍隊逃跑，並且下落不明。另外，日本學者磯野富士子（Fujiko Isono）也在他的「蘇俄和蒙古革命 1921 年」一文中提到：「恩琴是否受日本幫助這議題引起了爭議，至於被視爲是恩琴日本參

¹⁰ 【1921年9月1、2日於伊爾庫斯克法庭上恩琴的問答】<Допросы Р.Ф.Унгерна 1 и 2 сентября 1921 г. в Иркутске>, ГАРФ, ф. 9427, оп. 1, д. 392, л. 47-60.—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 211.

¹¹ Князев, Легендарный барон. — Легендарный барон : не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сс. 40-41.

¹² 梅楞（Мэрэн）是管旗章京、旗署文祕的職位。在政治理念上，杜嘎爾梅楞贊同恩琴想預恢復成吉思汗帝國的想法。

¹³ 桑貝子旗的王公。

¹⁴ Л. Юзефович, Самодержец пустыни — феномен судьбы барона Р.Ф. Унгерн-Штернберга, Москва: Эллис Лак, 1993, с. 72.

謀的陸軍上校鈴木，實際上只是恩琴軍隊中一個不重要的軍官。而鈴木所領導的日本軍隊，只是當時在滿洲所招募的一群烏合之眾（約 50 人）¹⁵。」從如上的說法可證明，鈴木是日本派給恩琴的參謀此說法並不可靠，而恩琴之所以進入外蒙，單純只是在偶然的機會下發生。

二、恩琴對於外蒙的政策

恩琴佔領庫倫之後，於 3 月中旬再次打敗中國軍隊、佔領了叨林與烏得。之後他藉由和蒙古西部白軍勢力的結合，將勢力延伸至王庫倫、烏里雅蘇台和科布多這些地區。1921 年 3 月以活佛爲首的外蒙獨立政府正式成立，必須強調的是，恩琴他並沒有參與外蒙獨立政府成立的工作，因爲當時他正南下叨林、烏得與中國軍隊交戰，所以說外蒙獨立政府爲恩琴一手操控而成立的說法並非正確，當然恩琴對於這個政府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是他在這個政府沒有實際的職位¹⁶。

恩琴佔領外蒙後對於國內的政策，主要將重心放在如何鞏固自身在外蒙的勢力，特別是當周圍面臨中國及蘇維埃政府的壓力。爲此，恩琴讓托爾諾夫斯基擬出一份簡明的報告，是關於俄國人如何在外蒙鞏固勢力。而托氏所擬的這份報告，提出了非常切合恩琴、中國與蒙古三方利益之條件。很快的，恩琴同意將這份報告的政治計畫要點翻譯成中文，準備呈交給鎮撫使陳毅。而報告的要點爲如下：1.必須在最快的時間內成立一支十萬人的蒙古軍隊，因近來紅軍勢力不斷無故的侵犯外蒙邊界。2.很快的蒙古邊界將由蒙古軍隊來防衛，蘇維埃勢力不該出現在邊境上。3.陳毅將軍必須重回外蒙，而中蒙雙方必須就外蒙在中國的統治下保持自治一事進行討論，中國軍隊必須撤離外蒙，外蒙將自行成立一支十萬人之軍隊，並由亞洲騎兵隊來指導。外蒙在中國的統治下保有自治，如此一來，蘇維埃便不敢冒險得罪中國，這樣外蒙便能獲得平靜，恩琴將軍即有機會穩定的成立一支勢力強大的軍隊，有了這支軍隊作爲後盾，恩琴將軍及蒙古人便能

¹⁵ Fujiko Isono, "Soviet Russia and The Mongolian Revolution of 1921", Past and Present, No. 83(May, 1979), p. 138. 本文作者參考了日本軍事檔案。

¹⁶ 【1921 年 8 月 29 日於特洛邑次卡薩夫斯克法庭上恩琴的問答】< Допрос Р.Ф. Унгерна 29 августа 1921 г. в Троицкосавске >, РГАСПИ, ф. 71, оп. 33, д. 2213, л. 10-15.—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 207.

在重大議題上自行決定。4.陳毅將不會拒絕這項提議，就是讓外蒙在中國的管轄下保持自治，也許蒙古人會不滿意這個提議，但是爲了防止短期間中國與蘇維埃的侵犯，必須採用這個方法。5.假如蘇維埃第五軍想要破壞如上所提互不干涉之狀態或逾越蒙古邊境，蒙古軍隊將在恩琴將軍的領導下與中國軍隊共同對抗蘇維埃勢力¹⁷。

而這份計畫書在擬定後，恩琴派遣了兩位喇嘛分別送給陳毅，這兩位喇嘛其中一位是博多喇嘛¹⁸，另一位則是活佛身邊的親信。然而兩位喇嘛都沒有成功的將信送達給陳毅，這封信最後是落至蒙古人民革命黨領袖蘇赫巴托的手中¹⁹，無庸置疑的是博多喇嘛所爲。

恩琴之所以主張讓外蒙重回中國管轄，保持自治的原因在於：第一，考慮到蘇維埃政府勢力可能會侵犯外蒙，所以唯有讓外蒙歸回中國，在面臨蘇維埃政府侵犯外蒙時，中國才不會坐視不管。如此一來，恩琴就能聯合中國共同對抗蘇維埃紅軍。第二，和恩琴獨特的政治計畫有關，恩琴佔領庫倫後，計畫成立一個中央蒙古帝國。這是一種泛蒙古主義，將結合所有游牧民族爲一大帝國，而這個帝國將由中國皇帝來領導，所以恩琴主張讓外蒙重回中國管轄。

而何謂中央蒙古帝國？恩琴所主張的中央蒙古帝國是必須結合外蒙古、內蒙古、新疆、西藏的勢力爲一大帝國，另外還必須結合信仰伊斯蘭教的吉爾吉斯。恩琴期望藉由成立這個中央蒙古帝國來幫助中國恢復帝王制度，因爲最有資格領導中央蒙古帝國的只有中國的皇帝，而中央蒙古帝國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對抗來自西方的革命浪潮²⁰。爲了推行這個中央蒙

¹⁷ М.Г. Торновский, События в Монголии-Халхе в 1920-1921 годах. — Легендарный барон : не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с. 226.

¹⁸ 博多喇嘛曾經代表過外蒙共黨組織，在 1920 年 7 月下旬帶領外蒙自治政府的代表團及正式官函，前往俄羅斯尋求援助。而 1920 年 8 月由遠東共和國的總理兼外長舒米斯基（Б.С. Шумяцкий）、第三國際代表及西伯利亞紅軍第五軍委員會首領等人在會議上決定，將外蒙代表團分成四個小組，在俄國人的指示下，擔任個別任務，當時博多喇嘛就是被分配回到庫倫觀察動靜的任務，而 1921 年 3 月蒙古人民臨時政府成立，博多喇嘛擔任了外交部長之職位。

參見 William B. Ballis,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of A Soviet Satellite: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9, No. 2(Jun., 1956), p. 299.

¹⁹ Торновский, События в Монголии-Халхе в 1920-1921 годах. — Легендарный барон : не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с. 227.

²⁰ Ф. Оссендовский, Звери, люди и боги. —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с.

古帝國計畫，恩琴曾經寫信給在蒙古東、西部有影響力的王公及喇嘛。

恩琴在 1921 年 3 月寫信給成德公（Цэндэ-гун），成德公是呼倫貝爾的王公，曾在民初呼倫貝爾獨立事件中扮演過重要角色²¹，他也曾經參與謝苗諾夫成立大蒙古國臨時政府的活動²²。而恩琴寫給他的信內容如下：

.....而要恢復中原帝制必須聯合蒙古內部、新疆、西藏，
建立一個穩固的聯邦組織。而他的神聖任務即是恢復清朝的帝
制，並將其勢力拓展到整個蒙古甚至到呼倫貝爾。而蒙古民族
的統一是在現在的要務。

王公您應該知道張奎武是復辟主義者，所以蒙古軍隊無須
與他發生戰爭，反倒是中國國內的政權 - 他們是喜好革命的份
子，打著恢復自由，帶著偽善面具的魔鬼，宣揚要為了人民的
利益，但卻作敗壞人類道德的事情，蘇維埃政府與中國南方政
府就是證明。

您無須驚訝為何我如此努力要恢復帝王制度，在我看來，
每一個真誠的戰士應該為自己的忠誠而活著，而支持著我們忠
誠的力量就是 - 帝王，假如沒有帝王，就像我們身旁的國家一
般，他們的人民將互相對彼此作出傷害的事.....²³

除了成德公之外，恩琴也發信給帕勒塔王（Палта-ван），他是一位年輕的蒙古王公，曾經在彼得堡求學。其父親在阿爾泰地區相當具有影響力，特別在 1912-1915 年間²⁴。

.....首先我已經和阿爾泰地區的李姓長官聯絡，還有其他鄰

569-570.

²¹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 629.

²² 二木博史，「大蒙古國臨時政府之成立」，蒙古學訊息，第 2 期（1998 年），頁 35。

²³ 【第二封恩琴致成德公之信】〈Второе письмо Р.Ф. Унгерна Цэндэ-гуну〉，（27 мая 1921 г.），РГВА, ф. 39454, оп. 1, д. 9, л. 84-85об. —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с. 143-144.

²⁴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 629.

近地區的朋友連絡，大家都沒有忘記，我們唯一的路就是恢復滿清帝國……

請您不要忘記了忠誠的喇嘛們及鄰近的伊斯蘭教徒們，您必須維持他們之間的平衡，而不要讓他們互相對抗，而且請不要破壞他們固有的傳統及習俗。此外，也必須重視東干人²⁵及俄羅斯的伊斯蘭教信徒。您與我都是貴族，而國家就是要由保皇份子與貴族來保衛的，而貴族唯一的理想，唯一的目的，唯一的事業就是恢復帝王制。在西方，人類已被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所荼毒。而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也逐漸出現在東方，所以我們必須捍衛我們神聖的君主主義。信的最後提醒閣下能把握現在的好時機，就像在博克多格根恢復他的地位一樣，來恢復中原帝國²⁶。

恩琴向蒙古人宣傳革命對於俄羅斯所造成的混亂，並鼓勵這兩位王公參與中央蒙古帝國計畫，進而抵抗驅逐威脅東方的革命勢力。恩琴沒有考慮到他的中央蒙古帝國計畫中存在著矛盾，一方面他要結合所有蒙古族成立一個強大帝國，另一方面又計畫讓中國皇帝來領導中央蒙古帝國。蒙古人自從 1911 年後，就一直想要擺脫中國的控制，所以成立由中國皇帝來領導的中央蒙古帝國之計畫，根本不可能為他們所接受，因此沒有人就成立中央蒙古帝國一事，跟恩琴聯繫或是回信，況且蒙古人在 1919 年經歷了謝苗諾夫失敗之大蒙古國運動，對於中央蒙古帝國計畫，更視為是不可

²⁵ 東干族是中國穆斯林的一支，主要居住在吉爾吉斯和哈薩克斯坦，其祖先一百年前移居俄國。按照通常的說法，由於中國西北地區穆斯林起義，他們離開了自己的祖國，在 1864 年到 1887 年間，經歷了兩次主要的遷徙。第一次是從伊犁河谷東遷（18 世紀乾隆年間，起義被乾隆平定後，他們曾居住在伊犁河谷），這中間曾發生過兩次較大的風波；一次是在 1867 年，中國穆斯林和特蘭奇族之間爆發了一場民族衝突，另一次是在 1881 年至 1882 年間，沙皇將伊犁河谷的一部分返還給中國之後。第二次遷徙的起因是由於支持喀什噶爾自治而盲目逃亡。參見斯維特蘭娜·達耶爾著，馬青譯，「東干人的歷史與現狀－《亞瑟爾·十娃子－一位蘇聯東干族詩人的生平與創作》」，回族研究，第 3 期（1994 年），頁 65。

²⁶ 【第一封恩琴致帕塔勒王之信】〈Первое Письмо Р.Ф. Унгерна Палта-ван〉，АВПРФ, ф. 0111, оп. 2, п. 104, д. 47, л. 43-44 .—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с. 131-132.

能達成的計畫。

恩琴對於蒙古人的政治主張是要聯合他們為一個大帝國，而對於中國的政治主張則是，要幫助中國恢復帝王制度。由於恩琴是極端的君主主義者，所以他同樣希望中國能恢復滿清帝制。佔領庫倫前，他積極的與中國主張復辟的份子聯繫，他在 1919 年，曾基於政治的因素，取了肅親王善耆的女兒，希望能藉此加入中國復辟的活動²⁷。佔領庫倫後，恩琴依舊積極的和中國支持君主主義的份子聯繫，如：在東北的軍閥張奎武²⁸和在阿爾泰地區的李姓長官²⁹。恩琴在 1921 年 2 月寫信給張奎武，說明自己對於中國的立場與態度，信的內容如下：

.....我想閣下應該清楚，我是因為不得已的狀況下才進入庫倫。當然，我進入庫倫的計畫並非是謝苗諾夫所允許的，而他也不知道這件事。經過一些失敗後，我成功的佔領庫倫，而我也奪取了不少的武器及豐富的軍備用品。.....你應當非常清楚我從來沒有要反對中國或是與中國作戰，但是蒙古人渴望自由。我盡可能的採取所有計畫，不讓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我感到非常遺憾，假如中國人認為我是反對他們的話。在蒙古我採取嚴格的措施，禁止搶劫中國的商人。而我殺害主要的猶太籍商人，都是為了不讓中國的貿易受到損害³⁰.....

之後，恩琴與這位張奎武將軍的往來密切，恩琴在滿洲武器的買賣會

²⁷ В.И. Шайдицкий, На службе Отечества. —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 278.

²⁸ 張奎武隸屬張作霖之部下，亦是復辟份子。其經歷：1920 年曾經擔任呼倫貝爾鎮撫使。1921 年春天擔任黑龍江騎兵隊旅長。1922 年張作霖整編遼、吉、黑三省軍隊時，當時張奎武是擔任東三省陸軍騎兵第四旅之旅長。參見「東北抗日聯軍鬥爭史」，九一八事變前東北軍概況，<http://www.jlplib.com.cn/myweb5/bjz113.htm> 檢索日期：(2006/02/10)

²⁹ 俄文音譯為李章魁（Ли Чжанкую），由於在中文資料無法查詢到此人，暫時以李姓長官稱之。

³⁰ 【1921 年 2 月 16 日恩琴致張奎武之信】<Письмо Р.Ф. Унгерна Чжан Куню 16 февраля 1921 г.>, АВПРФ, ф. 0111, оп. 2, п. 104, д. 47, л. 15-15 . —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с. 100-101.

透過張奎武的幫助，而恩琴也會將其買賣所得之利潤分給張奎武³¹。

另外一封恩琴寫給李姓長官的信中，恩琴向他提起欲恢復中國帝制的理想，信的內容如下：

.....已經聽說過閣下成功的事蹟及知道閣下是忠誠的君主制度擁護者。我堅信光芒將會從東方照耀，而這道光芒即是 - 恢復君主制度。歐洲文化給東方國家帶來了萬惡的根源，而現在該是時候與革命搏鬥，並擊倒它了。

就我所知，有許多將軍都是君主主義者。我希望您能夠幫助我們共同的事業，就是對抗凶惡的革命，並與違反真理和慈善的人鬥爭。我們現在必須對抗共同的敵人，為了偉大的帝王制及東方的真理而奮鬥。.....

也許您聽過關於我不同的謠言，但我想要您相信我主要的目的就是消滅破壞偉大人類文明的人，為了東方的真理及光芒鬥爭，為了恢復君主制度而鬥爭³².....

恩琴佔領庫倫後的政治計畫分別是：成立中央蒙古帝國和恢復中國帝王制，以及讓外蒙重回中國管轄保持自治，而他的這些計畫的主要目的，都是爲了要推翻蘇維埃政權，然而他卻沒有達成任何一個項目。

三、恩琴後期活動的失敗

恩琴攻擊蘇俄的活動本打算在中央蒙古帝國成立後才出發，隨著中央蒙古帝國計畫的破產無法落實，恩琴決定及早攻擊蘇俄領土。另外讓恩琴

³¹ 【第二封恩琴致軍官馬列次基之信】〈Второе письмо Р.Ф. Унгерна прапорщику Малецкому〉, (марта 1921 г.), АВПРФ, ф. 04, оп. 29, д. 235, п.192, л. 77; ф. 0111, оп. 2, п. 104, д. 47, л.22. —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 140.

³² 【恩琴致李章魁之信】〈Письмо Р.Ф. Унгерна Ли Чжанкую〉, (мая 1921 г.), АВПРФ, ф. 0111, оп. 2, п. 104, д. 47, л. 83-84. —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с. 145-146.

決定提前出發攻擊活動的原因還有三個：第一，恩琴與外蒙獨立政府之間的關係漸趨冷淡，活佛與王公了解恩琴是無法維持外蒙的獨立，所以他們之間產生了矛盾。第二，恩琴的財產無法維持現有規模的軍隊，所以必須提早出發。第三，恩琴聽信了移民及從蘇俄領土逃跑難民誇大不實的消息，他們向恩琴表示俄羅斯國內時局相當混亂，人民都在等待起義推翻蘇共政權的活動，也因此更確立恩琴提早攻擊蘇俄的決心³³。

1921年5月21日恩琴發佈了「第十五號命令」後，隨即出發進入蘇俄領土。「第十五號命令」是一份攻擊蘇俄詳細的計畫書，除了攻擊蘇俄活動的路線、軍事規則外，當中清楚的說明了攻擊蘇俄的目的是爲了要恢復沙皇米亥爾·亞歷山大羅維奇·諾曼諾夫（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Романов）³⁴的王位以及推翻蘇維埃的革命政權。

而恩琴攻擊蘇俄的第一個目的地是特洛邑次卡薩夫斯克，根據兩份軍官的回憶錄中提到³⁵，在出發前往蘇俄的途中，恩琴曾經遇上了由謝苗諾夫從滿洲派來的軍官葉里面耶夫（А.К. Еремеев）帶來謝氏的口訊，謝氏要求恩琴帶領軍隊回到滿洲，並且將外蒙主權交還給中國，假如能達成如上條件，張作霖願意支助他們攻擊蘇俄的活動。然而恩琴並沒有答應這個條件，他選擇繼續進攻蘇俄的活動。

恩琴攻擊蘇俄領土的活動進行的並不順利，首先他在6月初攻擊特洛邑次卡薩夫斯克慘敗，並且他在進入蘇俄領土後發現，俄羅斯人民即使不滿蘇共政權，卻也不願意加入起義活動推翻它。在特城戰役後，雖然恩琴與紅軍交戰都有不錯的戰績，但這並不代表恩琴的攻擊活動是有希望，況且紅軍利用了恩琴離開庫倫的機會，俄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會議在6月16日批准了關於向蒙古派遣紅軍及遠東共和國軍隊的這項指示³⁶，並於7

³³ Князев, Легендарный барон. — Легендарный барон : не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с. 90-91.

³⁴ 米亥爾·亞歷山大羅維奇·諾曼諾夫（1878-1918）爲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弟弟，當尼古拉二世宣布他與太子退位後，臨時政府委任米亥爾大公繼位，但他拒絕了，之後便將全力轉交臨時政府。

³⁵ 在軍官托爾諾夫斯基及另一位曾經擔任恩琴貼身副官的馬奇耶夫（А.С. Макеев）的回憶錄都有談到此事件。

³⁶ 盧賈寧（С.Г. Лузянин）著，阿拉騰奧其爾譯，「中國與蘇維埃俄國之間的蒙古1920-1924」，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2期（2002年），頁106。

月 9 日佔領了庫倫。

恩琴攻擊蘇俄的活動是沒有任何希望，特別是在庫倫被紅軍佔領後。從那時起，軍隊開始有人因厭戰而逃跑。恩琴對於厭戰及逃跑的人相當殘酷，多是下令將他們殺害，而卡薩格蘭迪（Н.Н. Казагранди）³⁷就是最明顯的例子。1921 年 8 月，亞洲騎兵隊的軍官在厭戰又無法違抗恩琴命令的情況下，開始策劃謀殺恩琴，雖然恩琴僥倖逃過，但他仍舊因蒙古人的背叛，而遭到紅軍的逮捕，並於 1921 年 9 月 16 日被判處死刑。

恩琴被逮捕後，曾在不同的法庭上接受審判。1921 年 9 月 15 日於新西伯利亞法庭上，恩琴被控訴了三條罪分別是：1.替日本執行了侵略計畫，藉著創立中央亞洲帝國來推翻在外貝加爾的遠東共和國。2.在西伯利亞地區企圖推翻蘇維埃政權，來恢復君主制度及米亥爾·羅曼諾夫的帝位。3.對農民及工人、共產黨員、蘇維埃官員、所有猶太人（包括孩子）及中國的革命份子，進行殘忍大規模的屠殺行為³⁸。恩琴承認了指控的罪行，惟獨只否認他佔領庫倫的活動是受日本指使這項罪名。

在法庭上恩琴對與日本是否有合作關係他作了如下的回答：

我與日本沒有直接的關係。實際上，我曾試圖與在中國東北紅鬍子組織中有影響力的名間木（ ）聯絡過，但並沒有成功。但是曾經有日本軍隊的軍官寫信給我，詢問我關於我軍隊中的日本人在何處？之後我就再也沒有，也沒辦法有和日本人聯絡的機會。而我佔領庫倫危害了日本的利益，因為日本是支助中國擁護共和政體的份子。我並不信任日本人，我認為能將人民從革命中解放的只有游牧民族及中國人。當然

³⁷ 卡薩格蘭迪是蒙古西部一位傑出的白軍，他在攻擊蘇俄領土的過程中清楚明白，俄羅斯的居民是不會加入白軍的起義活動，並且他認為白軍的遠征活動不抱希望，所以他打算帶領軍隊前往西藏，恩琴聞訊之後，派人前往殺害卡薩格蘭迪。

³⁸ 【1921 年 9 月 15 日恩琴於新西伯利亞法庭的過程】<Ход суда над Р.Ф.Унгерном в Новониколаевске 15 сентября 1921г.>，“Советская Сибирь”（Новониколаевск）. № 200（560），17 сентября 1921. С.4.—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 243.

日本人樂於利用我，但他們並沒有成功。³⁹

恩琴自己認為與日本合作沒有利益，他也不清楚日本對於蒙古是否有企圖。但他指出日本企圖佔領西伯利亞，以及他推斷日後日本與美國將會發生戰爭⁴⁰。雖然恩琴的軍隊有約 70-80 名的日本士兵，但恩琴表示這些士兵多數都逃跑了，一直到他活動的後期，剩下來的日本士兵只有約 30 人⁴¹左右。恩琴強調在外蒙的活動是完全獨立，沒有依賴日本。

恩琴的活動會被認為是和日本合作，從另一角度來看和謝苗諾夫不無關係。因為謝氏為恩琴直屬長官，並且謝氏的活動一直是受日本援助，雖然謝苗諾夫對外宣稱恩琴佔領庫倫一事與他沒有關係，但是兩人之間是否維持合作，一直受中國的懷疑⁴²。在法庭上恩琴同樣也被問及和謝苗諾夫之間的關係，他有如下的回答：

我跟謝苗諾夫有衝突存在，因為之前有搶奪牲畜的問題，所以我離開了他。之後和他便沒有直接的聯繫關係。假如他願意給我提供金錢的話，或許我們可以繼續聯繫。然而，他從來沒有給過我錢，所以他是沒有辦法支使我的。在我進行我的軍事活動時，我也曾經考慮要和日本及謝苗諾夫合作，然而這想法是個錯誤，也不會發生。謝苗諾夫曾經在我佔領庫倫後幾次與我聯繫，但我說過與我聯繫的前提是必須支助我金錢。⁴³

³⁹ 【1921 年 8 月 29 日於特洛邑次卡薩夫斯克法庭上恩琴的問答】〈Допрос Р.Ф. Унгерна 29 августа 1921 г. в Троицкосавске〉, РГАСПИ, ф. 71, оп. 33, д. 2213, л. 10-15. —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 206.

⁴⁰ 【1921 年 9 月 1、2 日於伊爾庫斯克法庭上恩琴的問答】〈Допросы Р.Ф. Унгерна 1 и 2 сентября 1921 г. в Иркутске〉, ГАРФ, ф. 9427, оп. 1, д. 392, л. 47-60. —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 218.

⁴¹ 【1921 年 8 月 27 日於特洛邑次卡薩夫斯克法庭上恩琴的問答】〈Допросы Р.Ф. Унгерна 27 августа 1921 г. в Троицкосавске〉, РГВА, ф. 16, оп. 1, д. 222, л. 123-124об. —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 204.

⁴² 中國的報紙對於恩琴與謝氏之間的關係有過如下的報導：「謝苗諾夫又日思再舉，暗中與恩琴聯絡。謝氏對人謂與恩琴毫無聯絡，此欺人之語，雖三尺之童，亦不信之……」參見「蒙事又緊」，大公報，民國十年五月十九日，第三版。

⁴³ 【1921 年 8 月 29 日於特洛邑次卡薩夫斯克法庭上恩琴的問答】〈Допрос Р.Ф. Унгерна 29 августа 1921 г. в Троицкосавске〉, РГАСПИ, ф. 71, оп. 33, д. 2213, л. 10-15.

另外，根據一封紅軍情報員在庫倫致遠東共和國的信函中，再次提出恩琴不願意和謝氏有任何聯繫的證明，信函內容如下：

恩琴男爵的活動是完全獨立的。過去在阿克沙每當收到謝苗諾夫的命令時，會將他撕毀；並對謝苗諾夫罵出不堪入耳之話語。……

男爵只跟蒙古王公有聯繫，與謝苗諾夫及海拉爾、滿洲地區沒有聯繫。甚至連紅軍佔領了阿克沙及棉扎（ ）都不知道⁴⁴。

恩琴自己則是表示，他在外蒙的活動是完全獨立的，他既沒有和謝苗諾夫聯繫，也沒有和日本聯繫。恩琴他不願意和謝氏聯絡，因為謝氏不願意給他任何在武器裝備或是金錢上實質的幫助，只會給他訓誡般的建議⁴⁵。恩琴說他和謝氏的理想不同，他是為恢復君主制度而鬥爭，而謝氏則是為了成立立憲大會⁴⁶。在恩琴所穿的軍服上雖然印有 А.С.（Атаман Семёнов，意思是哥薩克領袖謝苗諾夫）兩個字母，但他與謝氏的關係僅存於表面上的服從。假若從謝苗諾夫與恩琴之間的關係，來判斷恩琴活動是和日本合作，並非可靠。

Унгерн 29 августа 1921 г. в Троицкосавске>, РГАСПИ, ф. 71, оп. 33, д. 2213, л. 10-15. —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 206.

⁴⁴ 【1921 年 3 月外貝加爾地區內部及蒙古內部情況之通報】<Сводка о внутреннем положении в Забайкалье и Монголии на марта 1921 г.>, (19 марта 1921 г.), РГВА, ф. 185, оп. 1, д. 174, л. 32-55 об. —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 116.

⁴⁵ 【1921 年 8 月 27 日於特洛邑次卡薩夫斯克法庭上恩琴的問答】<Допросы Р.Ф.Унгерн 27 августа 1921 г. в Троицкосавске>, РГВА, ф. 16, оп. 1, д. 222, л. 123-124 об. —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 201.

⁴⁶ 【1921 年 9 月 15 日恩琴於新西伯利亞法庭的過程】<Ход суда над Р.Ф.Унгерном в Новониколаевске 15 сентября 1921г.>, “Советская Сибирь” (Новониколаевск). № 200 (560), 17 сентября 1921. С.4. —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 245.

四、結論

恩琴其人與他的活動是相當值得研究的，他短短 34 年的壽命卻從事了具有相當影響力的活動。他的思想與性格在當時被稱為是邊緣人也不為過，他是極端的君主主義者，堅持要為了恢復俄羅斯的沙皇制度而鬥爭，因為他認為沙皇之於國家，就如同土地之於天一般重要，而沙皇的存在維持了國家每個階層的平衡⁴⁷。也因為有如此極端的想法，恩琴日後所有活動的目的都是為了推翻革命政府，恢復沙皇制度。

而恩琴在 1921 年之所以能夠成功的佔領庫倫，不外乎是當時的情勢給他造就了一個相當有利的機會。他在中、蒙關係最惡劣時候以解放博克多格根及恢復外蒙獨立為口號，來博取活佛和大多數蒙古王公的信任與支持。另外，中國政府對於外蒙經營不善，也是讓恩琴成功佔領庫倫的原因之一。從 1920 年夏天，陳毅再度前往庫倫任職後，就因無法按時發放軍餉，而向活佛借款 20 萬來作為軍餉，此種向活佛借款之行為也顯露了中國對外蒙之經營已到達山窮水盡之地步，更讓外蒙確定要脫離中國之決心⁴⁸。另外，1920 年 11 月恩琴首次攻擊庫倫的那段期間，陳毅就已經電洽北京政府，要求軍械及糧食支援，但是北京政府遲遲不能提供後援。而 1921 年 2 月初，庫倫情勢告急時，陳毅再次發函請求中國援助，但經中國委任出兵支援的張作霖與曹錕，雖然都聲明願意出兵，但雙方都怕損耗兵力，所以久久未有行動，因此錯失收復庫倫的良機。

至於恩琴佔領庫倫的活動是否受日本幫助，至今學者們仍然無法提出一個可靠的證據，來證明恩琴活動是受日本幫助。國外學者斐立脫司在外蒙古一書中就提到：「我們沒有實際的證據可以證明，謝苗諾夫與恩琴二人在財政方面曾由日本支持..⁴⁹。」雖然在內戰時期，日本雖然幫助了謝苗諾夫在赤塔成立了反共政權，但存在日謝之間的是互不信任的合作關係⁵⁰。

⁴⁷ 【1921 年 9 月 1、2 日於伊爾庫斯克法庭上恩琴的問答】<Допросы Р.Ф.Унгерна 1 и 2 сентября 1921 г. в Иркутске>, ГАРФ, ф. 9427, оп. 1, д. 392, л. 47-60.—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 218.

⁴⁸ 張大軍，外蒙古現代史第二冊，台北：蘭溪出版社，1983 年，頁 946-947。

⁴⁹ 斐立脫司（Gerard M. Friters）著，李約譯，外蒙古，台北：國立編譯館，1952 年，頁 195。

⁵⁰ Robert B. Valliant, “Japanese Involvement in Mongol Independence Movement”, Mongolia Society Bulletin, Vol. 11, No. 2 (Fall 1972), p. 17.

可以這麼說，日本在支持白俄的立場上是相當模糊，並處於灰色地帶，但仍舊扮演具有某種意義的角色⁵¹。日本對於支持白俄沒有一個明確的計畫，日方也可能在遭受國際輿論壓力或危及自身利益時，隨時停止對於白俄的援助。

學者魯賓（Robert Rupen）對於恩琴活動是受日本幫助也提出這樣的看法，他認為張作霖當初遲遲不願意征蒙的原因在於，他考慮到恩琴與日本之間的關係⁵²。然而筆者卻認為，當初張作霖不願意征蒙的原因，純粹只是不想要損耗自己的實力罷了。自從張作霖接下蒙疆經略使一職，並收下北京政府的五百萬元軍餉後，他從未有任何征蒙動作，據報他曾經派人去庫倫與活佛締結合約，希望不費一兵一卒收回外蒙古⁵³。並且當時中國的報紙曾經報導，張作霖不征蒙的主因在於，他得知恩琴攻擊蘇俄計畫進行的不順利，所以征蒙一事對他而言並非要務⁵⁴。也因為如此，要從張作霖的態度，而認定恩琴是與日本合作的看法也並非可靠。

另外，恩琴曾在一封寫給內蒙成德公的信中提到：「我們不需期望日本能給予我們支援，因為在他們軍隊的內部面臨了問題。除非他們解決內部的問題，不然我們無法指望日本與我們一同對抗紅軍。⁵⁵」從此封信的內容可以證明，恩琴並不依賴日本的幫助。

恩琴被捕後在法庭上曾說，他與日本的利益不同，雖然日本人願意利用他，但是他拒絕了，因為恩琴之所以佔領庫倫，可以說是建立在他獨特的政治思想基礎上，他想要聯合所有游牧民族為一個中央蒙古帝國，而他的最終目的是要讓游牧民族來推翻革命政府，恢復沙皇制度，並非幫助日

⁵¹ Fujiko Isono, "Soviet Russia and The Mongolian Revolution of 1921", p. 136.

⁵² Rupen, Robert A.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1900-1978,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9, p. 26.

⁵³ 「收駐日本使館譯報」，（民國十年六月十四日），中俄關係史料（民國十年），頁 97。

⁵⁴ 根據大公報報導：「張經略之親征，不過有此一說，實則尚未預備。且奉省接滿州里電報，謂恩琴為新黨打的落花流水，勝之不武。張使似覺無親征之必要。為三省邊防重要，不得不保持強大武力，以為緩急之用。」參見「外蒙形勢大變化」，大公報，民國十年七月二十二日，第三版。

⁵⁵ 【恩琴致成德公之信】〈Письмо Р.Ф. Унгерна Цэндэ-гуну〉，（марта 1921 г.），АВПРФ, ф. 0111, оп. 2, п. 104, д. 47, л. 24-24 ., подлинник; РГВФ, ф. 39454, оп. 1, д. 9, л. 82-83 . —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 211.

本擴張勢力版圖，並且他相信只有游牧民族，才能夠拯救世界免於革命的災難⁵⁶。至於前面所提過的，被認為是恩琴軍隊的日籍參謀鈴木，也證實只是一個軍隊中不重要的軍官，並非是日本特意派給恩琴的。依照如上種種證據，筆者認為，恩琴佔領庫倫前和日本有無合作關係，不得而知。但恩琴佔領庫倫及其後的活動，則是獨立不依靠日本。

對於恩琴的活動，有人認為他的活動是造成外蒙被蘇維埃政府赤化的主因，但學者莫菲（George Murphy）對此卻持有另一個看法，他在蘇維埃蒙古（Soviet Mongolia）一書中提到，恩琴的活動並不是造成紅軍佔領庫倫的主要原因，因為恩琴軍隊的勢力，根本對蘇維埃不造成威脅⁵⁷。況且，恩琴進攻蘇俄領土的計畫進行的並不順利，在6月初的特洛邑次卡薩夫斯克戰役中損失慘重。而紅軍是在6月底出兵庫倫，這更加證明，即使恩琴的軍隊在無法威脅蘇維埃政府的情況下，他們還是計畫佔領蒙古。恩琴曾在庫倫被紅軍佔領後，寫了一封信給博克多格根，信中說：「假如有謠言說紅軍佔領蒙古是因為我而引起的，我認為這是錯誤的。因為紅軍會進入蒙古是必然的⁵⁸。」實際上，恩琴的活動只是給予蘇維埃政府一個最合理的藉口來赤化外蒙。

在恩琴死後仍然有許多關於他的傳說，謠傳他並沒有死，因為喇嘛在他被判死刑後，悄悄的將他的屍骨拾回，並進行某種神秘的儀式讓他又再次復活。另外，托爾諾夫斯基在回憶錄也提到，他曾在上海見過一張照片，照片中有兩個喇嘛，有一位是中年人，樣貌與恩琴相當神似，而另一位年輕喇嘛看起來像是中年喇嘛的兒子，托氏很驚訝並認為那就是恩琴與他的兒子⁵⁹。雖然這些傳說的真實度不得而知，但是由此證明，恩琴其人

⁵⁶ 【1921年8月29日於特洛邑次卡薩夫斯克法庭上恩琴的問答】〈Допрос Р.Ф. Унгерна 29 августа 1921 г. в Троицкосавске〉, РГАСПИ, ф. 71, оп. 33, д. 2213, л. 10-15. —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 206.

⁵⁷ George G. S. Murphy, Soviet Mongolia: a Study of the Oldest Political Satellite, pp. 6-10, 轉引自藍美華, 「蘇俄早期對蒙政策初探 1917-1924」, 台北: 蒙藏委員會, 蒙古民族與周邊民族關係學術會議論文集/中國邊政協會編輯, 2000年, 頁480。

⁵⁸ 【1921年7月19日恩琴致博克多格根之信】〈Письмо Р.Ф. Унгерна Богдо-гэгэну 19 июля 1921 г.〉, АВПРФ, ф. 0111, оп. 2, п. 104, д. 34, л. 6-7. —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сс. 182-183.

⁵⁹ Торновский, События в Монголии-Халхе в 1920-1921 годах. — Легендарный барон: не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сс. 316-317.

與其活動是深烙在蒙民及白軍的心目中，並且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是很難被遺忘的，所以才會有許多關於他的傳說。

（本文於 2006 年 6 月 8 日投稿，2006 年 7 月 20 日審查通過）

參考書目

俄文

Кузьмин, С.Л. Барон Унгер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емуарах. Москва: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научных изданий КМК, 2004.

Кузьмин, С.Л. Легендарный барон : неизвестные стараницы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Москва: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научных изданий КМК, 2004.

Мелихов, Г.В. Белый Харбин: середина 20-х.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2003.

Юзефович, Л. Самодержец пустыни — феномен судьбы барона Р.Ф. Унгерн-Штернберга. Москва: Эллис Лак, 1993.

中文

專書

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民國六年至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9 年。

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民國十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年。

李邁先，俄國史（下冊），台北：國立編譯館，1969 年。

斐立脫司（Friters, Gerard M.）著，李約譯，外蒙古，台北：國立編譯館，1952 年。

張大軍，外蒙古現代史第二冊，台北：蘭溪出版社，1983 年。

期刊及專書論文

二木博史，「大蒙古國臨時政府之成立」，蒙古學信息，第 2 期（1998 年），28-37。

斯維特蘭娜·達耶爾著，馬青譯，「東干人的歷史與現狀—《亞瑟爾·十娃子—一位蘇聯東干族詩人的生平與創作》」，回族研究，第 3 期（1994 年），65-72。

盧賈寧（Лузянин, С.Г.）著，阿拉騰奧其爾譯，「中國與蘇維埃俄國之間的蒙古 1920-1924」，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2 期（2002 年），

104-115。

藍美華，「蘇俄早期對蒙政策初探 1917-1924」，台北：蒙藏委員會，蒙古民族與周邊民族關係學術會議論文集/中國邊政協會編輯，2000年。

報紙

「蒙事又緊」，大公報，民國十年五月十九日，第三版。

「外蒙形勢大變化」，大公報，民國十年七月二十二日，第三版。

網路資料

「九一八事變前東北軍概況」，東北抗日聯軍鬥爭史，
<http://www.jlplib.com.cn/myweb5/bjz113.htm>

英文

專書

Rupen, Robert A.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1900-1978*.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9.

期刊

Ballis, William B.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of A Soviet Satellite: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9, No. 2 (June, 1956), 293-328.

Isono, Fujiko "The Mongolian Revolution of 1921",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10, No.3 (1976), 375-394.

Isono, Fujiko "Soviet Russia and The Mongolian Revolution of 1921", Past and Present, No. 83 (May, 1979), 116-140.

Valliant, Robert B. "Japanese Involvement in Mongol Independence Movement", Mongolia Society Bulletin, Vol. 11, No.2 (Fall, 1972), 1-32.

遼朝在內蒙古地區的行政建置

陶玉坤

(內蒙古師範大學副教授)

摘 要

遼朝的疆域覆蓋了今內蒙古巴彥淖爾盟烏梁素海以東地區。遼朝在今內蒙古地區的行政建置主要有四個系統：部族建置、州縣建置、斡魯朵建置和頭下州建置，每個系統中又有著不同的層級隸屬關係。本文據文獻記載及考古資料，論述遼朝在今內蒙地區的行政建置，對已知在內蒙古地區，又不能確指今地者，也一併列舉。

關鍵字：遼朝、內蒙古、行政建置

Territory of Liao dynasty once covered the eastern region to Wu Liang Su Hai in Ba Yan Nao Er league. Liao dynasty mainly set up four administrative systems in the area of today's Inner Mongolia region: tribe/clan organization, state/county organization, Wo Lu Duo organization and Tou Xia Zhou organization. There were subordin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classes in each system. This paper discusses administrative construc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Liao dynasty in the area of today's Inner Mongolia region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data, and also enumerates those systems certainly in today's Inner Mongolia region, but unidentified in detail.

Keywords: Liao dynasty; Inner Mongolia; administrative construction and organization

中國古代歷史中，遼朝興起於今內蒙古地區，並始終將內蒙古地區作為自己政治中心的唯一的一個正統王朝。遼朝疆域，東自海，西至流沙，北絕大漠，南至燕雲。覆蓋了今內蒙古巴彥淖爾盟烏梁素海以東地區，遼朝五京中的上京和中京位於內蒙古。在遼朝歷史的研究中，都會或多或少地涉及到遼朝在內蒙古地區的行政建置，其中林榮貴先生《遼朝經營與開發北疆》，較為系統地論述了遼朝政區的雙重制特點，以及遼朝在北部邊疆地區雙重制政區的設置。¹周清澍先生主編《內蒙古歷史地理》，則第一次論述了遼朝在內蒙古地區的統治和遼朝在內蒙古地區的行政建置。²但是，這兩部著作都成書於 20 世紀 90 年代初，今天人們對遼朝行政建置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同時新的考古發現也在擴大著我們對遼朝在內蒙古地區行政建置的知識。本文將通過歷史文獻與考古資料的結合，論述遼朝在內蒙古地區的行政建置，對已知建置在內蒙古地區，又不能確指今地者，也加以介紹。

一、遼朝在今內蒙地區行政建置的基本形式

遼朝統治機構特點為南北分治，即以“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的官分南北的雙軌制。在這種政治體制下，遼朝的行政建置表現為雙軌制，既有管理游牧民族集中地區的部族建置，也有管理漢族和渤海族人集中地區的州縣建制，同時在部族和州縣之外還有皇帝和貴族私屬領地，即斡魯朵和頭（投）下州。遼朝在今內蒙古地區的行政建置，有四個系統：部族建置，州縣建置，斡魯朵建置和頭下州建置。

遼朝部族的管理屬於北面地方官體系。遼朝部族有大部族和小部族之分，對不同部族所設行政機構也不相同。大部族指“四大王府”，分別為五院部，在朝稱北大王院；六院部，在朝稱南大王院；乙室部，在朝稱乙室王府；奚六部，在朝稱奚王府。大部族的行政機構為府，有北大王府、南大王府、乙室王府和奚王府，行政長官為大王。遼朝的小部族較多，³

¹ 林榮貴《遼朝經營與開發北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第 62~87 頁。

² 周清澍主編《內蒙古歷史地理》，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4 年，第 78~93 頁。

³ 《遼史》，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87 年，第 729 頁，卷四十六《百官志二》，

成分也複雜。有從遙輦舊部分置者，也有被契丹降服的一些遊牧部落。小部族行政長官不同時期稱謂不同，有夷離堇、令穩和節度使之稱。部族的基層行政單位爲石烈、彌裏。

另外，在遼朝的邊疆地區還有屬國、屬部。遼朝對此類屬國、屬部實行懷柔政策，對屬國、屬部的行政建置有大王府和節度使司。

遼朝州縣的設置和管理屬於南面地方官體系。由於《遼史·地理志》中按五京道來編排府州縣，所以長期以來，人們對遼朝州縣制的層級關係認爲是三級制：統州的道級政區、統縣的州級政區和縣級政區。對此在 20 世紀末期，開始有學者提出懷疑。⁴還有學者對此問題採用了模糊的說法。⁵最新的研究成果爲關樹東《遼朝州縣制度中的“道”“路”問題探研》，提出遼朝並沒有道級行政建置，而是實行府、節鎮——州、刺州——縣三級行政制度。⁶這種論述是符合實際的。

契丹人在唐朝就已經對州縣制有所認識，唐武德二年（619）年，在契丹地區設立威州，這是目前所知最早在契丹地區設置的州，以後唐朝還在契丹地區設置過州、府等統治機構。耶律阿保機建國前，“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這種統治方式很成功，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廬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⁷阿保機于天顯元年（926），征服渤海國，置東丹屬國，統渤海州縣，同時把渤海的名門大姓遷至契丹內地，今赤峰、通遼一帶，依漢俘的方式建州縣安置。

在遼朝政區劃分中，有一部分州縣或部族，並不屬於州縣或部族行政系統中，而是屬於斡魯朵或頭下。由皇帝或貴族私有。斡魯朵又稱宮衛，

記載小部族有四十九；同書第 438 頁，卷三十七《地理志一》記載小部族有五十二。

⁴ 李逸友《遼代城郭營建制度初探》，《北方考古研究》（一），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79 頁。張修桂、賴清壽《遼史地理志平議》，《歷史地理》，第 15 輯，1999 年。

⁵ 孔令紀 曲萬法 劉運珍 劉錦星主編《中國歷代官制》，濟南，齊魯書社，1993 年，第 261 頁。

⁶ 關樹東《遼朝州縣制度中的“道”“路”問題探研》，《中國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

⁷ 歐陽修《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錄第一》，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 年，第 886 頁。

《遼史》稱皇帝“居有宮衛，謂之幹魯朵”，“天子踐位置宮衛，分州縣，析部族，設官府，籍戶口，備兵馬。崩則扈從後妃宮帳，以奉陵寢。有調發，則丁壯從戎事，老弱居守。”⁸幹魯朵有自己的行政建置：府、州、縣和部族。遼國共有幹魯朵 13 個，包括 9 帝、2 後、1 個皇太弟和韓德讓。幹魯朵的行政管理機構為都部署司，長官為都部署。⁹

在遼朝還有屬於貴族的私城，稱為頭下州，《遼史》記載：“頭下軍州，皆諸王、外戚、大臣及諸部從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團集建州縣以居之。橫帳諸王、國舅、公主許創立州城，自餘不得建城郭。朝廷賜州縣額。其節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¹⁰頭下州的官員，節度使由朝廷任命，刺史以下官員由頭下主任命。頭下州雖然與幹魯朵同為契丹貴族私屬領地，但規模上遠遠小於幹魯朵，在行政管理的層級結構中也較為單一，很少有統縣的頭下州。¹¹

綜上，遼朝的行政建置中，有四個獨立的互不統屬的系統，即部族建置、州縣建置、幹魯朵建置和頭下州建置，每個系統中具有不同的層級隸屬關係。

二、遼朝在內蒙古地區的行政建置

下文就目前已知遼朝在內蒙古地區的行政建置作具體說明。為行文方便，本文將遼代內蒙古地區分為上京、中京、西京地區三個部分來論述，這裏的上京、中京、西京只有地域的含義。在行政隸屬關係上，並不是都直屬於京城，而是呈現著多層次的隸屬關係。

1. 遼朝上京地區在內蒙的行政建置

上京地區包括今內蒙古赤峰市、通遼市、興安盟、呼倫貝爾市、錫林

⁸ 《遼史》第 361~362 頁，卷三十一《營衛志上》。

⁹ 中外學者一般認為幹魯朵即皇室頭下，而楊若薇認為只有隸宮籍並扈從皇帝四時捺鉢的宮分戶才是皇室的私有戶，而隸宮州縣民戶則具有國家編戶齊民的身份，見氏著《契丹王朝政治軍事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第 39~62 頁。

¹⁰ 《遼史》第 448 頁，卷三十七《地理志一》。

¹¹ 有些契丹貴陽市族建有小於縣的頭下私產，如頭下城、寨、堡等，參見劉浦江《遼朝頭下制度與頭下軍州》，《中國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

郭勒盟。

（1）部族政區

五院部，據《遼史》記載：“五院部民偶遺火，延及木葉山兆域。”¹²雖然木葉山具體位置，現還未有定論，但木葉山在上京地區已為學界所認同，所以，此次五院部民引發的火災，無論從哪個方向來說都應在上京，說明在上京木葉山附近有五院部民。另據《北大王墓誌》，北大王“薨于上京南之私地”，¹³也證上京地區有五院部存在。五院部的甌昆石烈（也記為“甌堇突呂”）、乙習本（也記為“乙斯勃”）石烈于遼太宗會同二年（939）至三年，奉詔遷到於諧裏河（今烏爾遜河）、臚胸河（今克魯倫河）和海勒水（今海拉爾河）烏古部地區。¹⁴

六院部，上京地區也有六院部民分佈。發現于赤峰市巴林右旗罕山的《崇善寺碑》有六院部的信息，如：“六院司契丹烏魯本娘子”、“六院司契丹烏魯者勃堇”等。¹⁵從人名看，有男有女，可證在遼代黑山（巴林右旗罕山）附近有六院部民居住。

六院部的幹納阿剌（也記為“溫納何刺”）石烈，會同年間與五院部甌昆石烈和乙習本石烈一同遷往烏古地區。

薛特部，開泰四年（1015），聖宗以回鶻戶，在上京道永州茲仁縣置薛特部，位於赤峰市西拉沐倫河與老哈河會合處西南。

楮特部，又名“初魯得”部，阻午可汗時置。據《蕭孝恭墓誌》：蕭孝恭“特授本部族（即初魯得部族）節度使，遼國二十部族節度使之最上也。”蕭孝恭死後葬於“本帳”，¹⁶墓誌出土于赤峰市翁牛特旗烏丹鎮北朝格溫都鄉，可證翁牛特旗有楮特部居地。

位於上京道的屬國屬部今地在內蒙古，能稽考者有：

室韋國，此室韋部居地在曷剌河（哈拉哈河）流域至海勒水（海拉爾

¹² 《遼史》第 939 頁，卷六十一《刑法志上》。

¹³ 蓋之庸《內蒙古遼代石刻文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2 年，第 180 頁。

¹⁴ 《遼史》第 46、48 頁，卷四《太宗紀下》；同書第 384 頁，卷三十三《營衛志下》。

¹⁵ 蓋之庸，《內蒙古遼代石刻文研究》，第 423~428 頁。

¹⁶ 蓋之庸，《內蒙古遼代石刻文研究》，第 250~251 頁。

河)以南地區，遼朝於此置室韋國王府，下設節度使司。¹⁷

黑車子室韋國，黑車子室韋的駐牧地在大馬群山以北的錫林郭勒草原，¹⁸遼朝征服黑車子室韋後，于此設黑車子室韋國王府，下設節度使司。

烏古部，烏古部駐牧地以今海拉爾河和克魯倫河下游為中心，遼朝在烏古部設置烏古部節度使和于厥裏國王府。

(2) 州縣政區

臨潢府，神冊三年(918)，遼太祖在此營建皇都，會同元年(938)，遼太宗改皇都為上京，並置臨潢府，位於今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東鎮東南。統縣六¹⁹：

臨潢縣，天贊初(922或923年)，太祖南攻燕、薊，以所俘人戶，散居潢水之北，縣臨潢水，故以名。治上京皇城內。

長泰縣，太祖攻渤海，把俘掠的渤海長平縣民，遷到上京西北與漢人雜居，建長泰縣。治今巴林左旗十三敖包鄉。²⁰

興仁縣，遼聖宗開泰二年(1013)置。治上京漢城內。

易俗縣，遼聖宗太平九年(1029)，平定渤海大延琳叛亂後，遷部分叛民及家屬於上京北部，置易俗縣。治上京漢城內。

遷遼縣，遼聖宗平定大延琳叛亂，遷大延琳兵勇部分家屬於上京東北，建遷遼縣，治上京漢城內。

渤海縣，以遼東京叛民徙置。

臨潢6個直轄縣，都是遷燕薊或渤海民而建，居民構成主要為漢族和渤海族人口，建置是依其舊制行州縣制。臨潢和長泰縣由遼太祖建，興仁、易俗、遷遼縣由遼聖宗建，渤海縣未載何時建，從徙遼東京叛民置來看，渤海縣的建置時間也應是在平定大延琳叛亂時，即聖宗時。遼朝把中原和渤海的定居人口遷到本土，成功地施用了州縣制來治理。

¹⁷ 林榮貴，《遼朝經營與開發北疆》，第77頁。

¹⁸ 張久和：《原蒙古人的歷史室韋-達怛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2頁。

¹⁹ 《遼史》第439~442頁，卷三十七《地理志一》記載：臨潢府統縣十。其中有四縣分屬於不同的幹魯朵，在行政關係上不隸屬於臨潢府。

²⁰ 李逸友《遼代城郭營建制度初探》，《北方考古研究》(一)，第95頁。

靈安州，治今通遼市庫倫旗西部扣河子鎮黑城子村黑城子古城。靈安州，史籍無載，據在此城發現的“靈安州刺史印”，推定此處為遼靈安州故址。²¹

春州，《遼史·地理志》失載，治今興安盟突泉縣寶石鄉寶城村雙城子古城。²²

通化州，置不久，因北面部族的侵擾而南遷，改為泰州（黑龍江泰來縣塔子城）。通化州州城位於呼倫貝爾市陳巴爾虎旗巴彥庫仁鎮浩特陶海古城。

靜州，原泰州之金山縣，天慶六年（1116）升為州。治今興安盟烏蘭浩特市前公主嶺一號古城。²³

（3）斡魯朵政區

遼朝 13 個斡魯朵，目前已知其中 7 個在上京道境內有所屬州縣。在諸斡魯朵中還有所屬部族，但因為不能確知其地，所以在此不予論述。

太祖弘義宮 祖州，位於今內蒙古巴林左旗林東鎮東南 20 公里哈達英格鄉石房子林場。《遼史》記載：天顯二年（927），“葬太祖皇帝于祖陵。置祖州天城軍節度使，以奉陵寢。”²⁴祖州是遼太祖奉陵邑。祖州一帶是阿保機出生的世裏家族世代遊牧地，“以高祖昭烈皇帝、曾祖莊敬皇帝、祖考簡獻皇帝、皇考宣簡皇帝所生之地，故名（祖州）。”²⁵但是，祖州城的居民以漢人為主，“阿保機既創西樓，又於西南築一城，以貯漢人，今名祖州。”²⁶可知祖州在阿保機在世時即已建立，只是在其死後才改名曰祖州。統縣二：

長霸縣，遷龍州長平縣民于祖州東北，置縣。治祖州外城。

咸甯縣，遷遼陽長寧縣民于祖州西南，置縣。治祖州外城。

龍州為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附郭州，此 2 縣，當在遼太祖滅渤海後，遷當地居民于祖州而設。

²¹ 賁鶴齡《內蒙古庫倫旗發現遼代靈安州城址》，《考古》1990 年第 6 期。

²² 張柏忠 孫進己《遼代春州考》，《內蒙古文物考古》1981 年創刊號。

²³ 李逸友《遼代城郭營建制度初探》，《北方考古研究》（一），第 103 頁。

²⁴ 《遼史》第 24 頁，卷二《太祖紀下》。

²⁵ 《遼史》第 442 頁，卷三十七《地理志一》。

²⁶ 《武經總要前集》卷十六下，台灣影印四庫全書本，第 726 冊。

屬弘義宮的還有慶州境內的富義縣，太宗遷渤海義州民置義州。興宗重熙元年（1032），降爲義豐縣，後改爲富義縣，隸弘義宮，位於赤峰巴林右旗。

應天皇太后長寧宮 儀坤州，太祖應天皇后建，太祖平渤海時，俘掠有伎藝人戶，多歸太后帳下，謂之“屬珊”。應天皇后以這些俘戶，在自己的出生地契丹右大部，置儀坤州，隸長寧宮。儀坤州今地還不能確指，但當在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境內求之。²⁷儀坤州統縣一：

廣義縣，應天皇后以征伐所獲俘戶建。統和八年（990），以諸宮提轄司戶置來遠縣，統和十三年，併入廣義縣。附郭。

長寧宮屬縣還有臨潢府定霸縣，太祖遷渤海扶余府強師縣民戶至上京西，與漢人雜處。統和八年（990），建定霸縣，隸長寧宮。治上京城內。

太宗永興宮 懷州，太宗和穆宗的奉陵邑。此地原爲耶律德光行帳放牧之地，天贊年間（922~925），耶律德光隨太祖攻渤海，破扶餘城，下龍泉府，遷俘戶於此築寨居之。耶律德光即位後，又充實燕、薊俘戶。太宗崩，葬西山（懷州北 6 華里），曰懷陵。世宗大同元年（947），置懷州以奉陵寢，隸永興宮。穆宗死後，葬於懷陵旁。懷州治今巴林右旗幸福之路蘇木北崗崗廟村。統二縣：

扶余縣，太祖攻渤海，遷龍泉府扶餘縣降戶於此，世宗時置縣。附郭顯理縣，太祖攻渤海，遷顯理府俘戶於此，世宗時置縣。

景宗彰潛宮 永州，《遼史》記載：永州“東潢河（西拉木倫河），南土河（老哈河），二水合流，故號永州”。²⁸乾亨三年（981）建，隸彰潛宮。永州應赤峰境內西拉木倫河與土河交彙處求之。²⁹統縣三：

長寧縣，太祖平渤海，遷顯德府民於此置縣。附郭。

²⁷ 孫繼民《遼儀坤州地望考略》，《內蒙古文物考古》，1992 年 1、2 合刊。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冊，遼上京道，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 年，第 6 頁。

²⁸ 《遼史》第 445 頁，卷三十七《地理志一》。

²⁹ 姜念思 馮永謙：《遼代永州調查記》，《文物》1982 年第 7 期，認爲永州位于今翁牛特旗白音他拉蘇木古城，這是迄今爲止發現的在兩河之間并距匯合點較近的唯一的一座古城址。此城位于西拉木倫河南岸，并不符合“東潢河”之說，作者認爲此種情況出現的原因：或者是河流改道，或者是記載有誤。

義豐縣，遷渤海鐵利府義州民置義州。重熙元年（1032），遼興宗廢州，改義豐縣。在州西北一百里。³⁰

慈仁縣，太宗以皇子只撒古亡，在皇子墳西置慈州。重熙元年（1032），興宗廢州，改慈仁縣。

龍化州，唐天復二年（902），太祖破代北，遷其民建龍化州。次年又充實女真俘戶。神冊元年（916），阿保機在龍化州稱帝。龍化州今地不詳，應在西拉木倫河上游求之。³¹統縣一：

龍化縣，太祖以女真和燕薊俘戶置。附郭。

降聖州，本契丹大部落之地，太祖時春季常駐此。穆宗建州。先屬延昌宮，後屬彰潛宮。今地不詳。當在赤峰、通遼境內。³²統縣一：

永安縣，太祖以渤海永安縣人戶置寨，以後建縣。附郭。

臨潢府境內保和縣，太祖遷渤海富利縣人居上京南。聖宗統和八年（990），以諸宮提轄司人戶置保和縣，隸彰潛宮。治上京城內。

承天皇太后崇德宮 臨潢府境內潞縣，天贊元年（922），太祖攻破薊州，遷潞縣民戶於臨潢府東，與渤海人雜處。後隸崇德宮。

聖宗興聖宮 慶州，聖宗曾游獵於此，喜愛此處風光壯美，建慶州，並立下遺言，死後葬於此地。聖宗死後，興宗遵遺命，建永慶陵（慶州西北 12.5 公里），葬聖宗。治今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蘇木白塔子古城。統縣二：

玄德縣，興宗景福元年（1031）置縣。附郭。

孝安縣，不詳。

烏州，原為烏丸之地，契丹北大王撥剌佔領為牧地，建私城，後朝廷收回，隸興聖宮。位於今赤峰、通遼一帶。統縣一：

愛民縣，撥剌王從軍南征，遷漢民俘戶置。附郭。

興宗延慶宮 饒州，本唐饒樂府地，貞觀年間，置松漠府。遼太祖在

³⁰ 關於義豐縣，《遼史》第 446 頁，卷三十七《地理志一》還有一種說法，曾改名富義縣，屬泰州，不可考，存疑。

³¹ 郝維彬《遼代龍化州調查記》，《內蒙古文物考古》，1991 年第 1 期；馮永謙《遼代部分州縣今地考》，《北方文物》，1994 年第 4 期。

³² 馮永謙《遼代部分州縣今地考》，《北方文物》，1994 年第 4 期。

原松漠府城址建饒州。治今林西縣雙井店鄉西英桃溝古城。³³統縣三：

長樂縣，太祖遷渤海人戶建，其中部分居民以冶鐵爲生。在饒州西城，發現冶鐵焦渣、坩鍋殘片，焦渣堆積厚達 1 米。長樂治應在饒州西城。附郭。

臨河縣，太宗遷渤海豐永縣人戶于潢水之曲，建臨河縣。治今林西縣林西鎮東南敖包吐上夥村。

安民縣，太宗以渤海俘戶置。今克什克騰旗土城子鎮北古城址，出土經幢文記有：“饒州安民縣主簿兼口縣尉太……”，可知此處即爲安民縣治所。

(4) 頭下州政區

豐州，遼澤³⁴大部落，遙輦氏僧隱牧地，何時建，不詳，遼道宗太康元年（1075），沈括出使遼國時，已改稱澄州。治今翁牛特旗烏丹鎮。³⁵

松山州，遼澤大部落，橫帳普古王牧地，何時建，不詳。治今巴林右旗益和諾爾蘇木布敦花嘎查。³⁶

豫州，橫帳陳王牧地。《聖宗淑儀贈寂善大師墓誌》中記載“禮葬譽州東”，“譽州”當爲“豫州”之別寫，³⁷墓誌是通遼市紮魯特旗公安局在哲北農場收繳，豫州應在紮魯特旗或鄰近紮魯特地區求之，這也符合豫州“南至上京三百里”，³⁸的大致方位。

全州，韓匡嗣私城，統和九年（991），賜州額，爲全州。³⁹《耶律遂忠墓誌》中記有“前全州軍事……撰”，遂忠墓誌撰於重熙六年

³³ 林西縣文物管理所《遼饒州及長樂臨河安民三縣調查》，《內蒙古文物考古》，1998 年第 1 期；馮永謙 董念思《遼代饒州調查記》，《東北考古與歷史》，第 1 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第 211~219 頁；林西縣文化館《遼饒州故城調查記》，《考古》，1980 年第 6 期。

³⁴ 《遼史》第 437 頁，卷三十七《地理志一》，“遼國其先曰契丹，本鮮卑之地，居遼澤中，去榆關一千一百三十裏，去幽州又七百一十四裏。南控黃龍，北帶潢水，冷陁屏右，遼河塹左。高原多榆柳，下隰饒蒲葦。”

³⁵ 《沈括〈熙寧使契丹圖抄〉疏證稿》，載賈敬顏《五代宋金元人邊疆行記十三種疏證稿》，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第 160~161 頁。

³⁶ 李逸友《遼代城郭營建制度初探》，《北方考古研究》（一），第 101 頁。

³⁷ 蓋之庸《內蒙古遼代石刻文研究》，第 211 頁。

³⁸ 《遼史》第 450 頁，卷三十七《地理志一》。

³⁹ 《遼史》卷十三《聖宗紀四》，統和九年五月己未，“以秦王韓匡嗣私城爲全州”，第 141 頁。

(1037)，⁴⁰此時全州仍為韓氏私城。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在巴林左旗白音勿拉蘇木的白音罕山發現了韓氏家族墓地，⁴¹全州治應在今巴林左旗白音勿拉蘇木白音罕山東南四方城古城，

越王城，太祖伯父越王述魯以西伐黨項、吐渾所獲戰俘建城，在祖州東南。

2. 遼朝中京地區在內蒙古的行政建置

中京建于聖宗統和二十五年（1007），中京地區，包括今內蒙古赤峰松山區、元寶山區、寧城縣、敖漢旗和喀喇沁旗等地。

（1）部族政區

奚王府，從古北口到土河之間，主要是奚族居住地區，奚族納入遼朝版圖後，此種情況依舊。劉敞使遼時，還見到“自古北口即奚人地”，⁴²太祖征服奚後，以六部奚，設奚王府。主要活動于老哈河流域。

特裏特勉部，原為從八部中各選 20 戶人口，以戍衛與奚交界地帶，聖宗時，因戶口蕃息，置為部，設節度使。其戍守地點在落馬河及速魯河流域，落馬河為赤峰境內的英金河，特裏特勉部，當駐牧于英金河一帶。

乙典女直部，聖宗以女真人戶置，居高州（高州見下文）北。

伯德部，居松山州（見下文）和平州（治今河北盧龍縣）之間。

（2）州縣政區

大定府，治今寧城縣大名鎮。統和二十五年（1007），聖宗建中京。中京初建時沒有屬縣，北宋路振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即中京建成的次年，出使遼朝到中京，當時中京“無屬縣”，遼朝“常欲遷幽、薊八軍及沿靈河之民，以實中京。民不堪命，虜知其不可，遽止。”⁴³《遼史·地理志》記載大定府統九縣，為以後所置，尤以開泰二年（1013）所置為多。九縣在內蒙境內六：

大定縣，遷諸國俘戶置縣，治今寧城縣大名鎮。

⁴⁰ 蓋之庸《內蒙古遼代石刻文研究》，第 97 頁。

⁴¹ 何振祥 曹建華主編《大遼韓知古家族》，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年。

⁴² [宋]劉敞：《公是集》卷二十八《古北口》，叢書集成初編，中華書局，1985 年，第 1903 冊。

⁴³ 《路振〈乘輅錄〉疏證稿》，載賈敬顏《五代宋金元人邊疆行記十三種疏證稿》，第 67 頁。

長興縣，遷諸部人戶置。治今寧城縣大名鎮。

富庶縣，開泰二年，析京民置。治今寧城縣甸子鄉黑城。⁴⁴

勸農縣，開泰二年，析京民置。治今寧城縣西南二臺子村。⁴⁵

金原縣，《遼史·聖宗紀》記載，開泰二年，以“金甸子爲金原縣”。⁴⁶《遼史·地理志》作“金源”，⁴⁷據《劉祐墓誌》，劉祐葬于“金原縣之先塋”，⁴⁸應以金原爲是。據墓誌出土地點，可指定金原縣治今敖漢旗四家子鎮牛夕河古城。

恩州，太宗建州，聖宗開泰年間，又充實渤海民戶。初隸屬於永興宮，後屬中京。治今喀喇沁旗西橋鄉七家村。⁴⁹統縣一：

恩化縣，開泰中，聖宗以渤海人戶置，附郭。

高州，聖宗開泰中，攻伐高麗，以所俘民戶置高州。治今赤峰市元寶山區太平地鄉興隆坡村土城子。⁵⁰統縣一：

三韓縣，開泰年間，聖宗以扶余、新羅、馬韓俘戶置。附郭。

武安州，太祖以漢族俘戶建城，初名杏塢新城，後又充實遼西民戶，更名新州。統和八年（990），改爲武安州。《遼史》記載，武安州境內有黃柏嶺，《耶律元寧墓誌》記有：“歸葬于黃柏嶺之東”，黃柏嶺爲今努魯爾虎山脈之中段的姚家溝一帶。耶律元寧墓北 20 餘公里敖漢旗南塔鄉白塔子村西古城，當爲武安州州治。⁵¹統縣一：

沃野縣，附郭。

松山州，開泰二年（1013），聖宗以松山川置。州城位於赤峰市松山區城子鄉城子村。⁵²統縣一：

⁴⁴ 李逸友《遼代城郭營建制度初探》，《北方考古研究》（一），第 94~95 頁。

⁴⁵ 張修桂 賴青壽《遼史地理志彙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34 頁。

⁴⁶ 《遼史》第 173 頁，卷十五《聖宗紀六》。

⁴⁷ 《遼史》第 482 頁，卷三十九《地理志三》。

⁴⁸ 蓋之庸《內蒙古遼代石刻文研究》第 306 頁。

⁴⁹ 項春松《內蒙古赤峰地區遼代中小城鎮的發現與研究》，《北方文物》，1994 年第 1 期。

⁵⁰ 張松柏 任學軍《遼高州調查記》，《內蒙古文物考古》，1992 年第 1、2 期合刊。項春松認爲在赤峰元寶山區豐水溝鎮土城子村，《內蒙古赤峰地區遼代中小城鎮的發現與研究》，《北方文物》，1994 年第 1 期。

⁵¹ 邵國田《遼代武安州城址調查》，《內蒙古文物考古》，1997 年第 1 期。

⁵² 張松柏 任學軍《遼金松山州遺址調查》，《內蒙古文物考古》，第 4 期。項春松認

松山縣，開泰二年置，附郭。

3. 遼朝西京地區在內蒙古的政區建置

重熙十三年（1044），升大同軍爲西京，治大同府，位於今山西大同市。西京地區包括今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呼和浩特市、包頭市、鄂爾多斯市等地。

（1）部族政區

五院部，六院部，分佈於大同府、歸化州（河北宣化）北，部分地區位於內蒙古中西部地區。⁵³

乙室王府，駐牧於遼朝西南面。部分地區位於今內蒙古西部地區。⁵⁴

（2）州縣政區

德州，聖宗開泰八年（1019），以漢戶置，屬大同府。治今烏蘭察布市涼城縣東北岱海東北岸。⁵⁵統縣一：

宣德縣，附郭。

豐州，神冊五年（920），耶律倍進攻後唐天德軍（今鄂爾多斯市杭錦旗），天德軍節度使宋瑤投降，不久，宋瑤複叛，於是，遼兵攻陷天德軍城，擒宋瑤，並其家屬，遷徙到陰山南，新築豐州城。治今呼和浩特東郊白塔村西南古城。⁵⁶統縣二。

富民縣，附郭。

振武縣，太祖神冊元年（916），伐吐谷渾，將居民全部東遷，後置縣。治今呼和浩特和林格爾縣西北土城子。⁵⁷

雲內州，遼初，以代北雲朔招討司改雲內州。治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古城村白塔古城。統縣二：

柔服縣，附郭。

寧人縣，今址不詳。

爲在赤峰市松山區穆家營子鄉下洼村，《內蒙古赤峰地區遼代中小城鎮的發現與研究》，《北方文物》，1994年第1期。

⁵³ 何天明《遼代政權機構史稿》，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第153~156頁。

⁵⁴ 島田正郎《遼代社會史研究》，東京，巖南堂書店，1978年，82~83頁。

⁵⁵ 張修桂 賴青壽《遼史地理志滙釋》，第194頁。

⁵⁶ 李逸友《遼代城郭營建制度初探》，《北方考古研究》（一），第92頁。

⁵⁷ 張修桂 賴青壽《遼史地理志滙釋》，第198頁。

甯邊州，治今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縣下城灣古城。⁵⁸

東勝州，神冊元年（916），太祖攻破後唐勝州（河套地區），遷其民戶出河套至河東。後西夏佔領河套地區，遼就在河套外置勝州，與唐勝州隔河相對，故名東勝州。⁵⁹治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城關鎮大皇城。⁶⁰統縣二：

榆林縣，治今鄂爾多斯市准格爾旗十二連城鄉。附郭。

河濱縣，治今鄂爾多斯市准格爾旗大路鄉。

金肅州，重熙十二年（1043），興宗以伐西夏俘戶置，後益以燕民。治今鄂爾多斯市准格爾旗西北。

河清軍，重熙十二年（1043），興宗置。治今鄂爾多斯市准格爾旗東北。

以上所述為遼朝在內蒙古地區的不同類型的行政建置，主要為今可稽考者，還有一些遼朝在內蒙古的行政建置，目前尚不能確定，有待於新材料的發現及新的研究成果來加以補充。

從遼朝在內蒙地區的建置來看，遼上京除部族和州縣建置外，斡魯朵和頭下州比較多，因為這裏是契丹族的原駐牧地，皇帝和貴族俘獲人口後也多遷至自己的領地內。在遼中京，也有斡魯朵和頭下州的存在，但主要分佈在今遼寧地區。而在內蒙古西部地區斡魯朵和頭下州的情況還不甚清楚。（2006年6月2日接到，2006年7月1日審查通過）

⁵⁸ 周清澍主編《內蒙古歷史地理》，第91、100~101頁。

⁵⁹ 李慎儒《遼史地理志考》卷五《西京道》，《四庫未收書輯刊》，第7輯，第4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⁶⁰ 周清澍主編《內蒙古歷史地理》，第91頁。

稿 約

- 一、本刊為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地政治及現況之中文刊物，歡迎學者專家踴躍賜稿。
 - 二、來稿請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撰寫（A4，Word 檔），使用註解，說明來源，文長以一萬字以內為限。並請附摘要（三百字以內）、作者簡介（學歷、現職及研究領域），以上資料請附磁碟。
 - 三、來稿經本社聘請學者審查通過後採用，未刊登者，本社恕不退件。
 - 四、來稿一經刊載，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
 - 五、來稿限未曾發表過的作品，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 六、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凡經採用之論文，著作權歸本社所有。
 - 七、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店市二十張路 129 巷 2 弄 10 號 3 樓，劉學鈺。
- 電話：（02）2218-6116

0921-883325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九月出版

中國邊政協會

中國邊政季刊

名譽
發行人：楊克誠

發行人：阿不都拉

社長：林恩顯

主編：劉學鈔

電話：0921-883325
2218-6116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印刷者：晟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寧波西街 124-2 號 1 樓

電話：2303-947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 0197 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 1658 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